

南开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清代山西经济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现象及其作用

姓名：乔南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中国古代史

指导教师：许檀

20061101

摘 要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属中纬度大陆性气候，境内铁矿和煤炭储量较丰。清代山西地狭人稠，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产出不敷食用。农副产品加工业与矿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并且在一些行业呈现集聚现象，例如烟业、盐业、冶铁业等等。农业的产不敷用和工业的发展，是山西人外出经商的前提。而稠密的人口大量集中在同一区域内，产生较大的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则是促成山西人懋迁省外，经商他乡的直接原因。

山西商人足迹遍布京师、直隶、山东、河南、蒙古、两湖、东北及西南、西北诸省，甚至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从事包括金融业、茶业、烟业、棉布业、铁货业、皮毛业、粮食业、杂货业、运输业和牙行在内的众多行业。大规模、长时段、广泛围的商业经营活动，为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将资本运回本土，在山西本地形成大量资本的集聚。这些资本中的一部分被投资于流通领域和金融业。对流通领域的再投资，引起了商业的广泛兴盛与发展，在省内和省外的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商业的产业集聚，例如茶业、货栈业、旅蒙商等。对金融业的投资，在为山西商人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之余，带来了金融业的产业集聚，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票号业的集聚发展上。

产业集聚促进了山西城市的繁荣，境内四个经济小区中均有商业繁荣的城市出现，并且，在同一小区中的城市表现出相似的产业特点。具体而言，即晋中区平遥、太谷、祁县为金融业城市；晋南区解州、运城、绛州为盐业生产运输城市；晋东南区以长治、凤台、阳城为主的冶铁工业区；晋北区杀虎口、归化城、大同和丰镇为中蒙贸易城市；黄河沿线西包头、河曲、碛口、永济为航运业城市。具有相似特点的城市在空间上相对集中，从而产生城市集聚。

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发展较为缓慢，无论从集市数量，还是开市场次上来说，都没有呈现“勃兴”。而庙会在规模、商品种类、参与人数上均超过前者。庙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集市的作用。

产业集聚是城市集聚的基础，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城市集聚具有扩散效应，反过来加速产业集聚，亦会影响周围地区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从而带来一些民俗民风的变化。庙会发展快于集市就是城市集聚的扩散效应之一。

清代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现象，不仅促进了山西本省经济的进步，

使其成为富甲一方的省份，而且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全国乃至更大范围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以服务业和流通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则在为山西商人积累财富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西省内的生存和就业压力。

关键词： 山西商人 产业集聚 资本集聚 城市集聚 扩散效应

Abstract

Shanxi province located the east of the Huangtu altiplane. It is at the middle latitude. There are plentiful iron ore and coal mine. There were more people without enough soil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ondit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e was not well. There were not enough food. But the machining industry and mining had developed at a certain extent. The thickness population collected in the same area , brought much pressure about taking up an occupation and survivorship. So the Shanxi merchantman had the enough reason to do business all over the whole country.

With the great scope, long time and abroad business, Shanxi merchantman collected abundant fortune. They brought the fortune back to theirhomeland. Then the capital convergency was farmed. Some of the capital was invested in collecting soil and finance. That brought some result, such as soil annexed and farmers bankruptcy. The farmers who lost their soil left their homeland, some of them went to the other province, some of them were employed by the bosses of machining industry and mining. Some of them went into the cities to find jobs. The population collected offered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industry convergency. Then the industry convergency happened.

The population convergency and industry convergency brought the prosperity of cities. So the cities of their homeland spring up. Taiyuan city becam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re of the whole province. Pingyao city, Qixian city and Taigu city became the financial centre. Datong city, Guihuacheng city, Shahukou city and Fengzhen city became the trade centre between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Meng nationality. Haizhou city, Yuncheng city and Jiangzhou city became the commercial centre of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Xibaotou town, Hequ city, Qikou town and Yongji city became the carrying centre of the Huanghe river in Shanxi province.

The bazaars developed slowl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ut the temple fairs were flourished bit by bit.

The convergency of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we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convergency. At the same time, the city convergency accelerated the convergency of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It also influenced the economy and life around the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temple fair was brought by city convergency.

The convergency of the Sh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ccelerated the economy, brought fortune to the province, enlarged the home market, accelerated the society divided work.

Keywords: the Merchantman of Shanxi province Industry convergency
City convergency the Diffusibility domino effect

南开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南开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齐南
2006 年 11 月 28 日

经指导教师同意，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指导教师签名：	许檀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齐南
解 密 时 间：	年 月 日		

各密级的最长保密年限及书写格式规定如下：

内部	5 年（最长 5 年，可少于 5 年）
秘密★	10 年（最长 10 年，可少于 10 年）
机密★	20 年（最长 20 年，可少于 20 年）

南开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2006 年 11 月 28 日

绪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一般研究清代山西经济史的学者，以研究清代山西商人和山西票号问题为多。

0.1.1 山西商人研究

山西商人的研究以日本学者较早，其中以寺田隆信为著，其专著《山西商人研究》^①几乎是第一部以明清山西商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本书就山西商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进行论述，对山西商人的形象、特点和历史性质进行了讨论。此外，日本学者佐伯富^②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论著，对于山西商人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作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山西商人的营业范围、活动区域以及资本与获利情况等问题。

国内较早对山西商人的研究出现在张海鹏和张海瀛所编著的《中国十大商帮》^③中，书中由张正明、黄鉴辉、高春平撰写的“山西商帮”一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鼎盛时期等内容，并讨论了山西商帮的主要特点及其资本流向等问题。此后，张正明出版其专著《晋商兴衰史》^④，对山西商人的兴起、活动、特点、性质和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及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详尽叙述和剖析。黄鉴辉的专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⑤在山西商人的经商范围、经营行业、管理制度、商人家族等问题上均有详尽论述，并对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商品集散市场进行了讨论。刘建生等撰写的《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⑥将归纳和演绎分析、比较分析及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首次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对晋商的制度结构、

^①（日）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日文版出版于1972年。中文版由张正明、道丰、孙耀、阎守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

^②（日）佐伯富：《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社会文化史学》，1966年第1期，1974年10月编入《中国史研究》第2辑）、《清代塞外的山西商人》（《东方学会创立25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72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和内蒙古》（《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1973年11月版）、《清代山西商人》以及《山西商人的起源和沿革》（日本东方学会主编《东方学》，1979年7月）。

^③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④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1年再版。

^⑤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⑥刘建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制度配置、制度变迁和制度成本绩效的分析中,勾勒出晋商发展史的制度脉络,总结了晋商发展的制度演变轨迹,这在晋商研究领域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方法的突破。经君健先生在学界晋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前提下,提出“晋商学”的概念^①,使晋商研究领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许檀女士的“山陕会馆”系列个案研究^②,详尽、系统地分析了清代山陕商人在河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对清代河南商业城镇的发展规模、商品流通状况进行了详细讨论,特别是在研究中大量使用山陕会馆所留存的碑刻资料,开创了研究清代商业的资料新领域。王尚义的专著《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③,首次将山西的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相结合,对山西商人的商贸活动区域进行讨论。

山西商人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晋商兴衰问题、晋商与政府的关系、晋商会馆、晋商经营管理、晋商的历史性质、晋商精神及思想理念、晋商行商范围和经营项目、晋商与其他商帮的比较问题等等,下面我们就做一个回顾。

在晋商兴衰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者寺田隆信^④认为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和“开中法”的实施是山西商人兴起的先决条件。张正明^⑤认为明政府为“九大边镇”筹集军饷而推动了“开中制”,从而为晋商兴起提供了契机。同时,山西地处中原的有力地理条件也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因素。黄鉴晖^⑥认为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晋商兴起的物质基础。刘建生^⑦认为晋商的兴衰是内部制度变迁的过程。李心纯、林和生^⑧认为,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走向成功的。梁四宝^⑨认为山西人口的迁徙推动了晋商的兴起。刘建生、王

^① 经君健:《晋商·晋商学“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序”》,《中国经济师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 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⑥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⑦ 刘建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李心纯、林和生:《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⑨ 梁四宝、武芳梅:《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迁徙与晋商的兴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瑞芬^①认为山西商品货币的发展、晋商资本实力的增强和政府的倡导与扶持等原因促成山西典当商人的发展。王明星^②认为明清时期晋商衰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投资于新式的产业,没有将票号中心南移上海,没有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经营项目以及培养人才的失误等。

在官商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刘建生^③认为盐商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盐商一方的行为造成的,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双方互动合作从而形成的长期合作关系就是政府与盐商的设租——寻租关系。刘建生、燕红忠^④利用成本绩效理论对晋商的官商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官商结合既为晋商的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也是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韦庆远、吴奇衍^⑤认为皇商范氏的商业经营成就和巨大财力是成为皇商的重要前提,良好的社会关系为其提供了政治庇护,显赫的商业地位则建立了与民商激烈竞争的基础。腐朽的社会生产关系对商人的压榨是范氏衰败的最根本原因,而官商制度则是导致皇商衰亡的根本原因。认为皇商经济是一种依附经济,在封建专制的严密控制下,没有任何独立经营自由。

在晋商会馆的研究上,许檀^⑥利用在河南山陕会馆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到的碑刻资料,对周口、洛阳、赊旗镇、北舞渡镇和朱仙镇等清代商业城镇进行了系列个案研究,对其发展规模、商品流通、及山陕商人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刘建生^⑦认为晋商会馆通过联乡情、笃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方便仕商、办理善举等活动,使晋商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商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李刚、宋伦^⑧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本抑末”政策,官商不相交接,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使

① 刘建生、王瑞芬:《明清以来山西典当的发展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王明星:《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文史研究》1996年1~2期。

③ 刘建生、刘卓君:《政府与山西盐商的改租——寻租关系》,《学术论丛》2002年6期。

④ 刘建生、燕红忠:《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⑤ 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⑥ 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⑦ 刘建生:《山西会馆考略》,《中国地方志》2003年增刊。

⑧ 李刚、宋伦等:《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仲裁商务纠纷,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宋伦^①通过对搜集到的196所山陕会馆资料分析研究,认为工商会馆是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制度创新,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民间社会管理组织和设施。会馆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明清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历史变迁;是适应明清时期的社会条件而建立的组织;是管理外帮商人的工具,行会的办事机构,商人自发设置的自治团体和社会保障组织,传播本土文化。成为官方管理机构之外平衡社会转型的民间自发管理体制。此外,宋伦^②还认为山陕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山陕商帮的形成。

在晋商经营管理问题研究上,张正明^③首次将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加以总结概括,提出晋商经营制度主要包括: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订立号规和账簿制度等。高春平等^④认为股份制是晋商在当时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商帮和国际性商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晋商的股份制未脱离封建经济的范畴,尚未能发展到现代股份资本的程度,而且十分保守。刘建生^⑤认为清代晋帮茶商实现了从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促进了国内茶叶的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晋商性质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研究上,刘建生^⑥指出,晋商的封建性表现在晋商自身的经营活动保留着旧式商人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与清政府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及与手工业经济的联系上。对于近代工业,不同时期的晋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深刻变化反映了晋商由封建商人向近代资本家转变。张正明^⑦认为晋商经营近代工商业标志着其向近代资产者蜕变,但仍带有封建烙印,客观条件不具备是晋商未能完成这一蜕变的主要障碍。毕苑^⑧认为晋中地区的商人阶层是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结交高官,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而具有双重角色,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经商致

^① 宋伦:《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宋伦:《论明清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特点——以工商会馆为例》,《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③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④ 高春平等:《明清晋商股份制浅析》,《学术论丛》1998年第2期。

^⑤ 刘建生:《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刘建生:《试论晋商的封建性》,《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⑦ 张正明:《晋商向近代资产阶级蜕变的问题》,《晋阳学刊》2002年第5期。

^⑧ 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富后多数流向仕途。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现的特色。

在晋商经营行业及行商范围研究上，王尚义^①认为晋商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初至清中叶，主要以商贸活动为主；第二阶段从清中叶至民国初年，主要以票号商业活动为主。刘文智^②认为清代前期的晋商已经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林永匡、王熹^③认为清代山西商人与新疆进行了广泛的丝绸贸易活动。王兴亚^④指出，明清时期河南地区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山陕商人活动活跃。遍布于河南各府州县城及主要集镇，促进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陶德臣^⑤认为晋商对西北茶市的经营具有多方面意义，它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曹新宇^⑥对清代山西贩粮路线的演变历史提出反例，他认为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粮食的运销也支持了相关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清代晋中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口外蒙古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互动关系。邵继勇^⑦认为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同时指出，票号经营是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结果，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高春平^⑧指出晋商由明初崛起于北部边镇，为北部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农村自由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定光平^⑨认为晋商于羊楼洞一带采办茶叶，促进了当地茶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羊楼洞茶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羊楼洞制茶手工业的兴起，又对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晋商资本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嬗变，其茶庄的经营形态也逐步由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并出现了向近代机器制茶工厂过渡的趋势。

在晋商精神问题研究上，葛贤慧^⑩指出，山西商人扎根于山西悠久深厚的历

① 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刘文智：《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③ 林永匡、王熹：《清代山西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④ 王兴亚：《明清时期河南的山陕商人》，《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⑤ 陈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
 ⑥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8年第2期。
 ⑦ 邵继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年3期。
 ⑧ 高春平等：《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晋阳学刊》2002年4期。
 ⑨ 定光平等：《清以降羊楼洞茶区的山西商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⑩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史文化土壤中,山西商人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创业进取之路。王继军^①认为晋商在兴起和发展中形成的诚实信用等法律文化特点是建立在“人身法”文化和农业文化基础上的,与建立在“市民法”文化基础上的近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相比较有着根本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中,晋商诚实信用的法律文化精神仍然需要发扬光大。杨艳红^②强调文化与伦理在社会制序的结构与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也即儒商制序。在这种制序中,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张奎胜^③和王劲松^④均指出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中普遍适用的原则,也是晋商在激烈竞争中得以制胜的法宝之一。

在晋商与其他商帮、商人的比较研究上,张正明^⑤将晋商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及荷兰商人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刘建生、燕红忠^⑥认为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两大地方商人集团,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使其管理阶层的划分、商业运营中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呈现出不同特点。晋商与徽商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资利用的资源。李一鑫^⑦认为明清晋商、徽商的兴起具有深厚的文化思想根源。梁四宝^⑧、燕红忠认为,晋商与江右商帮均是明清时期较有影响的地方商人群体,但相对于晋商较强的群体意识、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商业竞争观念而言,江右商帮则表现出资本分散、竞争力弱及角色意识较差的特点,从而使其逐渐衰落。

此外,在晋商家族、算学等方面的研究上,许多学者对晋商家族与个人的历史问题作了研究。如张正明《从族谱看山西商人家族》^⑨、《山西商人范毓馥家族的谱系和事迹》^⑩,松浦章《山西商人毓馥一族的系谱和事迹》^⑪,李华《清

① 王继军等:《晋商诚实信用法律文化特点研究》,《理论探索》2002年4期。

② 杨艳红:《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1期。

③ 张奎胜:《诚信经营看晋商》,《当代经理人》2002年11期。

④ 王劲松:《山西票号与社会信用》,《山西档案》2002年5期。

⑤ 张正明:《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晋阳学刊》1994年1期。

⑥ 刘建生、燕红忠:《论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1期。

⑦ 李一鑫:《从晋商徽商看国史脉络》,《炎黄春秋》1998年1期。

⑧ 梁四宝、燕红忠:《江右商帮与晋商的差异及其主要特征》,《生产力研究》2002年4期。

⑨ 张正明:《从族谱看山西商人家族》,《谱牒学研究》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⑩ 张正明:《山西商人范毓馥家族的谱系和事迹》,《谱牒学研究》第2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②等。另外，刘秋根^③和张正明^④认为晋商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独特的记账制度，并指出这种记帐制度效率很高。

0.1.2 山西票号及相关问题研究

早在 1912 年 8 月 16 日《新闻报》刊登的《票商顾全大局》一文便对晋商票号的活动有了一定的关注。李宏龄撰写的《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初步探讨了山西票号盛衰原因。20 世纪 30、40 年代出版了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和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是中国学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同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如《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和《记山西票号》以及《山西票庄之今昔》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大都是回溯性质的文章，缺乏对山西票号及山西商人的系统分析。

在当代的票号研究中，张国辉的《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⑤是较早研究票号的专著，书中对鸦片战争前后钱庄、票号的变化，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票号的业务发展情况进行讨论，并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对本土钱庄、票号的影响进行论述。黄鉴辉《山西票号史》^⑥考察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史，它描述了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从中可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近代金融资本信息的有效传播、中国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商业革命，以及工商业发展中的封建主义色彩。孔祥毅的论文集《金融票号史论》^⑦，收录了编者自 1979 年至今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山西票号和金融研究的论文。认为山西票号包括明清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并指出山西票号对中国明清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⑧。还指出“票号的蜕化是其衰亡的根源，它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与官吏勾结、攀结政府，钻进了财政体系之中，脱离了产生它自身的商品经济。随着清政府财政

年版。

① 松浦章：《山西商人毓馥一族的系谱和事迹》，[日]《史泉》第 52 期。

② 李华：《清代山西平阳大商人亢百万》，《清史研究通讯》1984 年第 4 期。

③ 刘秋根：《明清算术书中的合伙经商各例题情况表》，载《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④ 张正明等：《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晋阳学刊》1994 年 1 期。

⑤ 张国辉：《晚清钱庄票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

⑥ 黄鉴辉：《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年初版，2002 年再版。

⑦ 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年版。

⑧ 孔祥毅：《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金融研究》2002 年 8 期。

危机的加深,票号也就逐渐走向衰亡”^①。此外,孔祥毅所编著的《山西票号研究》^②论文集中收录了大量近年来其本人及其他学者对山西票号业及清代山西金融业的研究成果。

此外,史若民在其专著^③中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直至衰败的历史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针对山西票号的业务情况、组织制度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释和肯定。董继斌、景占魁等在其专著^④中提出山西票商具有现代金融的雏形,它的两权分离,公积金制度和风险防范金的提留,以及转账业务、异地结算、票据和贴现、汇票的防伪以及劳力和智力资本的入股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意识。王尚义等^⑤认为晋商票号的创建促进了山西金融业的发展。高春平^⑥认为晋商所经营的票号、账局、钱庄、当铺、印局等都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锥春普^⑦指出山西票号对于中国金融的创新在于开汇兑业务之先河,实施网络式经营,是存、放、汇三大业务的有机结合,促进了高利贷资本向借贷资本的转化。刘可为^⑧认为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在于:第一,经营方针上的大幅度摇摆,从依靠官款存汇向大量放款变化,是山西票号在战争带来的信用危机中倒闭的直接原因。第二,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钝和不适应,使山西票号丧失了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机会。第三,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满清王朝的殉葬品。在山西商人和票号的研究史料方面,山西学者出版了多部史料集。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山西票号的史料,后几经充实于2002年出版发行了多达110万字的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⑨,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此外,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⑩;张正明、薛慧林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⑪;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⑫等资料

^① 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金融票号史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② 孔祥毅:《山西票号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董继斌、景占魁等:《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⑤ 王尚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 高春平:《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4期。

^⑦ 锥春普:《山西票号业与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5期。

^⑧ 刘可为:《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管理世界》1997年4期。

^⑨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⑩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⑪ 张正明、薛慧林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⑫ 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集均为山西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除以上两类主题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历史上山西经济发展、集市、农业、赋役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行龙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①除对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外,对近代以来山西人口、水资源及水案、灾荒、集市、民教冲突、祁太秧歌等分专题进行了研究。其中行龙^②以山西清代、民国各州县地方志资料为基础,通过解剖典型、计量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作一探讨,认为清代山西集市发展缓慢,但庙会发展超过集市。徐月生主编的《山西经济开发史》^③一书以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开发的史迹为依据,主要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方面加以阐述,如实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山西经济开发的真实状况,勾勒出其兴衰变化的历史轨迹,揭示其演变规律。杨纯渊在其编著的《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④及《山西经济史纲要》^⑤等两部著作中,探讨了山西地区由原始社会以来的历史地理发展状况,对历史上山西地区商业和水陆交通的发展进行研究。从而从整体上把握山西经济发展的脉络,揭示其演变规律。

在清代山西的农业问题上,陈国生^⑥认为清代山西农业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杂粮种植面积增大,水稻种植得到推广;其二,棉花、烟草的种植区域形成;其三,种植枣、桃、梨、核桃等的经济林区形成。李辅斌^⑦认为清代直隶棉花种植范围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产量巨大,供应周边省份;其时山西地区的棉花种植主要分布在晋南汾、涑河谷地,民间纺织较盛。此外,直隶的蚕桑业分布范围比较大,山西的潞泽地区也是蚕桑业较为发达地区。此外,李辅斌在其另一篇论文^⑧中认为清代山西地狭人众,造成清中期传统农业区的深度垦殖,但其产出仍不敷人口增长食用,故人地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李三谋^⑨认为清代,忻州、静乐、临县以北属于晋北农业区,该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广种薄收;同时,该地牧业条件良好,因而形成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发

^① 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行龙:《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徐月生:《山西经济开发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④ 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杨纯渊:《山西经济史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陈国生:《清代山西农业结构的变化》,《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

^⑦ 李辅斌:《清代直隶山西棉花种植和蚕桑业的分布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6年第4期。

^⑧ 李辅斌:《清代前期直隶山西的土地复垦》,《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5年第3期。《清代中后期直隶山西传统农业区垦殖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4年第2期。

^⑨ 李三谋:《清代晋北农业概述》,《古今农业》,1998年第1期。

方式。但随着草地被日益开垦为农田,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失去依托。李震^①认为清代太原县的农田灌溉设施较为发达,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在太原县农业经济中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韩晓莉^②认为光绪末年,清政府在内蒙古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使山西北部的蒙古地区因土地开垦而迅速发展起来,人口激增,逐渐形成既有别于中原内地的市镇村落。

卫广来^③认为清道光以前山西的赋税包括田赋、丁银、附加费、加征、科派和徭役等方面,并分析了山西地租形态与租率。

以往研究清代山西经济的学者对山西商人及山西票号关注较多,而对清代山西产业集聚,山西商人异地经商给山西本省带来资本集聚及其影响、山西省内城市发展状况等问题关注稍显不足。本文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于对清代山西经济中的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以及本地的城乡商业,包括城市的空间分布、城内商业的发展规模、城市集聚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对清代山西经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梳理。

第二节 本文的基本框架

0.2.1 本文的基本框架

绪论:包括学术史回顾、本文基本框架等两部分。

第一章:生态环境与小区划分。主要从山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区内的基本交通条件等问题入手,对清代山西经济发展的背景环境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将山西省划分为四个经济小区,即晋中区、晋南区、晋东南区、晋北区。

第二章:清代山西的农业。在对清代山西的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清代山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分小区进行讨论。

第三章:清代山西的工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工矿业两部分,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工矿业在清代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并且在烟草加工业、盐业、冶铁业等行业中显现出产业集聚的特点。

第四章:山西商业的发展概况。讨论了山西重商习贾的观念、山西商人的经商范围及所经营的行业。山西商人在长时间、广泛围的商贸活动中,聚集了

^① 李震:《清代太原县的农田灌溉》,《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

^② 韩晓莉:《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2年第3期。

^③ 卫广来:《论清代道光前的山西赋税与地租》,《沧桑》2005年第1期。

大量的商业资本，他们将这些资本运回本乡本土，在山西本地形成资本集聚。

第五章：清代山西城市的发展。以个案研究为中心，对省内部分城市的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从而突出不同城镇的不同特点。城市发展总体表现出繁荣、数量增多的特点，特别是在各个经济小区均出现一批特征相似的城市，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核心城市，这些均表明清代山西境内城市集聚逐渐形成。

第六章：清代山西的农村集市。清代山西集市在数量和场次上均没有大的变化，集市交易商品种类也相对贫乏，其原因在于山西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后，自然灾害等原因。相比之下，庙会的发展迅速，在规模、商品数量、参与人数上均超过集市，对集市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结语：集聚是指资源、要素和各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和过程。清代山西境内经济的发展呈现了集聚化特点，出现了工矿业产业集聚，商业资本集聚，商业及金融业等新型产业的集聚，最后促进了城市集聚。城市集聚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繁荣；凸现了所在经济小区的经济特点；进一步加快了民人脱离土地、外出经商的步伐，从而带动境内产业进一步发展；引起民风、民俗的一些改变。发生在清代山西经济的“集聚效应”使山西成为富甲一方的省份，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社会分工的发展。

0.2.2 所使用资料

本文所用到的资料主要有：地方志、正史、文集、笔记、游记等。山西地区的地方志数量相对较多，所编纂的年代涵盖了明代直至当代，本文以利用清代编修地方志为主，兼及民国时期以及现代编修的地方志，共百余部。清人所写文集、笔记、游记，如李燧著《晋游日记》、李廷玉著《游蒙日记》和李宏龄著《同舟公告》、《山西票商成败记》。清代的山西包括蒙区的一部分，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 19 世纪 90 年代游历蒙古腹地，并著有《蒙古及蒙古人》（共二卷）；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以上有关蒙古地区的著作及资料荟萃均为本文提供了的珍贵资料。山西学者所编的资料集，如《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票号史料》、《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等，还有山西学者所出版的著述及论文，均对本文有所帮助。此外，笔者在山西省内晋中市、解州、洪洞县、孟县、雁门关等地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收集到一批珍贵的碑刻资料。

0.2.3 创新点

第一，在论文当中大量使用前人关注较少的碑刻资料。其中一部分为笔者多次赴山西各地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到的；另一部分为近年来山西学者整理出版的。利用这些清代留存下来的碑刻资料，对相关城镇进行较深入的个案考察，对其发展脉络、商业构成、商业规模等得出一些具体、详实的认识。

第二，本文选取了数个山西省内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考察，对其发展脉络、发展规模、商品流通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是以往研究中所欠缺的。

第三，利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对清代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现象进行分析。清代山西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例如产业集聚、资本集聚和城市集聚等，这些具体的“集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本的集聚带来新兴产业的集聚，而产业集聚又促成了城市的集聚，城市集聚进一步促进了产业集中，同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带来影响。发生在清代山西经济中的“集聚”现象使得山西在农业生产条件并非优越的条件下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富省”之一。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小区划分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相望,南抵黄河与河南省为邻,东依太行山与河南、直隶两省毗连,北部过长城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因地处太行山以西,故名山西。山西地貌整体上是一处被黄土覆盖的山地型高原,通称“山西高原”,总面积为 2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1 024 万多^①。境内起伏不平,有平原、丘陵和山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其中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35.7%,丘陵占 44.6%,平原仅占 19.7%。全省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1 000 米至 2 000 米之间。最高点为五台山的北台叶斗峰,海拔 3 058 米,最低点在垣曲县境内西阳河入黄河处,海拔仅 180 米。^②东部太行山、西部吕梁山纵贯南北,中部由北而南分布有大同、忻定、太原、临汾、长治和运城等盆地。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散列其间。

山西地处中纬度,介于东经 110°15'—114°33',北纬 34°34'—41°43'之间,^③距海不远,但因山脉阻隔,夏季风影响不大,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普遍气温较低,并且北寒南暖,年平均气温 3°—14°C,昼夜温差大,南北温差也大,全年南北气温平均相差 10°C 多。山西地形多样,高差悬殊,因而既有纬度地带性气候,又有明显的垂直变化。西部黄河谷地、太原盆地和晋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平均温度在 8°—10°C 之间。临汾、运城盆地年均温度达 12°—14°C。冬季气温全省均在 0°C 以下,夏季全省普遍高温,7 月份气温介于 21°—26°C 之间。山西无霜期南长北短,平川长山地短。大同盆地为 110—140 天,五台山仅 85 天,忻州盆地以北和东部山区 135—155 天,临汾、运城盆地则长达 200—220 天。地表水资源不足,全年降雨量较少,且雨量分布不均,全省年降水量在 400—650 毫米,但季节分布不均匀,夏季 6 月—8 月降水高度集中且多暴雨,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60%以上^④。全省降水受地形影响很大,山区较多,盆地较少。不良的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① 按乾隆二十七年统计。参照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甲表 7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58 页。

^② 《山西通志·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

^③ 王尚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 页。

^④ 《山西通志·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

山西耕地总面积 49 553 896 亩^①，省内森林覆盖率较低，约只有 2 万多顷的山地林，农业生产空间欠广。山西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高粱、豆类和薯类；经济作物有棉花、烟叶、甜菜、胡麻、油菜籽等。大同、太原、忻定、临汾和运城等盆地是山西省的主要农作区。^②

山西植物资源分布，从南到北可划分为：南部和东南部是以落叶阔叶林和次生落叶灌丛为主的夏绿阔叶林或针叶阔叶混交林分布区，也是植被类型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中部是以针叶林及中生的落叶灌丛为主、夏绿阔叶林为次分布区，是森林分布面积较大的地区；北部和西北部是温带灌丛和半干旱草原分布区，森林植被较少，优势植物是长芒草、旱生蒿类和柠条、沙棘等。^③

山西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中以池盐、煤、铁、铝土等为最。^④运城池盐在明清两朝产量巨大，是晋南最为重要的产业，也是山西商人赖以发迹的资源。山西境内煤炭资源得天独厚，分布于全省 90 多个州县，明以前山西的煤炭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和利用。铁矿是山西固有天然资源，晋东南泽州府的阳城、凤台和潞安府长治县的荫城镇，当时号称三城，以出产优质铁货闻名。^⑤

受地势影响，全省 1 000 多条河流分属黄河和海河两大水系。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河长在 150 公里以上的有 240 多条，其中流域面积在 4 000 平方公里左右的、河长在 150 公里以上的有汾河、沁河、涑水河、三川河、昕水河、桑干河、漳沱河、漳河等。其中，汾河最长，是黄河的一级支流，纵贯山西南北，是山西境内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宁武县管涔山的雷鸣寺泉，即所谓“汾源灵沼”。汾河流经宁武、静乐、娄烦、太原、清徐、交城、祁县、文水、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临汾、襄汾、曲沃、绛州、稷山、河津等 20 多个州县，在万荣县荣河镇北寨子村西注入黄河，全长 695 公里，流域面积 39 471 平方公里，年总流量 25.9 亿立方米。上游多为山区，中下游多为平川地带。从临汾至北寨子约 200 公里，河道比较平缓，水面较为宽阔，适于通航。汾河的主要支流有碾河、岚河、潇河、文峪河、昌源河、象峪河、乌马河、洪安涧河和浍河等。^⑥

^① 参照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乙表 77 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各直省府州厅户口、田地及额征田赋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401 页。

^② 参看《山西通志·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

^③ 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2 页。

^④ 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3 页。

^⑤ 在随后的章节中有详细讨论。

^⑥ 参看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大典》卷一，《省情综览》之第五编《经济·交通邮电·水运》，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版。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北自萨拉齐厅西包头镇入境，抵芮城县风陵渡而东折，南至垣曲县碾盘沟出境，途经 20 多厅县 600 余个村庄，流程 1 000 余公里。黄河航道自萨拉齐厅西包头镇始，止于垣曲县的马蹄窝，根据黄河水急浪多，河面宽窄不一，水位高低无定，部分河段游荡性大和壶口瀑布截流情况，分为四段：1、西包头镇至禹门口，属峡谷型河道。2、禹门口至风陵渡，为游荡性河道，冲淤剧烈，游荡多变，主河道不定，只有横渡，少有纵向运输。3、风陵渡至三门峡，河面较宽，水流平缓，适于航行。4、三门峡至马蹄窝，属峡谷型河道，可以横渡。^①

明代，全国的驿路交通已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山西全境有重要驿路交通线十条。驿站数量居于全国前列，仅次于四川、云南、广西、湖广、陕西，居全国第六位。清代山西省地域较明代大，其中东西南三面与明略同，北部超出明代山西省范围，涉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当时山西设驿站 125 个，急递铺 1 059 个，分别位于全国第七和第三。省治太原“正当孔道交通之冲”，东经平定、井陘可达京师；南经平阳、蒲州过黄河可至陕西潼关、西安；西经汾州，从军渡过黄河至陕西吴堡；北经忻州、代州达大同，可与蒙古相通；东北经繁峙、灵邱、广昌，过紫荆关入冀；西北经岢岚、偏头关，达陕西榆林等地；东南经沁州、潞安、泽州，越太行山入豫。省内以省治太原为中心，有六条重要官道驿路，它们是：一、东南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经徐沟县同戈驿，祁县盘陀驿，武乡县南关驿、权店驿，沁州沁阳驿，襄垣县虢亭驿，屯留县余吾驿，长子县漳泽驿，高平县长平驿、乔村驿，凤台县太行驿、星轺驿，到河南境内。二、西南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经徐沟县同戈驿，祁县贾令驿，平遥县洪善驿，介休县义棠驿，灵石县瑞石驿、仁义驿，霍州霍山驿，赵城县赵城驿，洪洞县普润驿，临汾县建雄驿，太平县史村驿，曲沃县侯马驿，闻喜县涑川驿，安邑县宏芝驿，临晋县樊桥驿，永济县河东驿，至陕西潼关驿。三、西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经平遥县洪善驿，汾阳县汾阳驿，永宁州吴城驿、玉亭驿、青龙驿，到陕西吴堡县河西驿。四、北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分两路：一路经阳曲县成晋驿，忻州太原驿，崞县原平驿，代州雁门驿，山阴县山阴驿，怀仁县西安驿，左云县军站，右玉县军站，宁远厅站，归化厅站，到绥远城将军驻所；另一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经代州广武站，朔州马邑乡广武驿，朔州塘站，

^① 参看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大典》卷一，《省情综览》之第五编《经济·交通邮电·水运》，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版。

平鲁县军站，右玉县军站，到绥远城将军驻所。五、东北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经榆次县鸣谦驿，寿阳县太安驿、寿阳驿，孟县芹泉驿，平定州平潭驿、柏井驿、甘桃驿，井陘县井陘驿，为山西通达京师之“大驿”，全程 1 150 里，有桥 11 座。六、西北路，自阳曲县临汾驿起，经岚县、岢岚、五寨、偏关入陕西以至伊犁。^①

清代，山西境内已经形成一条重要的商道，即南茶北运商道，山西商人把闽、粤和江、淮流域的各种物资，经水路分别集聚到汉口、周口，之后经开封、怀庆府（沁阳）、泽州、潞安、子洪运抵太谷、祁县，经过加工分包，再继续北运，沿着旧日的军事道路雁门关山区，经忻州、原平，出雁门关，至山阴县黄花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走西口（归化城）。从西口进入蒙古的物资，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由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则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再经库伦——恰克图——伊尔库兹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进入欧洲市场。这条商路在山西的长城线上与明代已经形成的北京——张家口——大同——杀虎口——榆林——凉州——甘州——嘉峪关的东西商路相交叉，同时又位于形成于汉朝、成熟于隋唐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延长线西安——潼关——太原——北京。^②

第二节 行政区划与经济小区

1.2.1 行政区划

明初，山西共领五府、三直隶州、七十七县。清顺治时，山西建制仍沿明制，雍正、乾隆年间有较大变动：雍正二年（1724）增平定、忻、代、保德、解、绛、吉、隰八直隶州，次年（1725）又增宁武、朔平两府，雍正六年（1728）升蒲州及直隶州泽州为府。乾隆六年（1741）置归绥道，领归化城厅和绥远城厅，二十五年（1760）增领萨拉齐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城厅、和林格尔厅。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吉州为府隶州，属平阳府，同年升霍州为直隶州，此时，山西巡抚共领九府、十直隶州、归绥六厅。

九府为：

^① 参看杨纯洲：《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99—500 页。

^② 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见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66 页。

太原府，府治阳曲，辖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岢岚州、岚县、兴县，共计 12 州县。

汾州府，府治汾阳，辖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永宁州、宁乡，共计 8 州县。

潞安府，府治长治，辖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平顺，共计 8 州县。

泽州府，府治凤台，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共计 5 州县。

平阳府，府治临汾，辖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岳阳、曲沃、翼城、汾西、吉州、乡宁，共计 11 州县。

蒲州府，府治永济，辖永济、临晋、虞乡、猗氏、万泉、荣河，共计 6 州县。

大同府，府治大同，辖大同、怀仁、山阴、应州、浑源州、灵丘、广灵、广昌、阳高、天镇，共计 10 州县。

宁武府，府治宁武，辖宁武、偏关、神池、五寨，共计 4 州县。

朔平府，府治右玉，辖右玉、朔州、马邑、左云、平鲁，共计 5 州县。

十直隶州为：

辽州，辖和顺、榆社，共计 2 州县。

沁州，辖沁源、武乡，共计 2 州县

平定州，辖寿阳、盂县、乐平，共计 3 州县。

忻州，辖定襄、静乐，共计 2 州县。

代州，辖五台、繁峙、崞县，共计 3 州县。

保德州，辖河曲，共计 1 县。

解州，辖安邑、夏县、平陆、芮城，共计 4 州县

绛州，辖闻喜、河津、稷山、绛县、垣曲，共计 5 州县。

霍州，辖赵城、灵石，共计 2 县。

隰州，辖蒲县、大宁、永和，共计 3 州县。

归绥六厅，归化城厅、宁远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等 6 厅。

清代山西各府和直隶州所辖州县详见表 1—1。

表 1-1 清代山西九府十直隶州所属州县一览表^①

府州别	治所	州县数	所属州县
太原府	太原	12	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岚县、兴县、岢岚州
汾州府	汾阳	8	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永宁州、宁乡
潞安府	长治	8	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平顺
泽州府	凤台	5	凤台、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
平阳府	临汾	11	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岳阳、曲沃、翼城、汾西、吉州、乡宁
蒲州府	永济	6	永济、临晋、虞乡、猗氏、万泉、荣河
大同府	大同	10	大同、怀仁、山阴、应州、浑源州、灵丘、广灵、广昌、阳高、天镇
宁武府	宁武	4	宁武、偏关、神池、五寨
朔平府	右玉	5	右玉、朔州、马邑、左云、平鲁
辽州	辽州	2	和顺、榆社
沁州	沁州	2	沁源、武乡
平定州	平定州	3	寿阳、盂县、乐平
忻州	忻州	2	定襄、静乐
代州	代州	3	五台、繁峙、崞县
保德州	保德州	1	河曲
解州	解州	4	安邑、夏县、平陆、芮城
绛州	绛州	5	闻喜、河津、稷山、绛县、垣曲
霍州	霍州	2	赵城、灵石
隰州	隰州	3	蒲县、大宁、永和
归化城厅	归化城	6	归化城厅、宁远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

1.2.2 经济小区

山西是多山的省份，境内水流丰富，山系河流对山西历代政区的沿革与经济区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明显更大于行政区划。山西省东西两侧是太行山和吕梁山，南北两端有中条山、恒山、五台山、系舟山、云中山及太岳山等分布其间。这些山脉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整体表现为北高南低。同时，相间一些盆地，即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及上党盆地。由于盆地、山系相间，省内海拔高低相差 2 800 多米，地势起伏多变，地貌类型多样，因此自然环境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太原师范大学的王尚义先生对清代山西的地理历史状况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以下内容参照王尚义先生的研究成果。^②

^① (清) 觉罗石麟修，储中文纂：雍正《山西通志·疆域》，卷一，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以及（清）王轩等：光绪《山西通志·疆域》，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

^② 参看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8—49 页。

山西境内由于山河地势阻隔形成四大自然单元区，其划分依据如下：

其一，北东向的恒山成为温带与暖温带的天然分界线。恒山以北属温带，阳方口以西，山脉走向改变，暖温带和温带的界线表现不甚明显。综合各地理要素，阳方口以西，黑驼山——人马山一线以南属暖温带，以南为暖温带灰褐土灌丛草原，以北是温带栗钙土干草原。恒山——黑驼山——人马山一线是阻隔省内温带与暖温带的界线，由此说明，历史时期恒山对山西自然地带的划分、对当时不同植被区域的形成所起的阻隔作用十分明显。

其二，太岳山一线在暖温带内的阻隔作用。虽然太岳山一线均属暖温带，但在暖温带内也有一条近东西向的界线值得注意，它大致从昔阳东南白阳山起，经和顺、榆社北部，而后沿太岳山北段往南至霍山、五鹿山。此线以南雨量较多，普遍在 550 毫米以上，温度较高，极端最低气温一般不低于 -23°C 。此线以南地带性土壤为碳酸盐褐土，以北为淡褐土（吕梁山以东）。从年均温看，此线以北为 $7-10^{\circ}\text{C}$ ，以南为 $11-14^{\circ}\text{C}$ ，大于等于 10°C 。无霜期，以北为 130—160 天，以南为 200 天左右。主要作物，以北有玉米、高粱、冬麦、棉花，一年两作，二年三作；以南为冬麦、棉花，一年二作。天然植被，以北为榆、槐、杨等，以南为椿、油松、桑等。此线南北自然条件多有不同，属地带性分异现象。由于它有很大一部分跨越大地貌单元，故虽不似恒山——黑驼山——人马山界限清晰，屏障作用显著，但实际上它是一条从暖温带向温带过渡的起始线。从以上多项性态特征也能看出其明显的阻隔作用。当然，各盆地、吕梁山以西，其性态特征亦多有不同，但从范围、综合生态特征差异明显表现来看，全省境内分为三大区：晋北区、晋中区、晋南与晋东南区。

其三，霍山往南至舜王坪一线在晋南、晋东南区内的阻隔作用。从对经济的影响、平均海拔、降雨量、植被等分析，此线以东平均海拔明显高于西部，降水量东部（晋东南）亦高于西部（晋南）。

雨量、海拔高度不同则会影响植被，尤其是农作物的生长及其种类。同时，霍山往南至舜王坪一线恰好是晋东南沁河与晋南汾河的分水岭。省内的暖温带三个区与温带一个区是受自然山系阻隔明显形成的四个部分。各部分内自然因素、性状特征等明显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作物分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山西的经济区域划分为四个板块，参见表 1-2：

晋中区，包括太原府 1 州 11 县，汾州府 1 州 7 县，平定州 3 县。晋南区，包括平阳府 1 州 11 县，蒲州 6 县，解州 4 县，绛州 5 县，霍州 2 县，隰州 3 县。

晋东南区，包括潞安府 8 县，泽州府 5 县，辽州 2 县，沁州 2 县。晋北区，包括大同府 2 州 8 县，朔平府 1 州 4 县经济区，宁武府 4 县，忻州 2 县，代州 3 县，保德州 1 县，归绥六厅。

表 1-2 山西各经济小区所属州县一览表

小区	府、直隶州	所属州县	县厅数
晋中区	太原府	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清源、交城、文水、岚县、兴县、岢岚州	12
	汾州府	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永宁州、宁乡	8
	平定州	寿阳、孟县、乐平	3
	合 计		23
晋南区	平阳府	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岳阳、曲沃、翼城、汾西、吉州、乡宁	11
	蒲州府	永济、临晋、虞乡、猗氏、万泉、荣河	6
	解州	安邑、夏县、平陆、芮城	4
	绛州	闻喜、河津、稷山、绛县、垣曲	5
	隰州	蒲县、大宁、永和	3
	霍州	赵城、灵石	2
	合 计		31
晋东南区	潞安府	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平顺	8
	辽州	和顺、榆社	2
	沁州	沁源、武乡	2
	泽州府	凤台、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	5
	合 计		17
晋北区	大同府	大同、怀仁、山阴、应州、浑源县、灵丘、广灵、广昌、阳高、天镇	10
	朔平府	右玉、朔州、马邑、左云、平鲁	5
	宁武府	宁武、偏关、神池、五寨	4
	忻州	定襄、静乐	2
	代州	五台、繁峙、崞县	3
	保德州	河曲	1
	归绥六厅	归化城厅、宁远厅、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和林格尔厅	6
	合 计		31
总计			102

第二章 清代山西的农业

第一节 清代人口的数量及土地状况

2.1.1 清代人口数量及分布

清初,受明末战乱影响,山西人口大幅度减少,到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才有所改变,顺治十八年(1661)山西地区人口为 627.87 万,康熙二十四年为 678.03 万,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政府统计的山西人口数字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 1 023.99 万,乾隆五十六年(1791)达到 1 338.7 万人,此后山西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道光二十年(1840),山西人口达到 1 489.2 万。光绪三年(1877),山西人口达到高峰即 1 634.3 万。此后,由于连年灾荒,瘟疫流行,加之清政府内外交困,人口大量流亡,至光绪十四年(1888),人口锐减至 1 098.4 万,宣统三年(1911),减至 1 009.9 万,参见表 2-1。

表 2-1 清代山西人口表

年代	人数(万)
顺治十八年(1661)	627. 869
康熙二十四年(1685)	678. 026
雍正二年(1724)	750. 9738
乾隆二十二年(1757)	965. 42
乾隆二十七年(1762)	1023. 99
乾隆五十六年(1791)	1338. 7
嘉庆十七年(1812)	1400. 421
道光二十年(1840)	1489. 2
咸丰七年(1852)	1589. 2
同治十一年(1872)	1639. 27
光绪三年(1877)	1643. 3
光绪十三年(1887)	1065. 8
光绪十四年(1888)	1098. 4
宣统三年(1911)	1009. 9

资料来源: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各省清代人口数统计表》的核算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页。

由上表可以知道,清代前期的山西人口,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前为一个阶段,人口大体在 600—900 万之间。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上升为第二个阶段,人口达到千万以上,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山西人口已近 1 500 万

人。

表 2-2 嘉庆 25 年 (1820) 山西各府州人口密度统计

府州别	人口	面积 (平方公里)	密度
太原府	2 086 640	16 500	126. 46
平阳府	1 397 546	12 300	113. 62
蒲州府	1 398 811	3 300	423. 88
潞安府	940 514	9 000	104. 50
汾州府	1 807 377	15 000	120. 46
泽州府	899 698	8 700	103. 41
大同府	764 923	19 200	39. 84
宁武府	238 692	6 000	39. 78
朔平府	536 066	27 000	19. 85
平定府	640 484	8 100	79. 07
忻州直隶州	366 146	5 400	67. 80
代州直隶州	513 135	8 700	58. 98
保德直隶州	140 769	3 300	42. 66
霍州直隶州	351 147	3 000	117. 05
解州直隶州	799 521	3 730	214. 34
绛州直隶州	1 017 312	5 400	188. 39
隰州直隶州	134 045	6 300	21. 28
沁州直隶州	266 811	5 700	46. 81
辽州直隶州	212 715	4 500	47. 27
归化城厅	120 776	缺	缺
合计	14 597 428	—	—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74 页，甲表 88 之《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各府州人口密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从表 2-2 可以知道，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山西省的太原府、汾州府、蒲州府、平阳府、绛州人口最多，人口密度以蒲州为最，其次为解州、绛州、太原府。

2.1.2 耕地面积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川外，北部地瘠民贫，虽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土地稍沃，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且十年九旱。故“山西平（阳），汾（阳），蒲（州），解（州）等处，人稠地狭。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给于河南，陕西二省。”^①另据光绪《五台县志》载：“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地也。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

^①（清）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三，《请开条禁疏》，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不资地力”^①。无不说明山西地狭人众的事实。

清代山西各府州耕地面积以太原府为最，其后依次为大同府、汾州府、平阳府、归化城厅、蒲州府、朔平府和泽州府。但各府州人均田亩以归化城厅为最，其后依次为宁武府、大同府、朔平府、隰州、忻州、辽州、代州、沁州、潞安府等。参见下表。

表 2—3 嘉庆 25 年（1820）山西各府州厅田地面积表

经济小区	府州厅	人口	田地面积(亩)	人均(亩)
晋中区	太原府	2 086 460	5 957 256	2. 86
	汾州府	1 807 377	5 109 405	2. 8
	平定直隶州	640 484	1 063 895	1. 7
晋南区	平阳府	1 397 546	4 898 137	3. 5
	蒲州府	1 398 811	3 461 643	2. 5
	解州直隶州	799 521	233 218	0. 3
	绛州直隶州	1 017 312	3 428 793	3. 4
	隰州直隶州	134 045	592 355	4. 4
	霍州直隶州	351 147	893 210	2. 5
晋东南区	潞安府	940 514	3 798 970	4
	泽州府	899 698	2 795 931	3. 1
	辽州直隶州	212 715	885 562	4. 2
	沁州直隶州	266 811	1 075 461	4
晋北区	大同府	764 923	5 128 219	6. 7
	朔平府	536 066	2 683 704	5
	宁武府	238 692	1 666 998	7
	忻州直隶州	366 146	1 547 326	4. 2
	代州直隶州	513 135	2 108 112	4. 1
	保德直隶州	140 769	94 740	0. 7
	归化城厅	120 776	3 024 171	25
总计		14 597 428	52 551 105	3. 6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 77 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各直省府州厅户口、田地及额征田赋数》；甲表 88 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各府州人口密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401 页，以及第 274 页。

清代，山西人口在增长的同时，虽然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人口增长率高于土地增长率，从而人均土地逐渐下降。参见表 2—4。

^①（清）徐继畲纂修，孙汝名、王步蟾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清同治四年（1865）修，清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表 2-4 清前期山西人均田地表^①

年代	人口	田地(亩)	人均(亩)
顺治十八年(1661)	6 278 690	40 787 125	6. 5
康熙二十四年(1685)	6 780 260	44 522 136	6. 57
雍正二年(1724)	7 509 738	4 924 250	6. 56
乾隆三十一年(1766)	10 468 349	53 548 100(民田)	5. 12
嘉庆十七年(1812)	14 004 210	55 279 052	3. 95

第二节 农业生产

2.2.1 粮食作物的生产

山西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境内北中部产玉米、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等杂粮,其中太原县可利用晋水育稻。晋南以产小麦为主,兼种棉花及少量水稻。

晋南的平阳府、蒲州府、绛州、解州等府州是山西农业条件最好的区域,稼禾两年三熟,夏季收春麦后,种一茬荞麦,或种冬麦,或歇休。如种棉花,则一般为一年一熟。故麦茬地可种花,或于花茬地种麦。濒临黄河的临晋、芮城、永济等县,种麦之外,又可种稻,割稻后立即翻耕,撒种菜籽,入冬可收油菜、芥菜等。平、蒲地方,人口密度大,农户耕种农田面积相对较少,人均耕地2.7亩^②。平阳府、蒲州府、解州、绛州等府州是山西境内的重要产棉区和粮食产区。

晋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在犁地、下种、施肥、除虫,以及具体的田间管理方面均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例如在夏收或秋收后,用木犁深翻田土,整理农地。继之,到春种季节,事先翻地,再次熟耨,碎土保墒。对过于干旱的土壤,进行空灌,调节墒情。在下种前,或用草木灰水浸种,或用砒霜拌种,防止作物的黑穗病和虫害发生。此外,注重水肥作用,在保墒的基础上,多加底肥,以畜肥和土灰为主。山西农书曾记载:“豕不放于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于在牢地掘地为坎,令其自能上下,或由牢而入坎,或由坎而入牢,坎内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③。这是山西南部农业区改散养为圈养,以利积肥壅田的一大进步。乾隆年间,晋南

^① 转引自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② 参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各府州人口密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及第274页。

^③ (清)祁雍藻:《马首农言·种植》,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一带农民掌握了有效的消灭蝗虫办法——除蛹术。乾隆十七年（1752），曾将这种经验奏报朝廷^①，这一方法的运用有效地降低了蝗虫的危害程度。

晋南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还表现在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上。玉米，康熙十一年（1672）引入晋南，试种成功，产量较高。其生产方法逐步向晋中、晋北推进。蕃薯，曾于明代传入我国，先后在江苏、山东等地种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河南朱仙镇引入晋南，逐步向北推广。^②

此外，农田水利事业在清代也有显著发展，许多地区合理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稼禾。平阳府的洪洞县和霍州赵城县农民，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浇灌两县农田。雍正年间（1723—1735），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4.5万亩；至道光五年（1825年），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7.5万亩。^③

晋中地区的土壤熟化程度较高，人均耕地面积与晋南地区基本相同，为2.7亩^④。农业生产条件好于晋北，却逊于晋南。主要生产高粱、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少数作物如荞麦、蔬菜等可一年两收。多以豆类为主，与谷、黍、麦进行轮作复种。寿阳县“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春麦多于去年黑豆、小豆田春分时种之”；黍“于去年谷田、黑豆田芒种时种之”，“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⑤。晋中寿阳、榆次等地用粪肥拌籽下种每亩5—6升或7—8升种子^⑥。水田亩产杂粮2石左右，旱地亩产杂粮7斗—1石^⑦。该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对农作物生长有利。沁州武乡县尽管有很多山地，但因实行麦豆黍莜套作并种，“丰岁上腴，”亩地可得一釜，合6.4斗。雍正八年六月，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向皇帝报告该年收成时言：“二麦收成向来丰年每亩收一石者，今竟收至一石一二斗”^⑧。可见在正常年景单产5—6斗或7—8斗。又如蒲

^① 周焘：《清除蝗种疏》，《皇清奏议》卷四七。

^② 参阅陈树平：《玉米和蕃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③ （清）崔允昭修，李培谏纂：道光《直隶霍州志》卷九，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清）杨延亮纂修：道光《赵城县志》卷十一，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孙奂仑、贺春寿修，韩炯纂：民国《洪洞县志》卷十六，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

^④ 参照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天赋统计》，甲表88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各府州人口密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及第274页。

^⑤ （清）祁雋藻：《马首农言·种植》，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⑥ （清）祁雋藻：《马首农言·种植》，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⑦ （清）祁雋藻：《马首农言·种植》，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⑧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680页。

县的山区梯田,“其上者亦能亩获近石”^①。

晋中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十分发达,太原县、榆次县、清源县引用汾水、晋水溉田。康熙初年(1662)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号称“汾河十大堰”,是其所开发汾河资源的最为典型的灌溉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范围,包括太原、清徐、太谷、交城、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等县之190多个村庄的40多万亩土地^②。太原府太原县于清雍正以后至道光年间,在县东之汾河上先后修建用以溉田的引水渠27道。其中长安渠、龙首渠、白马渠三渠总长355里^③。同时,晋中农民在潇河流域修建了“上五道、中四道、中三道、下五道和另外十八道泥渠的灌溉系统,整个流域的灌溉面积达到二十万亩”^④,对晋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榆次县在潇河上修建了31里长的官甲口渠,灌溉郭家堡、寇村、荣村、高村、韩村等处2.6万亩农田^⑤。

晋北一带高寒贫瘠,当晋中南地区桃李花谢之时,该地区草木方萌。宁武、偏关、神池、五寨等县,“终岁多大风,惟五月后至中秋初则少杀,季春孟夏时尚雨雪旦日,晴霁郡国诸山岚气蒸吐,触之若瘴”^⑥。雁北之左云、右玉各县,立春节后仍旧寒风大作,春分节后,开始解冻,农事方兴。清明节后,草木甲拆,开始下种。立夏节后,天气方为和暖,坚冰始消。虽三伏盛暑,少穿葛纱。“早晨夜暮不离棉衣,立秋节后,天已深凉”,“寒露节前百草皆枯,人皆衣裘”^⑦。农业条件不如晋中、晋南地区,产量亦较偏低。晋中、晋南地区,庄稼两年三熟,而晋北则因夏短冬早,地气寒冷之故,田禾一年仅有一熟。

大同以及朔平、忻、代等府州,地处长城沿线,人均耕地6.1亩^⑧,较省内其他地区多,但产量很低,如大同府,“云地瘠薄,即逢丰年不过三五斗”^⑨。而且“地土沙渍硗薄,风高气寒,丰岁亩不满斗,故中人日仅再食”^⑩,该府属

① (清)巫慈修,王居正纂:乾隆《蒲县志》,卷三,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② (清)安颐等:光绪《晋政辑要》卷三九,《工制·水利》。

③ 民国初年《山西省各县渠道表·太原县》上册,原件藏于山西省档案馆。

④ 张荷、李乾太:《山西水利发展史述要》,《山西水利史志》专辑,1986年第4期。

⑤ 刘泽民等:《山西通史》第五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⑥ (清)魏元枢、周景桂纂修:乾隆《宁武府志·风俗》卷九,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⑦ (清)李翼圣原本,余卜颐增修,蔺炳章增纂:光绪《左云县志·气候》卷一,清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民国间石印本。

⑧ 参照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天賦统计》,甲表88之《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各府州人口密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页及第274页。

⑨ (清)吴辅宏修,王飞藻纂,文光校订:乾隆《大同府志》,卷二六,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四十七年(1782)重校刻本。

⑩ (清)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六,清嘉庆十六年(1811)衡龄校刻本。

广灵县,“年丰每亩不过数斗”^①。天镇县“地土沙磧硗薄,寒独早,七月陨霜,农人往往清明前后种麦豆,五月种谷、粟、稷、油麦、荞麦,丰岁亩不满斗”^②。朔平府左云县亩产亦只三四斗^③。马邑县民人种谷子10亩,得净谷1.6石,平均亩收1.6斗。^④僻居晋西北的保德州,“州境山坡陡地,抑且暖迟霜早,一年一熟,犹有不能告成者,至鸿远山谷,十年九荒,遇丰岁所计,亩所获一二斗”^⑤。

因地理和土质的关系,晋北百姓就土宜,种植杂粮以及一些耐寒性的果蔬植物,如大麦、莜麦、稷、黍、糜、秫、籽麻、草麻、大豆、小豆、莞豆、黄豆、绿豆、谷子、葡萄、西瓜、茄子、南瓜、芥、蔓菁、苕兰、白菜、萝卜、土豆、黄花、茴子白等^⑥。其中,莜麦为主要食粮,适宜当地水土,耐寒耐旱,产量相对较大。鉴此,晋北的莜麦播种面积较广。在静乐、岚县及宁武府各县,“每百亩之田种者(莜麦)十之八九”,即使是种植最少的神池县,“莜麦……种百亩者(指农户),即居其半”^⑦。此外,晋北地区农田水利事业较为落后。历来“晋北土质干燥……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借者雨泽耳,故晴雨稍失时,便成灾歉”^⑧。

虽然晋北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但是区内归绥六厅,由于清代中前期的“垦荒”政策而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顺治朝山西垦荒483顷,雍正朝山西垦荒3884顷,乾隆朝山西垦荒2812顷。参见下表。

① (清)郭磊等纂修:乾隆《广灵县志》,卷四,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② (清)洪汝霖、鲁彦光修,杨笃纂:光绪《天镇县志》,卷四,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③ (清)李翼圣原本,余卜颐增修,蔺炳章增纂:光绪《左云县志》,卷十,清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民国间石印本。

④ 方行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⑤ (清)王克昌修,殷梦高纂:康熙《保德州志》,卷三,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⑥ (清)李长华修,姜利仁纂,汪大浣续修,马蕃续纂:光绪《怀仁县志》,卷四,清光绪九年(1883)刻,三十一年(1905)增补续刻本; (清)程云原本,蓝山增修:乾隆《兴县志》,卷六,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增刻本。

⑦ (清)魏元枢、周景桂纂修:乾隆《宁武府志·风俗》,卷九,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清)崔长清等修,谷如墉纂:光绪《神池县志》,卷九,清光绪六年(1880)修,民国抄本。

⑧ (明)卢承业原本,(清)马振文增修:道光《偏关县志·风土》,卷上,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增修,民国四年(1915)王有宗重订铅印本。

表 2-5 清初山西开垦荒地统计

年代	垦荒地	垦地数	资料来源
雍正六年(1728)	太原等府	3150 顷	《清高宗实录》卷 71
雍正八年(1730)	忻州、长子等四州县	17 顷	《清高宗实录》卷 106
雍正十一年(1733)	浑源、浮山等 28 州县	590 顷	《清高宗实录》卷 152
雍正十二年(1734)	阳高	18 顷	《清高宗实录》卷 155
雍正十三年(1735)	阳高	25 顷	《清高宗实录》卷 23
乾隆元年(1736)	潞城、天镇、稷山、宁朔、黎城等	15 顷 70 亩	《清高宗实录》卷 66
乾隆二年(1737)	天镇、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虞乡、宁朔八县	9 顷 16 亩	《清高宗实录》卷 89
乾隆三年(1738)	大同府属之浑源州、丰川卫、镇宁所;朔平府属之宁朔卫;宁武府属之宁武县并代州	139 顷 78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13
乾隆四年(1739)	大同、丰川、镇宁、宁朔、怀远等县卫所	299 顷	《清高宗实录》卷 138
乾隆五年(1740)	大同府属丰川卫、朔平府属宁朔卫、吉州并乡宁县	155 顷 57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64
乾隆六年(1741)	平阳府属之吉州、大同府属之丰川卫、镇宁所;朔平府属之宁朔卫、怀远所	41 顷 15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85
乾隆七年(1742)	大同府属丰川卫、镇宁所	21 顷 56 亩	《清高宗实录》卷 213
乾隆八年(1743)	大同府属镇宁所、朔平府属宁朔卫,宁武府属宁武县	9 顷 23 亩	《清高宗实录》卷 238
乾隆十三年(1748)	平鲁	15 顷 36 亩	《清高宗实录》卷 320
乾隆十四年(1749)	应州	3 顷	《清高宗实录》卷 348
乾隆十五年(1750)	丰镇	1 顷	《清高宗实录》卷 404
乾隆十八年(1753)	大同府丰镇厅	4 顷 15 亩	《清高宗实录》卷 483
乾隆十九年(1754)	丰镇厅	1 顷	《清高宗实录》卷 509
乾隆二十五年(1760)	繁峙	1 顷 87 亩	《清高宗实录》卷 644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大青山十五沟	443 顷 75 亩	《清高宗实录》卷 651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大同县	10 顷	《清高宗实录》卷 680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大同	6 顷 16 亩	《清高宗实录》卷 842
乾隆三十五年(1770)	绥远	322 顷 73 亩	《清高宗实录》卷 858
乾隆三十六年(1771)	浑源州、大同	3 顷 8 亩	《清高宗实录》卷 896
乾隆三十七年(1772)	丰镇、静乐、五台	5 顷 27 亩	《清高宗实录》卷 945
乾隆三十九年(1774)	牧场地	101 顷 13 亩	《清高宗实录》卷 994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宁远厅	94 顷 46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057
乾隆四十五年(1780)	丰镇厅	4 顷 45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118
乾隆四十七年(1782)	牧场地	237 顷 11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169
乾隆四十九年(1784)	浑源	1 顷 90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220

续表: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宁远	635 顷 34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369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归化城浑津里	61 顷 27 亩	《清高宗实录》卷 1464
乾隆六十年(1795)	萨拉齐厅	170 顷	《清高宗实录》卷 1491

由上表可以知道,通过清代前、中期大规模的垦荒,大同府、朔平府及归化城厅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垦田已经初见成效。以代州为例,五台县五台山北坡,繁峙、代州之南山,“独多佃庄……榛莽虽尽拓,贫瘠乃益形。”^①从康熙元年起(1662),梁继祖任五台知县十年,“劝民开垦山荒”,“民皆耕于湫麓之间”。^②乾隆以后,耕地面积继续扩大。大量荒地的开垦,推动了垦区农业的发展,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蒙汉民族接触,加强了联系。汉民到来先进的耕作技术、生产工具,他们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挖井修渠,推动了地区农业的发展。清末,为河套农田水利鼎盛时期,由汉民所修的大干渠总长度为1543里,支渠316道,灌溉面积达到10829顷^③。农作物的种类增多,产量增加。归化城土默特一带的农作物由燕麦、麻、黍、豆、韭菜、葱。清水河厅所种谷物包括“稷、黍、谷、高粱、大麦、小麦、莜麦”^④。蒙垦区农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当地的粮食需要,更有大批粮食通过陆路、水路运往地狭人稠的晋中、晋南。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宁远厅垦区的粮食便输往口里左云县出售^⑤。道咸以降,口外垦区余粮大量输往晋中、晋南。每年秋后,粮贩从陆路输往晋中的粮食“自北而南委输络绎不绝,近至省城,运输韩候岭”^⑥。北路粮食输入规模很大,以致太原、汾州二府米价低昂要“恒视北路之丰歉为准”^⑦。

综上所述,省内南部一带,土地相对肥沃,水利条件好,是省内重要的农业区,但是人多地狭。中部地区,平地居多,人地比例较为适中,但水利资源不够丰富,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北部地区,人稀地多,农田面积稍广,但耕种条件不好,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且山地坡地居多,水土流失严重。综观全省,中、南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但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当地居民食用,“山西平(阳),汾(阳),蒲(州),解(州)等处,人稠地狭。本地所出之粟,

^① (清)何才价修、杨笃纂:光绪《繁峙县志·地理志》卷一,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② (清)周三进纂修:康熙《五台县志》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③ 据《绥远通志稿》卷七十四,水利上,《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和清末西盟垦务总局官员周晋熙著《绥远河套治要》等史料统计,转引自韩晓莉《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载《沧桑》2002年第2期。

^④ (清)文秀修,卢梦兰纂:光绪《新修清水河厅志·户口·物产》,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⑤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山西巡抚和其衷奏折》,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⑥ 转引自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二期。

^⑦ (清)曾国荃:《曾文襄公奏议》,卷八,《申明裁种罌粟旧禁疏》。光绪《广灵县志·政令》,卷六。

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给于河南，陕西二省”^①。晋南绛州“产收之粮，恒不敷本地居民之食”^②。浮山^③、曲沃^④、荣河^⑤等县都感到土狭人满，粮食匮乏。晋中的汾阳“天寒地瘠，生物鲜少，汾阳尤最。人稠地狭，岁之所入，不过秫麦谷豆”^⑥；太谷^⑦、平遥^⑧等县所产粮食已经远远不够当地食用。晋北地区，自然条件较差，虽然归绥诸厅有余粮输出，但不足食用。光绪初年，曾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说：“晋省形势，南部重山复岭绝少平原，北部固阴互寒每扰霜雹；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⑨总体上来说，清代山西是缺粮省份。

2.2.2 经济作物的生产

山西虽土地贫瘠，且平原较少，但是清代省内经济作物种植有较大发展，棉、烟等作物产量较大；且梨、柿、桃、枣、核桃等经济林木作物省内也种植较多。

棉花在元代传入我国，清代山西棉花种植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山西西南的汾涑河谷平原是山西最重要的棉产区，因此成为清代棉花集中种植区。康熙时晋南皆有棉花种植，以蒲、解两地最多^⑩。蒲州府的临晋、万泉等县皆出产棉花¹¹。虞乡县境内也遍植棉花¹²，永济县棉花“所处独多”¹³，解州的平陆县亦“广植木棉”¹⁴。此外，在晋中地区的平阳府临汾县产棉也颇具规模，“木棉纺织，妇女均习”¹⁵。曲沃县植棉业一度繁荣，并作为商品大量外销。清人胡稚威有“河南暖种多木棉，打包换载未知数”¹⁶的记载。在汾河谷地孝义县，还出现

① (清)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三，《请开条禁疏》，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②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卷首，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③ (清)鹿学曲等修，武克明等纂：光绪《浮山县志·风俗》，卷二十六，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④ (清)张兆衡纂修：道光《(新修)曲沃县志·风俗》，卷十，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⑤ (清)马鑑、王希濂修，寻燮炜纂：光绪《荣河县志·风俗》，卷二，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⑥ (清)周貽绶修，曹树声纂：道光《汾阳县志·杂识》，卷十，清道光三十年(1850)修，咸丰元年(1851)刻本。

⑦ (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风俗》，卷三，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⑧ (清)思端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地輿志·风俗》，卷一，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⑨ (清)杨亦铭等纂修：光绪《广灵县志·政令》，卷六，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⑩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平阳府》。

11 (清)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物产略》，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12 (清)崔铸善修，陈鼎隆，全谋懿纂：光绪《虞乡县志·物产》，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13 (清)周景桂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14 (清)言如泗、韩典勋修，杜若拙、荆如桀纂：乾隆《平陆县志·物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15 刘玉玠、关世熙修，张其昌等纂：民国《临汾县志·实业略》，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16 (清)胡天游：《石筍山房文集》，卷三，《曲沃行》，道光二十六年(1840)刻本。

了专业的棉花生产，“男妇皆能纺织，所织棉花，鬻于西北州县”^①。在太原府太谷县，妇女皆勤于纺织，“暇即织任，年至耄耋，仍不少辍”^②。据清末的调查，虞乡县、猗氏县为产棉最盛之区，岁收约 100 万斤，欠年亦可收 60—70 万斤；次则解州、绛州、河津、芮城；又次则临晋、安邑、平陆、稷山等县^③。此外，永济的东乡产棉不少，有软棉、硬棉、紫棉、洋棉数种。到 1914 年，山西全省植棉面积已有 150 多万亩^④。

山西种烟始于明末。道光《曲沃县志》记载：“烟，旧无此种，乡民张时英自闽中携种植之。明末兵燹踵至，民穷则尽，赖此颇有起色”^⑤。清代山西种烟面积大为扩展，“晋人种烟始于曲沃，今则并、代、汾、潞胥盈望矣”^⑥。可见山西烟草发展的地域范围之广。保德州“（乾隆时）烟草处处有之，……余尝随宦至山西之保德州，凡河边淤土，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尝为河边叹云云，盖深怪习俗惟利是趋，而不以五谷为本计也”^⑦。清代山西产烟最多的首推曲沃县，光绪年间曲沃年产烟量在 1 000 万斤以上^⑧，烟草成为曲沃的最大利藪^⑨。

山西四面环山，不少县份更是山稠岭复，从而清代山西果树的种植成为山西发达的副业之一。所种植果木主要有柿、梨、桃、枣、杏等。

柿树，如蒲州府盛产柿，“蒲柿，柿为蒲人利，……其植多者千树，少者犹数百株。霜陨而熟，落实以待饭，旁致数郡。……凡柿藏者，经冬不败，贫家日或买数簍蒂柿，嚼饼数片，不复炊斧。故蒲人云：柿可御饥年”^⑩。阳城县“明万历中，……使广植之，初以为烦苦，未几，柿长成林，取材落实，民始受其利”^⑪。闻喜县“自蒲以东皆有，惟县北原为盛，满岭盈垓”^⑫。

梨也是山西境内产量较大的水果。除晋西北高寒山区外，全省各地都有梨的分布，最大产地是虞乡县和崞县，其次为忻州和榆次县。“虞乡种梨者多，不

①（清）邓必安修，邓常纂：乾隆《孝义县志·风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②（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风俗》，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③（清）宣统农工商部所编：《棉花图说·中国棉花现情考略》，卷三。

④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其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清）张兆衡纂修：道光《曲沃县志·物产志》，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⑥（清）曾国荃、张煦修，王轩、杨笃等纂：光绪《山西通志·物产略》，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⑦（清）陆耀《烟谱》，《昭代丛书》卷四六，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4页。

⑧张维邦：《山西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⑨（清）张兆衡纂修：道光《曲沃县志·物产》，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⑩（清）周景桂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物产志》，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⑪（清）杨善庆修，田懋纂：乾隆《阳城县志·物产》，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⑫（清）李遵唐纂修：乾隆《闻喜县志·物产志》，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

及蒲柿，人亦收其利”^①。崞县梨“有数种，以鹅梨、油梨为上品。北铜川一带极多”^②。忻州“梨甘脆，与崞县并称；贩行甚远，亦颇获利”^③。榆次县“梨出训峪诸村，脆爽绝甘，可谓佳果”^④。

红枣亦山西特产，清代枣树在山西境内黄河沿岸低山丘陵和晋中南地区普遍种植。“安邑之枣以北相为佳，猗氏、乔阳一带枣之美，不让北相”^⑤。“太平宜枣，其树盈野，居人有半年粮之谣”^⑥。曲沃之枣亦佳，号称“晋枣”^⑦。

此外，山西的桃和核桃亦全国有名。榆次县训峪诸村“民于沟涧边植桃为业，桃大且佳，岁收以代稼，计所树，一家或数百株”^⑧。“崞县北贾、武延一带亦多种桃。出于解村一带者大而美”^⑨。闻喜“邑北白沟缘溪数里，桃树成。结实甘美，土人颇赖其利”^⑩。核桃则以孝义、夏县为盛，“附近州县胥植，而夏邑甲于邻县，县治腊月望日，市集堆积如山”^⑪。孝义“核桃亦出鬻外县”^⑫。

此外，汾州府孝义县种植瓜和山药，“邑人多业圃，瓜及山药皆鬻邻邑”^⑬。太原府榆次县种植瓜，“瓜名天下，……种瓜之家町畦相接，…获利十倍”^⑭；解州安邑县种植葡萄，“土人种葡萄如种田”^⑮；绛州闻喜县则种植桃，“土人颇赖其利”^⑯。

① (清)周景桂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物产志》，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② (清)赵冠卿、龙朝言修，潘肯堂等纂：光绪《崞县志·物产志》，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③ (清)方戊昌修，方渊如纂：光绪《忻州志·物产志》，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④ (清)俞世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风俗》，清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

⑤ (清)徐浩修，潘梦龙纂：光绪《猗氏县志·土产》，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⑥ (清)李炳彦修：道光《太平县志·物产》，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

⑦ (清)张光衡纂修：道光《曲沃县志·物产》，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⑧ (清)俞世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风俗》，清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

⑨ (清)赵冠卿、龙朝言修，潘肯堂等纂：光绪《崞县志·物产志》，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⑩ (清)杨善庆修，田懋纂：乾隆《阳城县志·物产》，庆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⑪ (清)言如泗修，李遵唐纂：乾隆《夏县志·物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⑫ (清)邓必安修，邓常纂：乾隆《孝义县志·风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⑬ (清)邓必安修，邓常纂：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⑭ (清)马国翰：《竹如意》，卷下。

⑮ (清)言如泗修，吕瀛、郑必阳纂：乾隆《安邑县志·物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⑯ (清)李遵唐纂修：乾隆《闻喜县志·物产》，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

第三章 清代山西的工业

第一节 农副产品加工业

3.1.1. 纺织业

1、潞绸

明代，潞安府是全国著名的丝绸产地，曾在明万历年间（1575—1620）达到高峰，由于“潞绸机杼斗巧，织作纯丽”^①而被朝廷征派，成为贡品。在明洪武初年于山西设立“织染局”，万历中期又派出“织造内臣”赴各处督造催征。万历三年（1575），坐派山西黄绸（潞绸）2 840 匹，用银 19 334 两；万历十年（1582），坐派 4 730 匹，用银 24 670 两；万历十五年（1587），坐派 2 430 匹，用银 13 000 两；万历十八年（1590），坐派 5 000 匹，用银 28 060 两。在短短十五年里，向山西坐派潞绸 15 000 匹，用银 80 064 两。^②这种大额度、长时间在一个地区征派潞绸的行为，促使潞安府形成单一以生产潞绸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明季，潞绸生产的规模空前，洪武二十四年（1391）潞州府所辖 7 县，166 147 户，而仅“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③

清代，长治和高平仍向朝廷纳供潞绸，但其规模远不及明代。顺治初年，山西省长治高平二县，岁织潞绸 3 000 匹。八年，新颁式样，每岁织 300 匹，长治县 186 匹，高平县 114 匹。康熙六年（1667）题准，减去大潞绸 100 匹，改织小潞绸 400 匹，长 3 丈阔 1 尺 7 寸。每年长治县大绸 1 百 24 匹，小绸 2 百 48 匹。高平县大绸 76 匹，小绸 152 匹。潞绸每匹重 64 两，长 80 尺，阔 2 尺 4 寸；小潞绸每匹重 10 有 6 两，长 30 尺，阔 1 尺 7 寸，岁由山西长治、高平二县织造，解部转送内务府接收。十四年（1675）复准，大小潞绸各减去 100 匹，每年长治县织解大潞绸 62 匹，小潞绸 186 匹。高平县岁织潞绸 38 匹，小潞绸 114 匹，如额解部。十七年（1678）题准，潞绸每匹准销银 12 两 5 钱，小潞绸每匹准销银 2 两 7 钱 5 分。^④康熙年间（1662—1722），潞绸贡纳部分维持在 300—400 匹。乾隆年间规定：“十年一派，造绸四千九百七十匹，分为三运，九年解完……”

^①（明）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

^②转引自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9 页。

^③（清）张淑渠、姚学瑛等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田赋》，卷九，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④《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二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以十分为率，长治分造六分二厘，高平分造三分八厘。造完各差官解部交纳。”

①乾隆中叶开始，新疆与境外贸易所需绸缎和泽绸，均由“山西供给”。②乾隆三十年（1765），陕甘总督因喀什噶尔贸易需要，特请准从山西采办潞绸、泽绸，由驿传递送到甘肃。由长治县办解的潞绸品种有红色缎、绿色缎、酱色缎、蓝色缎、灰色缎；由高平县办解的潞绸品种有宝蓝色绸、库灰色绸、古铜色绸、青色绸。③此后，新疆伊犁与俄罗斯贸易所需绸缎，高平县“输必百匹”④。山西的泽绸一直被列入运往新疆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伊犁、乌什、叶尔羌等地的指定产品。乾隆四十八年（1783），指定运往新疆的各色绸缎中，晋省备办的泽绸 200 匹，专用于“购买哈萨克牲畜”，以解决清政府在新疆军屯所需马牛。嘉庆时（1796—1820），山西每年上解户部的农桑绢 300 匹，生丝绢 1 200 匹，大潞绸 30 匹，小潞绸 50 匹。特别是双丝泽绸，以织工精细，质地精良，色泽鲜艳，而畅销西北等地，每年仅销往新疆的泽绸约在 100—300 匹之间。⑤

清代，潞绸除了完课纳贡之外，还投入市场，其花色品种丰富多彩，百姓在市场上皆可以买到潞绸。乾隆《潞安府志》曾记载：“是绸（潞绸）也，士庶皆得为衣。”⑥

2、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也是明清时期山西民间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万历时任山西巡抚的吕坤，在其《实政录》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榆次、太原等地生产棉布，曰：“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纺织最多。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数名，教习省下木匠，令作纺车织机市卖”⑦。清代，晋省许多地方棉纺织业发展较为迅速，织布细分出择花、弹花、搓花、纺花、缠线、拐线、浆线、络线、钩线、引布、安机、卸布、锤布、浆布、裁缝等 15 道工序⑧。一名妇女，一年可以织布 50 匹，每匹可卖 150 钱，50 匹可得 7 500 钱。⑨榆次布在清代山西的棉布中最著名，“榆人家事纺织成布，至多以供衣服、租税之用，而专其业

①（清）张淑渠、姚学瑛等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田赋》，卷九，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②《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戌。

③《户部提本》，兼管吏部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等《谨题为奏明事》，存第一历史档案馆。

④（清）陈学富、庆钟修，李廷一纂：光绪《续高平县志》，卷六，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⑤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⑥（清）张淑渠、姚学瑛等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艺文续》，卷三一，《请停止砂锅绸疏》，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⑦王尚义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⑧（清）祁雋藻：《马首农言》，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⑨（清）祁雋藻：《马首农言》，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者，贩之四方，号榆次大布，旁给西北诸州县，其布虽织作未及精好，而宽於边幅紧密，能久，故人咸视之。”^①同时，清代山西从事棉织手工业生产的地区也愈趋广泛，就连雁北地区也开始学习并兴起棉纺织业。如大同地区“选择邑内木匠二三人给予资斧，趁此长夏，前往省南学制纺车织机梭扣等物，即于省南觅雇二三堪教纺织之妇人前来。”^②

3.1.2 烟草加工业

山西的烟草加工业的发展，是以曲沃县烟草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发展为基础与中心的。曲沃烟业发端于明末，发展并繁荣于清代，经营烟叶生产加工的烟坊有数十家，成为山西烟草生产基地。

曲沃有适宜种植烟叶的土壤，又有传统的植烟经验，其品种之多，配料之精，非他乡所能比拟。清代是曲沃烟叶种植与加工的鼎盛时期，在曲沃北荣裕、杨谈、北白集、城关等地均建有烟坊，相继出现了一批专业经营烟草的商号，如裕顺永、魁太和、东谦亨、西谦亨、南谦亨、北谦亨等。清末，全县种植面积约8万亩，年均产烟900万斤，最高年产达1400万斤。此时曲沃有大小百十家烟坊，烟叶生产成为曲沃重要产业，全县的烟坊年产烟丝4,000—5,000吨，烟丝从曲沃运至晋中平遥，而后运往广大的北方市场。^③

曲沃烟坊制作烟叶形成了独特的加工原则，即：不使用当年烟叶，而使用过夏烟叶，待其发酵，叶色转黄，芳香味出，才用以作加工原料。经过抽梗、碾碎、配料、切丝、揉丝等工序，然后以足量装匣，再经过压缩、上色、晾干、过夏、鉴定等诸多程序后，才能上市销售。成品烟叶在生产过程中，配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配料时分一般烟丝与香料烟丝两种配法。一般烟丝用的是菜籽油、香油（普通芝麻油）；香料烟丝则根据烟丝的质与量，分别拌以麝香、冰片、陈皮、兰花米、甘草、当归、桂枝、白芷、甘松、辛夷、洋草、芸香、青元、薄荷等十几种中药材；此外，还从河南襄城、邓州、清化采购一批烟叶以调剂味道。润色时，以姜黄、榆叶面为主要原料，也有用曲沃城内杜家的红土作染料的。复杂的生产工序反映出当时曲沃烟叶生产的成熟工艺。使曲沃晒烟具有明显不同于其它地区所产烟叶的显著特点，即：颜色黄绿；色泽光亮新

^①（清）俞世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物产》卷十五，清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

^②（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③以下内容参看段士朴：《曲沃烟史简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二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鲜；油性大（糖份大），烟叶本身具有柔、韧、软的特性；燃性强；叶片大而完整等。^①这些都反映了曲沃烟的质量上乘。不同的配料和具体工序，使得曲沃旱烟种类多样，可分为生烟、皮烟（潮烟）、香料烟（杂拌烟）三大类。

清代，特别是清末曲沃数百家烟坊中，规模较大、资金实力较强的有 31 家。在曲沃烟坊迅速发展的刺激下，晋东南许多县份相继有烟坊产生，清末拥有烟坊的县份发展到曲沃、翼城、芮城、襄陵、沁水、晋城、襄垣、汾城等八个。

3.1.3 造纸业

山西手工造纸始于北周中期，约在五世纪七十年代产生于蒲州，故名蒲纸，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唐代，全国有十五州造纸，蒲州就是其中之一。自清雍正三年（1725）始，潞、泽二府年解京都呈文纸四万张，这些纸张分别产于长治、长子、屯留、黎城、襄垣、潞城、壶关、凤台（今晋城）、高平、陵川、阳城等十一个县。清乾隆初年，“岁造十万张送京师纳于户部”^②。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解京都毛头纸五十万张。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将年解毛头纸增加为百万张，仍由太原、汾州、平阳、蒲州四府解办。这些纸分产于阳曲、太原、榆次、交城、文水、汾阳、介休、临汾、永济等九县，以临汾、永济、汾阳、介休四县为最多，各二十万张。此百万张之上解数，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年，至光绪十年（1884）才予停解^③。

山西手工纸分为三类，即麻纸、桑皮纸和杂纸，杂纸是最低级的纸张，包括草纸、黑毛纸、烧纸等三种。^④

麻纸是清代山西手工纸中产量最大，用途最广，生产地区最多，行销范围最广的手工纸。其时山西全境有数十县份生产麻纸，行销省内及京津、豫、陕等地。临汾县盛产麻纸，行销于临近各县及河南、陕西等地；襄陵县邓庄，清中叶有纸坊一百多家，所产麻纸运销北京、天津、陕西、河南、宁夏等地。另外，介休县之顺城关、西关、东关；曲沃县之城内小水巷、斗润村、曲村镇；翼城县之冰清镇、城村等地均有纸坊。浑源县之城区木市街及北顺城、东门、南门一带有二十家纸坊生产麻纸。定襄县之蒋村有纸坊一百多家，所产麻纸行销五台、崞县。孟县之温村，崞县之上王村、下王村以及代县、朔县、左云、

^① 段士朴：《曲沃烟史简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二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年版。

^② （清）周景桂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物产》，卷三，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③ （清）刚毅修，安颐纂《晋政辑要》，光绪十三年（1887）本。

^④ 以下参看衡翼汤编：《山西轻工业志》，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年版。

右玉、繁峙、怀仁、河曲、临县等县均有纸坊生产麻纸。本省所产麻纸，以颜色分有黑白两种，惟白色居多。以厚薄分则有单、夹两种。以大小及纸质优劣分则有呈文、方曰尺、条曰尺、京文、重尺八、大对方、三折纸、大改、中改、二尺对、二二对、二四对、二八纸、三四纸、三五纸、三六纸等十六个规格名称。麻纸以临汾产者质量最佳，其主要特点是，久不变色，蠹鱼不蛀。

桑皮纸主要产于晋东南阳城、晋城、陵川、沁水、高平等五县，阳城县的下孔村；晋城县的犁川镇、造纸寨、西上庄；陵川县的吕家河村；高平县的永禄村均是生产桑麻纸的重点地区。所产桑麻纸以尺九与二八两种最多。

草纸多产于阳曲县上兰村。太原县境内有晋泉发于晋祠，该水适宜造纸，晋祠附近的赤桥村，每年清明节后即开始造纸，至十一月底停工，年工作 240 天。古城营、西群城、大阮村等也均为造纸区域。其生产原料为稻草，所产草纸专供民用。此外，临汾县之贾册、官磴、坛地、靳家庄、城居等村；浑源县之下盘铺村、西坊城、间村等村均有纸坊生产草纸。洪洞、赵城两县汾河沿岸多有以破布为原料生产黑毛纸和烧纸作坊。黑毛纸与草纸用途相同，烧纸作祭奠使用。

3.1.4 皮毛加工业

山西是出产毛织品和皮张的地方，南北商品交易，资金动辄百万余两。皮毛加工业在清代的山西有较快发展。山西多山，畜牧业历来比较发达，皮毛产量颇丰，形成了大同、忻州、交城、寿阳、潞安等多处皮毛加工生产和集散中心。^①其中，尤以交城县突出，《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卷》载：“山西以牧羊著称，硝皮业也随之发达。全省硝皮业之发轫，以大同、交城两地最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已有硝皮场之经营”。交城皮商贩洗皮革，腥秽填塞，如“城内东南隅，离相寺圣母庙前，清流一曲，地属离震，实启文明，何为洗皮浸革之需，居民苦之。暮春初夏，秽气满城，见者伤心，行人掩鼻，遂使清净法坛，终年齷齪，风雅圣地，昼日腥膻”^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交城皮革加工规模较大，已经影响环境。山西硝皮业最繁荣的时期，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895—1898）之间，其时皮货国外贸易兴旺，交城大同两地每年销售总值各在百万两以上，交城硝皮庄由十家增至一百余家，大同由十余家增至八十余家，可谓晋省皮货

^① 杨纯渊编著：《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77 页。

^② 转引自张正明等：《明清晋商资料选编》，18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业之黄金时代^①。其时，绛州也是省内皮革重要产地，其境内“皮货甚多，而皮货制作则必有待于工匠，即所谓皮工是也，其在白皮行者有裁活、铲皮及共作等工。在黑皮行者有拨皮、揭筋及染皮、薰皮等工。其余股子皮行、皮条铺及弦房、闸房等行亦各有专门工匠，就各行之家数计之，白皮行约四十余家，在皮行中为最，占势利；黑皮行及股子皮行约均十家上下；皮条铺、弦房、闸房亦各三五家不等，每家用人平均以二十人计之，实不下千有余人，亦可谓一种特别之生业也”^②。

皮毛产品分为黑皮革、精细皮毛制品、毡制品等。^③

黑皮革由黑皮匠制作，主要被制成手工业用具，如耕绳、滚绳、过梁绳、皮筋、搭腰、笼头、笼嘴、料拌、鞍屉等，以及皮鞋底、补鞋用皮及皮胶等。上述产品均以大畜皮张作为原料。

精细皮毛制品，由白皮匠制作，主要指皮袄、皮裤、皮褥、粉皮裤、皮坎肩、皮帽等。原料多为羊、狗、兔、狐等动物的皮毛。先将毛皮带毛鞣制成革，然后割制而成。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从业人员 73 人，年加工皮衣 3 万余件。其时盛行粉皮制革，即用山羊板皮去毛鞣制、染色，后缝制成裤或袄，具有耐用、美观的特点。

毛口袋，原料为山羊毛、牛毛和其他畜毛，经手工纺线、砍织和缝合等工序制成口袋、毛单等成品。口袋分驴、骡和连二口袋，驴骡口袋多用于畜驮，连二口袋多用于车拉，均为包装用品。毛单块大小不一，一般多为 5 尺 5 寸长，3 尺 5 寸宽，横幅两边有穗，可做雨衣，也可铺炕或铺床。明嘉靖五年（1526），全县从业人员 150 人，年产毛口袋 3 200 条，毛单 2 000 块。清乾隆三年（1738）从业人员 310 人，年产毛织品 8 000 余件。

毡制品，原料以绵羊毛和其他家畜毛为主，经过弹毛、铺胎、水洗（有的染色）等工序制成毛毡、毛帽、毛鞋、毛屉、毛垫等成品。毛毡分二五毡、条毡、三六毡、对儿毡、大毡、红毡等。毡帽分紫绒和白毛两种。毛鞋分高腰和低腰及男女多种。屉垫块状大小不一，多数为驴骡或骆驼驮物垫衬用。

3.1.5 酿造业

清代山西境内有酒坊数百家，所产酒种类繁多，最著名的是汾酒，清代汾

^① 参阅解光启《交城县民间硝皮业历史资料综述》，载《交城文史资料》第 9 辑。

^②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生业》，卷三，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③ 以下参看衡翼汤编：《山西轻工业志》，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年版。

酒的酿造工艺已经更趋成熟,“汾酒之制造法与它酒不同,它酒原料下缸,七八日之酝酿,酒糟齐出矣。汾酒酝酿最缓,原料下缸后须经四次,历月余,始能完全排出。且其性最易发挥,存积消久,则变色减秤,暗耗不资”^①。此外,山西产葡萄酒,潞酒是山西所产葡萄酒中较为著名的一种,因其产于潞安府而得名,潞酒具有浓郁的梨香味,晶莹透明,入口绵甜^②。太原所产葡萄酒为朝廷贡品,清雍正年间,太谷、文水、清源三县均产葡萄酒。孝义县产“羊羔儿(酒)名重海内”^③。

山西酿造醋的历史悠久,清代酿醋工艺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提高,采用高粱做主料,加入大曲、麸皮、谷糠、盐、椒、茴香、姜、桂皮等佐料,经过粉碎、搅拌、浸泡、堆积润渗、熏蒸、糖化、醋酸发酵等工艺,薰、淋、醅结合,生产而成,从而使所产醋色黑红透亮,味绵甜香酸^④。其后,人们纷纷效仿,出现“山西老陈醋”的名牌^⑤。以清源(今清徐)和当时太原城内的宁化府所产最为著名。其时,全省酿造陈醋最优者5家,都是高粱醋,其贮存时间最长者为介休县通德如醋坊所产老陈醋达四十年,伏晒陈醋达十年;其次太原益源庆和宝丰裕所产老陈醋达五年;再次是清源县的永泉玉和聚庆成两家所产均不到一年。^⑥山西醋坊发展迅速,清光绪二十年(1894),曲沃出现了“太和醋坊”,继而太谷、蒲县、襄陵、汾城、新绛、翼城、河津、沁县、平遥、祁县、汾阳、徐沟等县有一大批醋坊相继建立。^⑦

第二节 工矿业的发展

3.2.1 盐业

清代山西的主要产盐地为河东盐池,与明代相同。河东盐池,全部在解州境内,故称盐池为解池。解池东起安邑县之南柏家庄村以西,西至解县城东门外社东村以东,东西全长30余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总面积约为130平方公里,池面海拔320米^⑧。

① (清)徐珂:《清稗类抄·工艺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卷》,第六编第三章。

③ (清)邓必安修,邓常纂: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④ 杨纯渊编著:《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⑤ 衡翼汤编:《山西轻工业志》,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第84页。

⑥ 《山西醋》黄海化工业研究社,研究调查报告第十一号,民国二十六年六月。

⑦ 衡翼汤编:《山西轻工业志》,太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第85页。

⑧ 席瑞卿:《运城盐池·晒商·陕岸运商及其它》,载《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六卷,《山西文史资料》编

清初对池盐的捞采采取征集盐丁制度,由晋南各县征集。顺治六年(1649),实行畦归商种。即将所有的盐池、盐畦、盐地交给商人生产,商人按领畦地纳课,并拥行盐引。畦地以锭划分,盐商每月依限交纳课银50两。每六锭为一号,十二锭为双号,每号注册一个商名。盐商捞采池盐之后,向官府交纳盐课,领取引票,即可运盐外销。^①康熙十九年(1680),河东盐池有坐商513名,每商一处,领地八分三厘^②;坐商每领一号畦地,纳课6锭,每锭银50两,一号畦地即纳银300两。康熙二十七年(1688),盐池的产销商人分开。运商须在北京备案方可经营。业盐者大多是平阳本地人,也有其他府州商人。这种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增加了池盐产量。

清代,池盐的行销区域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山西平阳府、潞安府、泽州府、蒲州府,解、绛、吉、隰四州属,皆食河东池盐,太原府、汾州府、宁武府属,辽、沁、平、保、忻、代六州属,皆食本处土盐;陕西西安一府,兴安、同华、商、耀、乾、邠七州属,皆食河东池盐,凤翔府属皆食花属池盐;河南的河南、南阳二府属,汝、陕二州属与许州之襄城皆食河东池盐。^③池盐运销路线大致可以分为三条:一条由运城到平陆茅津渡摆渡过黄河,再运销至河南省;二条由运城到临晋关三河口摆渡过黄河,再运销至陕西省;三是运销山西省内各个州县。^④

此外,山西还出产土盐,即刮土淋卤用锅煎熬而成。清代,山西土盐生产范围较广,晋北土盐最著,晋中的榆次、太原、阳曲、平遥、介休、交城、文水、汾阳、孝义、清源、徐沟等许多县份均有土盐出产。^⑤

3.2.2 煤炭业

煤炭业是山西在清代一项重要的产业。山西煤炭资源丰富,采煤有着悠久历史,清代之前山西的煤炭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和利用。清代自康熙以后,矿禁逐渐松弛,康熙五十二年(1713),大学士九卿等“遵旨复议”,准许商人王刚明于湖广、山西地方各雇本地人开矿;乾隆五年(1740),准许直隶、山东、

编辑部,1998年版。

^① 杨纯渊编著:《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 (清)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盐法》,卷四五,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③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濫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疆域》,卷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④ 参看席瑞卿:《运城盐池·晒商·陕岸运商及其它》,载《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六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⑤ 杨纯渊等:《山西经济史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山西等省“招商采煤”^①；清乾隆六年（1728），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奏请开采大同、朔平等地煤矿。此后，煤矿开采的区域又扩大到：怀仁、平鲁、左云、右玉、广灵、朔州、河曲、繁峙、代州、五台、神池、岢岚、原平、定襄。山西的煤矿开采区域覆盖了现在山西所有的开采矿区。清代，山西创办于道光二十年（1840）前的煤窑有25处，分布在全省南北的十数个县。^②

清代煤矿的开采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勘探技术，“土人每视山上石脉，即知炭之有无”^③。在采煤的方法上，基本延续明代的开采方式，即“凿山为穴，横入十余丈取之”^④，“人从其上施钁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⑤。

清代，山西的煤炭在生产上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月，平定县固庆沟炭窑被大水淤没，“内浸工人、驴骡四五十口”^⑥。随着煤炭的开采，形成了以贩煤为业的商人。大同县“其西乡一带农人，冬日多贩煤”^⑦。五台县“县治东北之天和山、东南之窑头山，产炭最旺。炭窑计百十余处。……其炭供本境之外，旁溢于崞县、定襄、忻州。农民完课授衣婚丧嫁费，皆赖此乎。”^⑧乡宁县东南产煤及铁，贫无田者，以煅炉、挖煤、贩铁为业，近煤场者，则以人畜负贩，日有取资^⑨。阳曲县“东西北傍山各村，地土瘠薄，居民农事之暇，多策口贩炭为生”^⑩。平遥县“晋之炭铁枣酒，车推舟载，日贩于秦”¹¹；孝义县“孝义产煤颇盛，城西六十里外，西北山中，多穿山为穴，深或数丈及数十丈。取者携灯鞠躬而入，背负以出，至大路始以畜驮，坦途始能车载。约东南可鬻至百里内。西北可鬻至二百里内”¹²，泽州府“其输市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¹³。

①（清）潘颐福：《东华续录》，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清光绪十八（1892）年。

② 杨纯洲编著：《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③（清）金明源修，窦忻、张佩芳纂：乾隆《平定州志》，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涌云楼刻本。

④（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部》，卷九，民国六年（1911）鸿宝斋石印本。

⑤（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1930年影印日本浪华书林本。

⑥（清）赖昌期、张彬等纂修：光绪《平定州志》，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⑦（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土》，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⑧（清）徐继畲纂修，孙汝明、王步屺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新志·生计》，卷二，清同治四年（1865）修，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⑨（清）葛清：乾隆《乡宁县志》，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⑩（清）李培谦、华典修，阎士驥、郑起昌纂：道光《阳曲县志·舆地图下》，卷二，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葛英纂刻本。

11（清）恩瑞修，武达材、王舒等纂：光绪《平遥县志》，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12（清）邓必安修，邓常纂：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13（清）朱樟修，田嘉穀纂：雍正《泽州府志·物产》，卷十二，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据不完全统计,明至清道光年间,山西全省开采煤窑 20 余座,参见表 3-1。清咸丰至光绪年间,据平定、太原等 45 州县不完全统计,开办具有一定规模的煤窑 240 座^①,其中规模较大的参见表 3-1。值得一提的是,晋煤不仅供民用,还被故居广泛地用于冶铁、铸钱、烧石灰、烧砖、陶瓷、酿酒、制药等手工业中。

表 3-1 明至清道光二十年以前山西煤炭表^②

经济小区	县别	开采地点	窑名	开办时间
晋中区	太原县	明仙峪	石门	明万历
	太原县	风峪	大成	明万历
	太原县	石庄头	和尚	乾隆年间
	太原县	柳峪	谦太元	道光年间
	清源县	西梁泉沟	西沟	明万历
	孝义县	程家庄	复胜	清乾隆四十九年
	孝义县	兑九峪	兴胜	道光三年
	平定县	冯家庄	永聚德	嘉庆年间
	平遥县	普洞村	宝兴隆	乾隆年间
	榆次县	北山	曹家窑	乾隆二年
	榆次县	北山	大窑厂	道光三年
晋南区	赵城县	西沟	西沟	明季
	浮山县	北家沟	永兴	嘉庆
晋东南区	壶关县	不祥	不祥	明
	陵川县	不祥	不祥	明
	襄垣县	不祥	不祥	明
	潞城县	不祥	不祥	明
	潞城县	冈头村		乾隆三十二年
	潞城县	冈头村		道光四年
晋北区	阳高县	范家窑村	范家窑	明万历
	五台县	寨里村	寨里	明万历
	大同县	屈家山		道光五年

清末,山西煤炭产量有大幅度增长,在短短 5 年中,由 2,215 吨增长至 133,261 吨,增长将近 60 倍。参见表 3-2。

^① 张正明:《山西工商业史拾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5 页。

^② 参照杨纯渊:《山西经济史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20—321 页。

表 3-2 清末山西煤炭年产量表

年份	产量(吨)
光绪三十三年(1907)	2 215
光绪三十四年(1908)	5 572
宣统元年(1909)	26 810
宣统二年(1910)	55 233
宣统三年(1911)	133 261

资料来源：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38 页。

3.2.3 冶铁业

明代全国已经探明的铁矿产地共有 245 个县，山西共有 25 个县分布有铁矿，占全国铁矿总数的 10.1%^①。山西冶铁产地有晋城、长治、平定、孟县、榆次、孝义、汾西、临汾、翼城、高平、阳城、交城、太原、阳曲、五台、吉县、山阴、右玉、永和、乡宁、稷山、绛县、洪洞、平遥、繁峙、怀仁、清徐、静乐、介休、灵石、壶关等 31 县^②。天顺五年（1461）陕西总兵官奏疏称：“臣闻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③根据明代铁课三十取二的规定，可粗略推算出当时山西铁产量为 750 至 900 万斤。

清代，山西冶铁业继续发展，除冶炼生铁的“方炉”、炒炼熟铁（低碳钢）的“炒炉”之外，铸造铁器的“货炉”，锻打铁器的“烘炉”、“条炉”，以及打制铁钉的“钉炉”等也大量发展起来。道光年间，凤台一县有生铁炉 1 000 多座，熟铁炉 100 多座，铸锅炉 400 余座^④。高平县最盛时有各种铁业炉 1 076 个，从业人员约 3.9 万人。清末，山西铁产量较大，参见表 3-3。德国人李希霍芬说：“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几亿的人是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晋城大阳镇）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⑤

清代，山西铁冶在技术上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普遍采用坩锅装矿石，以无烟煤作燃料与还原剂的方法。国外学者丁格兰在其专著《中国铁矿志》中说：“山西铁矿在清季成为中国最大铁业者，在古时则尚无闻。推原其故，殆有山西铁矿在古时虽有采者，其量不多。迨稍迟发明以粘土作坩锅，及利用无烟煤为燃

①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7 页。

② （明）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十九。台湾 1965 年影印本。

③ （明）胡广等：《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第二十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1961 年版，第 6774 页。

④ 张捷夫：《山西历史札记》，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年版。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39 页。

料之后，山西铁业始臻发达，此技术进步之关系也”^①。进行冶炼的小工厂具体是这样的，一个铲平的，略有坡度的广场，八英尺长，五英尺宽，两个长边垒起土泥墙。倾斜下去的一边为前边，是开敞的，第四个边则被一间小屋的泥壁封堵起来。小屋是由二至四个人操纵的风箱，燃烧场上布满拳头大的无烟煤块，上面放一百五十个坩锅。^②

表 3-3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西产铁数表

	年产吨数	附注
孟县	4 500	铁炉 60，每年作工日 250 日，每日每炉炼铁 500 斤
平定	18 000	250 炉，每炉 500 斤
荫城（长治县属）	6 000	本地报告
高平	4 000	铁户报告
泽州	13 333	大阳等处均在内，县知事调查报告
阳城	2 000	县知事调查报告
沁水	415	同上
太原	2 000	炉户报告
共计	50 248	

资料来源：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4 页。

山西冶铁业较发达和集中的地区是晋东南的潞安府和泽州府。其中，泽州府的高平县和凤台县大阳镇主要冶炼生铁。^③由于冶铁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山西境内出现一些以出产优质铁制品而著名的城镇。陵川在清雍正时期专门生产铁钉的作坊有 12 家。晋东南之阳城、凤台、荫城（长治县属），当时号称三城，以出产优质铁货闻名。阳城以生铁货为主，大小锅、笼盖、笼圈，以及犁、耙齿、炉条等^④。凤台主要有铁丝、铁钉、平锅、蒸锅、犁头、杂件、铁箍、刀剪等^⑤。长治县荫城镇，为高平县和长治县交界，是两县铁矿萃聚之区，共有铁行三十余家，制造铁器之炉三百余家^⑥。此外，晋中区平定州的平定县和孟县也出产铁。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54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39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39 页。

④ 任永昌、杨作梅：《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年版。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3 页。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5 页。

小结

清代, 平阳府曲沃县烟草种植业发达, 在曲沃县境内先后建立了上百家烟坊, 相继出现了一批专业经营烟草的商号, 如裕顺永、魁太和、东谦亨、西谦亨、南谦亨、北谦亨等, 并以曲沃为中心的, 在包括翼城、芮城、襄陵、沁水、晋城、襄垣、汾城等县镇广范区域内, 形成了烟草加工企业聚集地, 烟叶生产成为该地区重要产业。^①

解州盐池附近聚集了大量盐商, 据雍正《山西通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1680), 解州盐池有坐商 513 名, 雇佣盐工数千人进行池盐涝采^②。康熙二十七年(1688), 盐池的产销商人分开, 产商不管运销, 运商不管产盐。^③从而在盐池附近聚集了大量涝采商、运输商, 以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一系列不同部门的产业。

在潞泽地区、平定州平定县及盂县也形成了冶铁、铸造、加工、运输等不同部门的产业的聚集。潞泽地区除冶炼生铁的“方炉”、炒炼熟铁的“炒炉”之外, 铸造铁器的“货炉”, 煅打铁器的“烘炉”、“条炉”, 以及打制铁钉的“钉炉”等也大量发展起来。道光年间, 凤台一县有生铁炉 1 000 多座, 熟铁炉 100 多座, 铸锅炉 400 余座^④。陵川在清雍正时期专门生产铁钉的作坊有 12 家。晋东南之阳城、凤台、荫城以出产优质铁货闻名。阳城以生铁货为主, 大小锅、笼盖、笼圈, 以及犁、耙齿、炉条等^⑤。凤台主要有铁丝、铁钉、平锅、蒸锅、犁头、杂件、铁箍、刀剪等。长治县荫城镇, 为高平县和长治县交界, 是两县铁矿萃聚之区, 共有铁行 30 余家, 制造铁器之炉 300 余家。此外, 还有专门从事铁货运输的挑夫和驴骡。^⑥并且, 潞泽地区的风台县、陵川县和阳城县均出产无烟煤^⑦, 为当地冶铁业提供燃料, 而当地千余座熔炉和百余座熟铁炉^⑧所出产的铸铁又为当地铁制品加工工业提供原材料, 从而在当地形成一条产业链。平定州的平定县和盂县境内出产铁矿和煤炭^⑨, 以所产煤炭作为燃料冶炼生铁, 光

^① 详见本章第一节内容。

^② (清) 觉罗石麟修, 储大文纂: 雍正《山西通志·盐法》, 卷四五, 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③ 介福平: 《三晋宝湖——运城盐池》, 《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卷,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8 年版。

^④ 张捷夫: 《山西历史札记》,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任永昌、杨作梅: 《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 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卷,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8 年版。

^⑥ 详见本章第二节内容。

^⑦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第 140 页。

^⑧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第 143 页。

^⑨ (清) 赖昌期、张彬等纂修: 光绪《平定州志》, 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绪二十四年(1898)孟县铁炉 60 座,年产铁 4,500 吨;平定县铁炉 250 座,产铁 18 000 吨。^①

清代曲沃烟草加工业、解州池盐生产、潞泽地区及平定州的冶铁业均表现出产业集聚的特点。其中,曲沃的烟草加工业属于同产业部门集聚,这种集聚是基于地区的一种区位优势而集聚了大量同产业部门的企业集聚。解州盐业属于多产业部门集聚,这种集聚是基于地区的同一优势而集聚了大量不同部门的产业,形成多产业集群。山西境内的一些冶铁产地,例如潞泽地区和平定州的平定县和孟县地区在冶铁业和煤炭业的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这两个产业的纵向经济联系,从而形成纵向经济联系集聚。具体而言即指一个企业的投入是另一个企业的产出,这是一种投入产出关联关系。这种经济联系集聚,加强了地区内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关联产业按一定比例布局在地区内,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系统,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使区域整个生产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企业的功能之和。这种由于产业集聚获得的超出各个组成部分的效益,成为集聚经济效益。

产业集聚在客观上促进了产业内部的发展。当时,曲沃全县的烟坊年产烟丝 4 000—5 000 吨^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西铸铁产量为 50 248 吨^③;河东盐在清代产量最高时达到 1 500 万斤^④;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煤炭年产量为 2 215 吨,至宣统三年(1911),产量达到 133 216 吨^⑤。

集聚化发展的行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而这种互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以及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产品创新,促成产业升级的加快。同时,由于集群内积聚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众多企业,高度积聚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随时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进而增强该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清代山西曲沃烟的畅销蒙俄;河东盐的行销陕、豫;潞泽铁货的畅销全国都是有利的证明。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页。

^② 以下内容参看段士朴:《曲沃烟史简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二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④ 阴朝英:《潞盐产量之起伏》,《山西文史资料》第七十辑,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版。

^⑤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第四章 山西商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山西的重商习贾观念

山西地狭人稠，农业生产不足供给，从明代起，即有大量人口外出经商。商人地位逐渐上升，“经商”观念渐渐被大众所接受。明人李维祯记陕西商人王来聘告诫子孙：“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①。韩邦奇记山西商人席铭：“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汉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②，于是做了商人。归有光则指出：“士与农商常相混”^③。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商人四民观的排列顺序已经是：士商农工，四民可以分为两大类：士、商为社会上层，农、工为社会下层。这种观念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人们纷纷外出经商，山西尤然，境内重商风气浓重。万历时汾州府“多商贾……罔事本业”^④。至崇祯“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⑤。临县民“勤于商贾”^⑥。平阳府“服劳商贾”^⑦。泽州与蒲州二府“浮食多者、民去本就末”^⑧。

清代，山西重商习贾风潮更劲，“晋俗以商贾为重”^⑨，“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半携资外出，贸易营生”^⑩。多数县份有民人外出经商或在本地习贾。“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⑪。寿阳县“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⑫。平定府“(民)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

① (明)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一〇六，《乡祭酒王公墓表》。

② (明)韩邦奇：《苑落集》，卷六，《大明席志铭》。

③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清光绪元年(1875)归氏重刊本。

④ (明)李维祯纂修：万历《山西通志》，卷七，明万历年间修，崇祯二年(1629)刻本。

⑤ (明)李维祯纂修：万历《山西通志》，卷六，明万历年间修，崇祯二年(1629)刻本。

⑥ (明)李维祯纂修：万历《山西通志》，卷六，明万历年间修，崇祯二年(1629)刻本。

⑦ (明)李维祯纂修：万历《山西通志》，卷七，明万历年间修，崇祯二年(1629)刻本。

⑧ (明)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圣门人物志序》。

⑨ (清)徐继畲纂修，孙汝名、王步蟾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新志·生计》，卷二，清同治四年(1865)修，清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⑩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四月丙午，宣统上海图书集成公司铅印。

⑪ (清)徐继畲纂修，孙汝名、王步蟾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新志·生计》，卷二，清同治四年(1865)修，清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⑫ (清)马家鼎、白昶修、张嘉言、祁世长纂：光绪《寿阳县志·风土·风俗》，卷十，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①。孟县“往往服贾於远方，虽数千里不辞远”^②。介休县“人民繁庶，重迁徙，服商贾”^③，榆次县“人操田作者十之六七，服贾者十之三四”^④，太谷县“向以田少民多”，故“谷地故商于外者甚夥”^⑤，县人重商习贾，“经商异域，讲信耐劳，足迹遍天下，执各大埠商界之牛耳，起家至数十百万者尤为谷人之特色。”^⑥“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⑦经商所得为“惟谷地向以田少民多，故商于外者甚夥，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涓涓滴滴为本地大宗来源”^⑧。高平县“四郊东务农，西服贾”^⑨。绛州“负贩贸迁以为谋生之计”^⑩。曲沃县“重迁徙，服商贾”^⑪。解州运城“阡陌之夫率趋盐利握算，佣工不务本业”^⑫。甚至连晋北都有民人外出经商，左云县“(民)大半皆往归化城，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且有以贸易迁居者大半”^⑬，偏关县“关民多有出口谋生”^⑭。保德州“习俗惟利是趋，而不以五谷为本计也”^⑮，河曲县“业农者多开油店，此商贾之业”^⑯。就连雍正皇帝也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便之读书应试”^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

② (清) 赖昌期、张彬等纂修：光绪《平定州志·食货·风土》，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③ (清) 张岚奇、刘鸿达等修，武继绪、刘懋功等纂：光绪《孟县志·地輿考·风俗》，卷六，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④ (清) 王谟文纂修：乾隆《介休县志·风俗》，卷四，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⑤ (清) 钱之清修，张天泽纂：乾隆《榆次县志·风俗》，卷六，清乾隆十三年(1748)思风堂刻本。

⑥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太谷县志·生业·商会》，卷四，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⑦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太谷县志·序》，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⑧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太谷县志·新修太谷县志序》，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⑨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二十年《太谷县志·生业·商会》，卷四，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⑩ (清) 朱棣修，田嘉穀纂：雍正《泽州府志·风俗》，卷十一，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⑪ (清) 张成德修，李友洙、张我观纂：乾隆《直隶绛州志·艺文》，卷十七，马翊《绛民疾苦记略》，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⑫ (清) 张坊修，胡元琢、徐储纂：乾隆《新修曲沃县志·风俗》，卷二，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敦好堂全书本。

⑬ (清) 言如泗修，吕融、郑必阳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风俗》，卷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解州全志》本。

⑭ (清) 李翼圣原本，余卜颐增修，蔺炳章增纂：光绪《左云志稿·风俗》，清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民国年间石印本。

⑮ (明) 卢承业原本，(清) 马振文增修：道光《偏关志》卷上，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修，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增修。

⑯ (清) 陆耀《烟谱》，《昭代丛书》，卷四十六，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⑰ (清) 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⑱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七册，雍正二年五月九日刘於义奏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下者方令读书。”^①

山西重商习贾民风产生的内在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所致。朱明建国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威胁明政府边境安全。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实行重兵把守边镇和卫所军屯以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御措施，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镇，统称九边，共驻军队八十余万，形成庞大的军事消费区。继而推行开中法、招商输粮而与之盐引。山西位于长城内侧，地处东西、南北商路要冲，山西商人得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集北边屯田、贩运粮食，换取盐引销盐于一身，大获其利。明中叶开中法废，山西商人又以其雄厚的资本，或留在北边充当边商，或迁扬州充当内商，或活动在河东、长芦盐区。同时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和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最有势力的一个商帮。明人谢在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②。明人王士性也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③。山西豪商富贾多了，便在生活中追求他们过去得不到的东西，于是民风为之一变。正如《偏关志》所载：“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起居服物竞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④。

其次，山西地区的自然环境所致。晋北地区近塞苦寒，土瘠民贫，本地所产供给不足消费，日常用度需从外地购回。应州“州僻边口，非舟车四达之口，物产无多，不通商贾。止碱、卤、麻、油之属供外方之稗贩而已。……其布棉则取于直隶之行唐、山东之恩县”^⑤。汾阳“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汾阳尤最。人稠地狭，岁之所入，不过秣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商贩而至”^⑥。晋中、晋南地区虽土壤较为肥沃，但“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地也”^⑦。地力不足以供当地人生活。何况省内大部分地区“土非沃壤，产粮本属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七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明）王士性：《广志绎》，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④ （明）卢承业原本，（清）马振文增修：道光《偏关志》，卷上，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修，清道光二十六年（1854）年增修。

^⑤ （清）吴炳纂修：乾隆《应州续志·风俗》，卷一，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本。

^⑥ （清）周貽纘修，曹树穀纂：道光《汾阳县志·杂识》，卷十，清道光三十年（1850）修，咸丰元年（1851）刻本。

^⑦ （清）徐继畲纂修，孙汝明、王步蟾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新志·生计》，卷二，清同治四年（1865）修，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无多，即在丰年，不敷民食，必须仰给邻省”^①。“山西平（阳），汾（阳），蒲（州），解（州）等处，人稠地狭。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给于河南，陕西二省”^②。榆次“其民无畜牧杂扰之饶，以牛马服耕，多买之旁县，鸡豚列肆亦半从外来，”^③。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④。“（泽）州介万山中，枉得泽名，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食不足”^⑤。蒲州“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⑥。绛州“土瘠民贸，迄今地狭土燥，民无可耕俯仰无所资，迫而履险涉遐，负贩贸迁以为谋生之计”^⑦。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地狭人众的事实，促使众多山西民众走上经商之路，从而俗尚商贾。

第三，山西省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在汾、涑两河流域及潞安、泽州等府州。汾涑流域为山西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南达中州，西邻陕境，仅一河之隔。明人张渤说：“山西……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⑧。

东南部以潞安府为中心，潞安府“货之属有绸、绫、绢、帕、布、丝、铁、蜜、麻、靛、矾”^⑨，泽州“丝、麻、出陵川者佳，用作船缆，以其从外朽也。绸，有双线、单线，凤台、高平胥产。帕，织成素帛，以橡殼皂之，谓之鸟绫，用以抹额。铁，其输市中州者，惟与煤日不绝于途。”^⑩阳城“铁，近县二十余里出，皆出矿，设炉熔造，冶人甚众，又有铸为器者，外贩不绝。火石，出近域山中，石如漆黑，火芒甚钜，陕豫商人多贩之。黑瓷，土筑各器，炭火煅成，名繁利，用炼药贵，阳城罐者即此，远人挑贩络绎不绝。”^⑪山西所产铁、煤、盐、烟草为输出大宗，潞绸也是山西的著名商品。

^①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四月丙午，宣统上海图书集成公司铅印。

^② （清）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三，《请开采禁疏》，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③ （清）俞世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风俗》，卷七，清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

^④ （清）赖昌期、张彬等纂修：光绪《平定州志·食货·风土》，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⑤ （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五。

^⑥ （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

^⑦ （清）张成德修，李友洙、张我观纂：乾隆《直隶绛州志·艺文》，卷十七，马恕《绛民疾苦记略》，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⑧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

^⑨ （明）周一梧等纂修：万历《潞安府志》，卷九，明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

^⑩ （清）朱樟修，田嘉穀纂：雍正《泽州府志·物产》，卷十二，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⑪ （清）赖昌期修，谭澐、卢廷葵纂：同治《阳城县志·赋役·物产》，卷五，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第二节 山西商人的行商范围

山西商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其活动范围包括京津、鲁、豫、两湖、江淮、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并拓展了蒙古市场及俄罗斯贸易区,在这些地区,山西商人或以商贸活动为特点,占领某一行业;或以金融汇兑为优势,操控金融市场。

4.2.1 京师、直隶

京师,是清代政治中心,也是商贾云集之地。清代,山西商人在京师的工商业中占有绝对优势,把持和垄断了许多行业。如颜料行多山西平遥县商人,所谓“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①。山西临汾、襄陵商人控制着京师的油行、经营香油、花生油、豆油、胡麻油等。此外,还经营杂货、绸缎、酱菜、酿酒、纸张、钱铺等,并建有临汾东馆^②和临襄会馆^③。山西翼城商人在北京主要经营布行,在京建有晋翼会馆^④。山西潞安府商人在京“多业铜、铁、锡、炭诸货”,在京建有潞安会馆^⑤。山西曲沃商人以经营烟业著称,在京建有河东会馆^⑥。山西孟县商人在京经营翟业,建有孟县会馆^⑦等等。在北京的山西商人来自山西的各个地方,他们不仅依靠本地农副产品及手工业产品在京设立商号,而且根据北京市场的需要,组织贩运各种商品。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资金实力的日益雄厚,他们创建了大量会馆。

除以上提到的会馆外,还有山西太原商人创建的太原会馆,太平县商人创建的太平会馆和襄汾县商人创建的太平会馆,浮山县商人创建的浮山会馆,襄陵县商人建立的襄陵会馆、襄陵北馆和襄陵南馆,汾阳县商人创建的汾阳会馆,曲沃县商人创建的曲沃会馆,赵城县商人创建的赵城会馆,翼城县商人创建的翼城会馆、晋翼会馆,,襄陵县商人创建的太平会馆和山西商人创建的晋太会馆,平定县商人创建的平定会馆,解州商人创建的解梁会馆,介休县商人创建的介休会馆,洪洞商人创建的洪洞会馆,永济县商人创建的永济会馆,代州商人创

^① 《公建桐油行碑记》,《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②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6—88页。

^③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7页。

^④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9页。

^⑤ 《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⑥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6—77页。

^⑦ 《新置孟县翟行六字号公局碑记》,《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建的代州会馆，河东商人和临汾商人创建的河东会馆和平阳会馆，平遥、介休商人创建的平介会馆，河东商人创建的河东会馆。此外，还有山西商人创建的三晋会馆，山西会馆，汾水会馆等等共有 36 家会馆。^①

山西商人在天津建有两座会馆，均名为山西会馆，一座位于河东杂粮店街，为山西烟商创建；另一座在锅店街^②。山西商人在津所经营的行业，包括盐业、当铺、颜料庄、栈房、烟业、杂货行、票号等行业，其中以颜料、栈房、票号等行业为最^③。嘉庆时，山西平遥县商人在津开有西裕成颜料庄，山西颜料庄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开有德昌公、公裕、福兴恒等字号。山西票号在天津实力强大，平遥票号帮的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蔚长厚、天成亨、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乾盛亨、谦吉升、云丰泰、松盛长、汇源涌、永泰庆、宝丰隆等票号；祁县票号帮的合盛元、大德通、三晋源、存义公、长盛川、大德恒、大盛川、等票号；太谷票号帮的志成信、协成乾、锦生润、大德川、大德玉义成谦等票号均在此开设分号。^④

张家口是通往蒙古的物资集散地，在康乾时代已成为著名的“塞外商埠”。秦武域《闻见瓣香录》甲卷载：“张家口为上谷要地，即古长城为关，关上旧有市台，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而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为紫貂、猞猁、银针诸皮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⑤。李廷玉在其《游蒙日记》中记录：“城里就口上商户论之，俄设道胜银行，英德设皮毛行（办十七家，均华人充买办），中国上下堡，商一千零三十七家（铺伙多山西人），以票号为大宗，杂货等次之”，“出口货，烟、茶、油为大宗，酒、米、麦、糖、枣、瓷、铁器及丝绸、杂货、绸缎、洋布等次之。运销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梁海等处。而口外出产如驼马、牛羊及各色皮张、毛片、蘑菇并蓝白两旗之碱，乌珠穆沁之青盐，东西苏泥特之白盐，均为入口转售宣府十属三厅及京津或山西一带之货。其内地土货销售俄国者，以红茶各茶砖及大米为大宗，曲丝绸（河南鲁山绸）等次之。由俄销售蒙境及内地者，以哦噶绸（即哈喇），金线毕兔绒、回绒、

①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清）张燕：《津门杂记》，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③ 参看宋美云：《近代天津山西商人活动略述》，《中国晋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④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38—663 页。

⑤ （清）秦武域《闻见瓣香录》甲卷，转引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8 页。

牛皮并各色皮张、驼毛、黄芪、蘑菇、木板为大宗，口上设细皮作坊，凡由俄进口之水獭、海龙、银针、灰鼠、紫貂、白狐、元狐、红狐腿及乌城、库伦所来之黄狐、猢狲、沙狐、貂毛、羔儿皮等均由该作坊制之，乃能分批运销各处。其粗皮张以山羊、绵羊为最多。而鹿茸一项，口上设有专庄。广东、太谷帮收买金沙一项，口庄派众赴蒙界及俄境购来，由口熔成金条，销售京津一带，此张家口商业之大概情形也。”^①

多伦也是山西商人外出经商较为集中的区域，“多伦诺尔，一名喇嘛庙，直隶之散厅也，……自康熙年间，……商务渐盛，居民亦众。今则人家鳞比，衡宇相望，居然汉漠之间一都会矣。市长三十里，广十八里，汉蒙异居，……贸易以马市为最盛”^②。山西商人从库伦等地换会的牲畜主要在多伦交易，“牲畜市以多伦诺尔为枢纽，岁自蒙古进口，以千万计，有牛、马、羊、猪、骆驼等，而马、羊、驼尤伙。秋冬间市肆喧闹，街衢拥挤”^③，当地市场上多“晋省外出生理之人”^④。多伦街市繁华，商号一千多家，其“繁盛之象甲于库伦”^⑤。在多伦经商的山西商人众多，于乾隆十年（1745）修建山西会馆。据现存于馆内清道光二年（1822）重修会馆碑刻记载，有1 000多家商号参与集资。^⑥此外，直隶正定府无极县“商其大者曰盐、曰典，皆山西人挟资为之”^⑦。宝坻“邑之列肆开典者，大率来自他省，惟山右为多”^⑧。

4.2.2 山东、河南地区

明末，山西商人的区域就已经扩展到山东地区。清代，山东的盐、当两业几乎全部为山西商人所垄断。此外，山西商人还经营铁器、丝绸、杂货、酿酒等行业，足迹遍布山东的许多城镇：临清“西路铁锅大约即出自山西潞安的潞

^①（清）李廷玉：《游蒙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版。

^②（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都会》，卷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③（清）姚明辉纂修：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④《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八，乾隆十九年九月癸酉。

^⑤（清）李廷玉：《游蒙日记·五月二十五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1990年版。

^⑥高志昌、延光先《多伦的山西会馆》，载《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2页。

^⑦（清）黄可润纂修：乾隆《无极县志》，卷一，清乾隆十三年（1747）修，二十二年（1757）刻本。

^⑧（清）洪肇彬修，蔡寅斗纂：乾隆《宝坻县志》，卷七，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

锅”^①。其城内茶叶店铺数十家，“以山西商人经营的边茶转运贸易为主”^②。潍县“铁器，山西客商贩来，销售岁约五百金”^③。张秋“商品来源远及闽广、吴越、山陕，输入商品以杂货、绸缎为大宗”^④。聊城“铁货自山西贩来”^⑤。而且“仅有名号可考的山陕商号即有三四百家，可区分经营内容的店铺有：布店、皮货店、衣帽店、粮行、盐店、茶叶店、海味店、钱店、当铺、铁店、板店、丹店、炭店、烟铺、纸局、西货铺、蜡烛店、粉坊、毡坊、染坊”^⑥等等。19世纪票号创办之后，许多山西票号在济南开设分庄，光绪末年的《大公报》曾载：“兹有山西志诚信票号来济设一分庄，专汇各省银两”^⑦。山西商人在山东的临清、聊城、泰安、周村、东阿等地均建有山陕会馆。

河南是清代山西茶商南下贩茶的必经之路，清代山西商人活跃在河南境内的众多城镇，在开封、洛阳、朱仙镇、周口、北舞渡、赊旗等地都建有山陕会馆。山西商人在开封所经营的行业范围相当广泛，有典当业、金店、钱店、烟店、铁货店、米铺、酒行、油行、皮袄行、布行、汴绦行、成衣铺、蜡行、金珠行、水烟行、皮货行、估衣行等^⑧。在洛阳所经营的行业有，杂货、布行、广货行、铁货行、油坊等^⑨。在朱仙镇经营范围涉及“杂货业、典当业、粮油业、烟业、服饰业、饮食业、手工业”^⑩等行业。在北舞渡镇主要经营“粮行、油店、杂货业”^⑪等行业。在赊旗镇经营花粉行、盐驼店、烟店、票号^⑫等行业。河南所产曲绸，是蒙古人非常喜爱的衣料，太谷商人曹氏所经营的字号，如锦霞明、锦泰亨缎庄，从河南购进曲绸，重新包装后，运销蒙古地区^⑬。

4.2.3 蒙古和俄罗斯

“蒙古南连汉地，北接俄国，界汉俄之间，故为中俄贸易之大关键”^⑭。清

^①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②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③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9页。

^④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⑤ （清）向楠编：光绪《聊城乡土志·商务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本。

^⑥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⑦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⑧ 许檀：《明清时期开封的商业》，《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一期。

^⑨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四期。

^⑩ 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5年第六期。

^⑪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二期。

^⑫ 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商业》，《历史研究》2004年第二期。

^⑬ 张巩德：《山西票号综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⑭ （清）姚明辉纂修：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代,山西商人的对蒙古贸易,无论在经营业务种类上,还是行商地域范围上,都是其他任何一个同时代商帮都无法比拟的。蒙古地区是山西商人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地区,陈篆《蒙事随笔》称:“外蒙商务基础成于西帮……就中如公和全、庆和达两家,总行在张家口,分行则在北京、上海、恰克图及俄国之莫斯科、乌丁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处”^①。著名商号大盛魁“单是同蒙古的贸易额就不下九百万两或一千五百万两白银。为了运输货物,该店有一千五百峰自备的骆驼,经常往来于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②。库伦、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城是蒙古草原上山西商人的贸易聚集地,恰克图是中俄贸易的枢纽。

库伦,蒙古草原上的中蒙贸易商城,城内街市分三部分:中为宫殿区、西为喇嘛区、东为买卖城,是商场所所在。^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④。从此,库伦成为与俄国同上都会。据《内蒙地志》载,康熙年间,有十二家山西商人到库伦经商,“当时商会之组织,即为十二家各举一商董,成为十二甲首,在东营子造屋办公”^⑤。陈篆《蒙事随笔》中称:“库伦西帮商号……统计山西商人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专为大宗批发营业者,其行栈麇集于东营子与买卖城”^⑥。“库伦商户百余家,晋人十之六,顺(天)直(隶)人十之一,俄人十之三,其交易以皮张、哈喇、绸缎、布匹、茶叶为大宗,杂货次之”^⑦。

乌里雅苏台在康熙年间成为屯防要地,乾隆三十二年(1767)筑城^⑧,也是山西商人在蒙古的重要市场,其“街市,城之西距三里余,民人自建铺房一千余间,分东、西、北三街,贸易商民三千余名,俱不准携眷”^⑨。其市场上的主

^① 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②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③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

^⑤ 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⑥ (清)陈篆:《蒙事随笔》,转引自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⑦ (清)李廷玉:《游蒙日记·润四月初九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1990年版。

^⑧ (清)佚名:《嘉庆《乌里雅苏台志略》,嘉庆年抄本。

^⑨ (清)《定边记略》道光二十二年,(后有增补)。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版。

要交易货物为驼、马、牛、羊四项牲畜，以及皮张、黄油和蘑菇等。^①科布多在蒙古最西部，乾隆二十二年筑城，内有商铺数十家，^②分“京庄、山西庄两大别”^③。山西著名商号大盛魁就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商业阵地，将其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货物，经过归化城，以驼队运至乌、科两地，分向外蒙各“和硕”销售；其从外蒙各“和硕”贩运的牲畜，皮毛和其它产品，也都经过归化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进行销售。^④

恰克图买卖城位于中俄边界，雍正五年（1727），“择恰克图地为互市场，今之买卖城是也。又以理藩院司官驻扎其地，管理通商事务，是蒙古沿边贸易，均归此处。俄国商人至京贸易者，亦取道于此。城内百货云集，商业繁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余，贸易品以茶为大宗”^⑤。恰克图为中俄于蒙古陆路贸易之中心点，俨然都会。^⑥距库伦 800 里，距张家口 4 300 余里。“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杂货，输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⑦。由张家口至恰克图的商路有三：东路自乌兰察布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锡林郭勒盟，入外扎萨克车臣汗部，到库伦，再达恰克图；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赛音诺颜分为两路，其一西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至恰克图；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镶黄旗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图汗车臣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抵恰克图。三路中以中路路程最短，俗称买卖路，乃山西商人最活跃的地方。^⑧乾隆年间，榆次常家在恰克图开设的大德玉商号对俄贸易，输出茶叶、绸缎、进口皮毛、牲畜、银锭。道光以后又陆续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号，并在莫斯科设分店。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山西商号中，车辋常家经营长达 150 余年（乾隆至宣统），而且规模最大。^⑨

①（清）《定边记略》道光二十二年，（后有增补）。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年版。

②（清）富俊等辑：《科布多事宜》，道光年增补抄本。

③（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④《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旅蒙商大盛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1994 年版。

⑤（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都会》卷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⑥（清）姚明辉纂修：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⑦（清）松筠：《绥服纪略》，转引自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5 页。

⑧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88—89 页。

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31 页。

此外,据路履仁《外蒙古纪闻》称:“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都设有分庄”^①。

4.2.4 两湖地区

山西商人在湖南、湖北以至江西、福建一带的商贸活动以茶叶为最,涉及种植、加工、运输等领域。19世纪中叶山西茶商远赴福建武夷山一带贩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阻断了山西茶商与福建的茶场,他们在湖南、湖北的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开辟新的茶叶生产基地。光绪中期,山西茶商在蒲圻等地建立起了茶叶加工作坊,进行较大规模的制茶作业。^②山西商人销往恰克图的茶叶绝大部分取自湖北、湖南,而且数量庞大。

除了茶叶之外,山西商人在湖南、湖北的经营还涉及布匹、烟草、粮油、皮货等行业。在如湖北云梦县,“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凡山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运,布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至河南渡黄河,布多微黯,故西商于云立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籍以有无相通”^③。在湖南衡阳“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九堂十三号”^④。长沙“贩卖皮货、金玉玩好、列肆盈厘,则皆山陕之客商”^⑤。善化县“各省商于邑者,北客西陕……几遍城乡”^⑥。

湖北汉口是山西商人汇聚之地,山西商人在此地建有山陕会馆,在汉口的山西商人包括: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皮货帮、众账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等。^⑦此外,票号创办之后,湖北省汉口也是山西票号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市场,“汉镇市面,银根活源以西号票借为最巨,统汉镇而言。……一经西号收现,势必顷刻牵动全局”^⑧,到光绪七年(1881),汉口有山西票号32家。^⑨

^① 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② 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载《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③ (清)吕锡麟修,程怀璟纂:道光《云梦县志略·风俗》卷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④ (清)罗庆芝修,彭玉麟等纂:同治《衡阳县图志》,卷十一,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⑤ (清)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卷十四,乾隆十二年(1767)刻本。

^⑥ (清)吴兆熙、曹沅:光绪《善化县志》,卷十六,光绪三年(1877)刻本。

^⑦ 阳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⑧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⑨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4

此外,山西商人在两湖地区的经营活动遍及诸多州县,如湖北钟祥县^①、郧西县^②、随州^③、江陵^④、公安^⑤、当阳^⑥等地,湖南长沙、湘潭亦建有“山陕会馆”^⑦。

4.2.5 其他地区

明代,山西商人在江淮地区的活动以业盐为主,清代则以金融业为最。同治年间,先后有日升昌、元丰玖、谦吉升、蔚长厚、乾盛亨、协同庆等七家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分庄。^⑧光绪五年(1879),山西票号“在沪上者已有二十三家”^⑨,光绪八年(1882),增至25家。^⑩

山西商人在两广地区的商业活动以广州、佛山最盛。山西商人在广东设有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字号。¹¹佛山是山西商人在广东活动较为活跃的一个城镇,山西商人曾与陕西商人共同在这里修建山陕会馆,据道光三十年重修会馆碑刻资料可知,参与集资的两省商号达204家。¹²山西票号在广东设有20多家分庄,其中广州13家、汕头2家、潮州1家、琼州1家、香港2家、九龙1家。在广西开设分庄10家,即桂林5家、梧州4家、南宁1家。¹³此外,蔚长厚、新泰厚、蔚泰厚、协成乾等票号在同治年间先后设庄在福州、厦门开设分庄。¹⁴

山西商人在四川经营的商品包括丝、盐、布、茶,以及铜绿(制作颜料的原料)。四川的生丝交易中心綦江扶欢坝丝市,“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

页。

① (清)张福海:同治《钟祥县志》,卷五,同治六年(1867)刻本。

② (清)程光第:同治《郧西县志》,卷十六,同治五年(1866)刻本。

③ (清)文龄、孙文俊:同治《随州志》,卷十四,同治八年(1869)刻本。

④ (清)倪文蔚、蒋铭雄:光绪《荆州府志》,卷四,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⑤ (清)倪文蔚、蒋铭雄:光绪《荆州府志》,卷四,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⑥ (清)阮恩光:同治《当阳县志》,卷九,同治五年(1866)刻本。

⑦ (清)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九,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

⑧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⑨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⑩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¹¹ 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¹²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72页。

¹³ 曾桂婵:《山西票号在广东》,载《广东文史资料》,第六十九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¹⁴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马驮舟载，本银约百万之多”^①。南江县“春分即有山陕客民来山置买（茶），落经济人家，以便交易”^②。在贵州主要经营丝、食盐、黑铅、水银等，同时兼办汇兑业务。^③山西商人是云南铜的主要经营者，光绪三十二年（1906），云南成立省垣商务总会，参加商会组织的行帮有59个，山西商人是省外的主要商帮之一。^④山西票号在西南地区设立多处分号，进行汇兑业务，“节次代解四川京饷、划拨滇省军饷，并由滇省汇兑”^⑤。

山西商人在西北地区的行商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陕西与山西隔黄河相望，山西商人在陕西主要经营盐、木材、绸缎、皮革等商品。乾隆《周至县志》载“行盐、贩木及开张绸缎、皮革皆属晋人”^⑥。山西商人在新疆经营票号、茶庄、杂货行等，将内地的丝绸、布匹、茶叶、铁制器具等与新疆的牲畜、皮毛、粮食交换。据档案资料记载，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中，需“晋省泽绸三百匹”^⑦，乾隆三十八年（1773），伊犁调取贸易泽绸二百疋移咨晋省织办^⑧。山西商人在酒泉开设的票号有，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三家，汇兑业务频繁，如“河东应解甘肃兰州饷银，三次发交平遥县商人汇兑银八万两”^⑨，“甘肃省城只天成亨，协同庆开设汇兑号，该二号又在凉州府各设分店”^⑩。兰州、永登、永昌、张掖等地的山西商帮以经营皮毛业为主¹¹。山西商人在青海也以经营皮毛业为主，他们在青海各贸易中心设庄，收购皮毛土产，在西宁和贵德两地较有实力的山西商号是德兴旺、世诚和、义成昌、瑞凝霞、天德玉、协成裕等商号¹²。山西票号在陕西的西安、三原、汉中，甘肃的兰州、甘州、肃州，以及宁夏、新疆、西藏等省份

①（清）宋灏修，罗星纂：道光《茶江县志》，卷十，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

②（清）闻肇堃：乾隆《南江县志·物产》，卷上，乾隆十六年（1751）抄本。

③《贵州省志·金融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④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⑤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⑥（清）王彰纂：乾隆《周至县志·风俗》卷九，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⑦《陕甘总督吴达善奏请敕办庚寅年新疆贸易绸缎以备需用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第370—371页。

⑧《署山西巡抚湖南巡抚觉罗巴延三奏报解伊犁之贸易详细事》，《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3辑，第584—585页。

⑨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⑩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¹¹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¹²穆雯琰：《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的城市均开有票号。^①

山西商人是最早前往东北的商帮，在沈阳“山西帮……纷至沓来，反客为主矣”^②。“汉民到（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余年者，本巨而利亦厚，其肆中执事，不杂一外籍人”^③。其经营业务范围很广，涉及土特产、杂货、粮食、铁、盐、酿酒、榨油、当铺、颜料，以及后来的票号业。据清档案载：闯关东者，“吉林、宁古塔等处，（人参）刨夫除本地旗民外，多系山东、山西、直隶等处流籍”^④。当时，清康熙朝设置的从喜峰口到齐齐哈尔的驿路，实际上成了山西商人北运茶、丝绸、布、瓷器，南贩皮毛、人参、麝香的重要商路。^⑤《黑龙江外纪》卷六记齐齐哈尔“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然稍涉贵重，或贩自京师，若绸缎之类，恐入势要手致折阅，则深藏若虚，非素亲厚不能买，既卖尤数嘱毋令某某知也”^⑥。吉林盛产人参，“每十月间”，“有苏州、山西参商来买者”。帽业也多晋商，《黑龙江外纪》称：“商贩春秋毡帽、夏草帽，唯晋商帽皆有纓”^⑦。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分庄很快开设到东北地区，咸丰十一年（1861），“在奉天等二十七个城镇设立总分号数百处”^⑧。晋中富商候家的蔚字号在沈阳、哈尔滨等东北城镇设立分庄。合盛元票号先后在奉天（沈阳）、营口^⑨、安东（丹东）^⑩、哈尔滨¹¹等城市设庄。

第三节 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

山西商人经营的行业主要有金融业、茶业、烟业、棉布业、铁货业、皮毛业、粮油业、杂货业、运输业、餐饮住宿业及牙行。其中又以金融业、茶业、烟业、棉布业、铁货等行业为最，以下分别简述之。

^①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② 赵恭寅修，曾有翼纂：民国《沈阳县志》，卷七，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③ （清）徐宗亮《龙江略述》，卷六，北京莱薰阁据光绪十七年（1891）本誉印。

^④ 清档军机处录副，金简、福康安《查办参务》。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⑤ 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⑥ （清）西清：《黑龙江外纪》，卷六，北京莱薰阁据嘉庆十五年（1810）本誉印。

^⑦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⑧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802—803页。

^⑨ 张正明：《平遥票号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⑩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¹¹ 阳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4.3.1 金融业

金融业是市场的润滑剂，它起到融通资金、活跃市场的重要作用。发达的金融业是一个地区商业活动繁荣或商品交易频繁的象征。同样，发达的商业也可以促进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当铺是山西金融业最早的形式，清康熙以后，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各种形式、规模不等的金融机构在山西得到迅速发展。除当铺、钱庄、银号外，印局（印票庄）、账局（账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相继出现。

典当业，即当铺，又称典铺、质库、押店等，当铺是从事消费抵押信贷的金融机构。康熙二十四年（1685）山西省有当铺 2 562 家，乾隆年间增加到 4 695 家，较康熙时增长 83.25%。^①在全国的典当业中，“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②，操半壁江山。山西典商在京师、天津、汉口，以及湖北的黄陂、襄阳、光化等地均开设当铺。咸丰三年（1853），京师有当铺 159 家，其中山西典商开设 109 家，占当铺总数的 68.5%。^③天津的锅店街设有山西当商建立的当业会馆。^④山东临清州在乾隆年间“乡合城存十六七家（典当铺），皆西人”^⑤。汉口有山西介休县商人开设的当铺 15 家，分别是咸益祥、福来同、广泰福、庆泰成、锦春发、永顺厚、永昌瑞、庆春隆、源丰涌、益昌升、天裕丰、晋泰恒、萃升源、福美尊、大元裕。^⑥湖北的黄陂、襄阳、光化三县，道光二十三年（1843），共开设有当铺 50 家，其中 20 家为山西商人所开设。^⑦汾州府介休县从事典当业商人数众多，“介休商业以钱、当两业为最，其他各行商号，均系兼营并驾，绝少专业，亦无大资本家。至邑人出外贸易者，在京则营当商、账庄、碱店，在津则营典质转帐，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商、印行邑人最占多数”^⑧。清末著名银行家李宏龄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是山西人经理”^⑨。

钱庄最初是从事钱币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后来业务扩展，办理存放款业

① 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6 页。

② （清）李燧：《晋游日记》，卷三，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丙申，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

③ 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9 页。

④ 张庚麟、黄廷槐修：民国《介休县志·物产》，卷七，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⑤ （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钟纂：乾隆《临清州志·市厘志》，卷十一，清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⑥ 《汉口山陕会馆志》卷下，光绪辛卯夏月。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9 页。

⑦ 清档，《湖北省绅士商民捐输海疆经费银钱数目并请议叙姓名清单·财捐》，卷三三，道光二十三年。

⑧ 张庚麟、黄廷槐修：民国《介休县志·物产》，卷七，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⑨ （清）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

务。汾州府平遥县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市楼时即有5家钱铺参与集资。^①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山西商人开设的钱庄或钱铺，京师开设钱铺者“多为山东、山西铺商”^②。直隶无极县有钱铺40余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其中有将近200人来自山西汾阳、平遥、太谷、祁县、孝义、文水等县^③；乾隆三十年（1765）在苏州有山西人开设的钱庄81家^④；光绪年间，山西商人在奉天开设有50余家钱庄^⑤。山西钱商在北方的很多城市的钱行中都居于垄断地位，在很多地方均有自己的行会组织，现存于代县雁门关的立于宣统初年，记录参与募化修雁门关道路的《太谷县布施碑》中，就记录了在归化城的钱庄行会，即“宝丰社”^⑥。

银炉即炉房，有私铸权。^⑦乾隆二十三年（1758）和嘉庆十八年（1813）两次重修市楼时均有银炉参与集资。^⑧

印局是办理短期小额信用放款的金融机构，其借贷以铜钱货币为主。嘉庆十八年（1813）平遥《重修市楼碑记》有印局参与集资的记录。^⑨光绪年间，在全国许多省份均有山西商人从事印局生意，《益闻录》记载：“以穷民之汗血为鱼肉……则各省晋人所放之印子钱是已”^⑩。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记载：“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⑪。在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地“印行邑人（介休人）最占多数”^⑫。

账局是从事放款的金融机构，主要从事对商铺和官的放款活动，“各行铺户皆籍此为贸易之资”^⑬，有时兼营对官僚的放款，“候补候选官员在京借用重利私账”^⑭。在京师，“汾（州）平（阳）两郡……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⑮。

^① 据乾隆二十三年的（1758）《今将捐资姓名开列于后》统计，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61页。

^② 清档《朱批奏折》，鸿胪寺卿祥泰，咸丰三年四月三日奏折。

^③ 《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页。

^④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

^⑤ 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⑥ 现存于山西省代县雁门关，笔者曾于二〇〇五年前去抄录。

^⑦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⑧ 据乾隆二十三年（1758）《今将捐资姓名开列于后》和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记》统计，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90页。

^⑨ 据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记》统计，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90页。

^⑩ 《益闻录》，光绪六年六月十二日。

^⑪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⑫ 张庚麟、黄廷槐修，董重纂：民国《介休县志·物产》，卷七。民国十三年（1924）修，十九年（1930）铅印本。

^⑬ 清档，翰林院侍读学士宝钧，咸丰三年三月十四日奏折。

^⑭ 《清仁宗实录》，卷三〇八，嘉庆二十年七月。

^⑮ （清）李燧：《晋游日记》，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一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咸丰三年（1853）北京有账局 268 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有 210 家。^①汉口亦有“山西汾州府众账帮”的记载。^②在清末，京师和张家口仍存在数家开设较早的山西账局，参见下表：

表 4-1 清末尚存几家开业较早的账局

账局名称	祥发永	永泰公亨 记	大升玉	隆盛永	大泉玉	保隆堂
开业年代	乾隆元年 (1736)	嘉庆十二年 (1807)	嘉庆十九 年(1814)	道光十七 年(1837)	道光二十 年(1840)	道光二十 二年 (1842)
总号所在 地	张家口	京师	张家口	京师	张家口	京师
设分号城 镇	京师、上海		京师、上海		京师	太谷县
资本(两)	40 000	21 000	50 000	7 680	30 000	70 000
股东籍贯	山西汾阳 县	山西太谷 县	山西榆次 县	山西介休 县	山西榆次 县	山西太谷 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 页。

票号是山西商人首创的专门从事汇兑业的金融机构，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是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的日升昌，不数年，大获其利。其后，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财东先后将其开办的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蔚丰厚等五家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山西票号在道光年间为兴起，光绪时达到鼎盛，详见下表：

^① 据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表 4-6 京城咸丰三年 268 家帐局商人籍贯统计表》统计。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97 页。

^② 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96 页。

表 4-2 历年山西票号家数比较表

年份	家数
道光三年(1823)	1
道光六年(1826)	6
道光十七年(1837)	7
咸丰元年至咸丰五年(1851—1855)	10
咸丰六年(1856)	11
咸丰九年(1859)	13
咸丰十年(1860)	15
咸丰十一年(1861)	14
咸丰十二年至同治十三年(1862—1874)	26
光绪元年至光绪八年(1875—1882)	28
光绪五年(1879)	29
光绪九年(1883)	30
光绪十年(1884)	28
光绪十一年(1885)	27
光绪十九年(1893)	28

资料来源：据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第 21 页和第 213 页数据统计得到。

在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增加到 80 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门、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淖、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孟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亳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和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号称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三帮之中，以平遥帮最早，且资本最雄厚。其次为祁县和太谷两帮。将祁、太、平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表 4-3 祁、太、平三帮票号统计表^①

票帮	票号	财东	经理	资本 (两)	前身	创立年代
平遥帮	日升昌	李正华	雷履泰	32 万	颜料庄	道光初年
	蔚泰厚	候癸	毛鸿翎	24 万	绸缎布庄	道光六年
	蔚丰厚	候姓	范凝静	20 万	绸缎庄	道光六年
	天成亨	候姓	候王宾	20 万	布庄或货行	道光六年
	蔚盛长	候姓	李梦庚	16 万	绸缎庄	道光六年
	新泰厚	候姓	候王敬	16 万	绸缎庄	道光六年
	蔚长厚		范光晋	15 万	茶庄	同治五年
	协同庆	米、王姓	刘清和	12 万		咸丰六年
	协和信	王姓	李清芳	10 万		咸丰初年
	汇源涌	渠姓	殷启祥	14 万		光绪初年
	百川通	渠姓	庞凝山	16 万		咸丰十年
	宝丰隆		乔世杰	20 万		光绪三十二年
合计				215 万		
祁县帮	大德通	乔姓		24 万	茶庄	咸丰年间
	大德恒	乔姓		24 万		光绪七年
	三晋源	渠姓		30 万		同治初年
	存义公	渠姓		20 万	布庄	同治初年
	合盛元	郭姓		20 万		道光十七年
	巨兴隆	载姓		10 万		同治年间
	大盛川	张姓		20 万		光绪十五年
	长盛川	渠姓		16 万		光绪十年
	元丰玖	孙姓	王封晋	14 万		咸丰九年
合计				174 万		
太谷帮	志成信	负、孔姓		26 万	丝绸、杂货庄	道光年间
	协成乾	负、张姓		24 万		咸丰十年
	大德玉	常姓		20 万	茶庄	光绪十一年
	锦生润	常姓		20 万		光绪年间
	世义信	杨姓		30 万	钱铺	光绪二十九年
	大德川	常姓		20 万		光绪三十三年
合计				140 万		
总计				529 万		

4.3.2 茶业

清代山西茶业的发展是随着山西茶商行商地域的扩展而不断发展的。茶货贸易发端于明代经营边镇茶马贸易，清代山西茶商由明代的边镇一线向整个中国北部地区发展。山西茶商在东北至关外瑗瑯（黑龙江城）、嫩江、齐齐哈尔、

^①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38—662 页。

海拉尔、宁古塔、吉林、奉天；北至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归绥；西至新疆的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克苏、叶尔羌等地的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贸易活动。

山西茶商所贩之茶来自南部各省，清代前期前往福建武夷山、安徽霍山一带贩茶。“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①。安徽霍山“土人素不辨茶味，惟晋、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经千里，夹资裹粮，投牙预质”^②。浙江建德“为产茶之区……向由山西客贩至北路归化城一带出售”^③。在武夷山采茶，其茶市在福建省崇安县下梅镇。茶由产地陆运至江西省铅山县老河口，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咸丰时，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产茶地区北移至湖北的羊楼峒，蒲圻县与湖南临湘县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安华及咸宁等处。“在湖北省之羊楼洞，山西茶商每年常设立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大都推销于俄国及亚洲市场”^④。山西茶商将收购的茶叶“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⑤。

山西茶商将所收购之茶叶汇聚于汉口，或沿长江上行至打箭炉，或顺汉水至襄樊再经赊店西行陕甘新疆，北行东西二口，至蒙古及俄罗斯腹地。汉口的山陕茶商分为红茶帮、盒茶帮和卷茶帮，经营红梅茶、三九砖茶、三六砖茶、二四砖茶、半斤砖茶、千两茶、米心茶等品种的茶货。红梅茶在汉口就地卖给俄国洋行；米心茶是把红梅茶末制成块，运至归化城，再贩往新疆；砖茶大部分销往内、外蒙古及俄国各地；千两茶在祁县叫三和茶，千两茶就是贡尖茶，比砖茶质高，运销陕西、甘肃、山西、张家口一带。^⑥

恰克图贸易中，茶叶是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商品之一，中俄恰克图贸易始于雍正五年（1727），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量迅速增长，年平均贸易量由71万卢布增加到464万卢布。19世纪上半叶，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逐年增多。

^①（清）袁干：《茶市杂咏》，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4页。

^②（清）栾元魁等修，张孙振等纂：《霍山县志·土产》，卷二，清顺治十八年（1661）刻本。

^③《益闻录》，光绪九年。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1页。

^⑤（清）劳光泰修，但传煊纂：道光《蒲圻县志·风俗》，卷四，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⑥吕洛青：《祁县的茶庄》，《山西文史资料》，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第106辑，1998年版。

茶叶出口以价值计,嘉庆年间每年为 228 499 卢布,同治年间每年出口增至 5 976 204 卢布^①,增长 25.15 倍。另据恰克图税关调查,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十年间所收茶税 4, 808, 084 卢布,咸丰元年以后,十年间有 4 827 990 卢布。^②由此可知,山西茶商在恰克图贸易量巨大。

山西茶商中祁县商人占很大比例,他们开设为数众多的茶庄。咸丰、同治年间,祁县有长裕川、巨贞川、永聚祥、大玉川、裕盛泉、德逢源、大德诚、巨盛川、大德川、宝聚川、长源川、宏源川、通川盛、福康泰、大德兴等茶庄近 20 家。大者资本 10 万两(长裕川、大玉川),小者 2 万两。祁县茶庄入两湖采茶时的路线如下:

去程:祁县——子洪——沁州——鲍店——泽州府(祁县至泽州,陆路五百八十里)——荥阳——郑州——赊旗镇(泽州至赊旗镇,陆路一千三百五十五里)——樊城(赊旗店至樊城,水路三百四十五里)——安陆府(报厘金)——汉口(樊城至汉口,水路一千二百一十五里)——益阳(汉口至益阳,水路八百四十里)——边江(益阳至边江,水路二百五十里)——沙市(水路二百二十里)——(小河)【水大,右走晃湖寺省路;中常,走左,三叉河;水枯,左走年鱼夕】——常德。(水路四百九十里)由常德起旱进山,置办茶叶。^③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仑、恰克图。茶叶由产地运到恰克图,全程约 3 000 公里,水陆转换,需时 3 个月。^④

山西茶商前往两湖购茶,在湖南省临湘县设有 20 多家茶庄,主要经营黑茶,或销往汉口转销他地,或直接销往蒙古和俄罗斯,参见表 4-4。

表 4-4 清末、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在临湘经营茶庄主要名录如下^⑤

地址	名称	品种	外销地
聂家市	大涌玉	黑茶	俄、蒙
聂家市	新记	黑茶	汉口
聂家市	顺记	黑茶	俄、蒙
聂家市	巨贞和	黑茶	汉口
聂家市	晋裕川	黑茶	俄、蒙
羊楼司	顺记	黑茶	汉口

^①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②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③ 据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大德诚茶庄)祁县至安化水陆程底资料整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3页。

^④ 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祁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3页。

^⑤ 吕洛青:《祁县的茶庄》,载《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九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续表:

羊楼司	怡和	黑茶	汉口
羊楼司	瑞和祥	黑茶	汉口
羊楼司	长盛川	黑茶	俄、蒙
羊楼司	德泰	黑茶	汉口
临湘滩头	谦丰和	黑茶	汉口
临湘滩头	春生利	黑茶	汉口
临湘云溪	德生祥	黑茶	汉口
临湘五里牌	德泰隆	黑茶	汉口
临湘五里牌	怡和	黑茶	汉口
临湘五里牌	德裕昌	黑茶	汉口
临湘五里牌	春生利	黑茶	汉口
临湘五里牌	阜昌	黑茶	汉口
临湘清水源	和记	黑茶	汉口
临湘百里畷	义兴	黑茶	俄、蒙
临湘桃林	义记	黑茶	俄、蒙
临湘桃林	三晋川	黑茶	俄、蒙
临湘横溪	大涌玉	黑茶	俄、蒙
临湘横溪	晋裕川	黑茶	俄、蒙
临湘横溪	义兴	黑茶	俄、蒙
临湘横溪	怡和	黑茶	俄、蒙
临湘五里	兴隆茂	黑茶	汉口
临湘五里	天顺长	黑茶	汉口
临湘羊楼司	兴华	黑茶	汉口

注:黑茶即老青茶。在临湘为山西商人所拥有的茶庄共有 29 家,其中 8 家为分号,实为 21 家。

4.3.3 烟业

烟草为山西本地所产。中国自古无烟草,明代传入福建和广东。山西曲沃种植烟草,是明季“乡民张士英自闽中携种植之”,从此,农民“尽赖此颇有起色”。^①从曲沃种植以来,烟草在山西得到推广,蒲州、绛州、汾州、潞安、代州相继种植^②,保德州在乾隆年间“悉种烟草”^③。

曲沃县是山西最主要的烟草产区和加工中心,其品种之多,配料之精,非他乡所能比拟。曲沃所产烟叶是晒烟,即把收获的烟叶用绳子拴成一串,悬挂凉干。这种晒烟,颜色黄绿,色泽光亮,油性大,弹性强,易燃火。在曲沃北

^① (清) 侯长燧修, 王安恭纂: 乾隆《续修曲沃县志·舆地志》, 卷一, 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

^② (清) 曾国荃、张煦等修, 王轩、杨笃等纂: 光绪《山西通志·风土记下》, 卷一〇〇, 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③ (清) 陆耀:《昭代丛书本》卷四六, 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第84页。

荣裕、杨谈、北白集、城关等地均建有烟坊，这些烟坊是以加工制作旱烟为起点，兼在各地设店铺经营批发零售业务的综合性企业。曲沃存在过大大小小数百百家烟坊，尤以裕顺永、魁太和、东谦亨、西谦亨、南谦亨、北谦亨等号为著。表 4—5 为清代曲沃规模较大的烟坊，及其主要产品和销路。

表 4—5 清代规模较大的曲沃烟坊^①

字号	掌柜	地址	主要产品	主要销路
北谦亨	张大湜	东凝村	北生烟、北生定烟、北生青烟	绥远、张家口、大同、太原、榆次
东谦亨		东凝村	东生烟	蒙古、俄罗斯
西谦亨	李济雍	东关	天生烟、天生定烟、紫生定烟	内蒙古
南谦亨		南关	仁生烟、仁生定烟	绥远、大同
永和成	杜敬甫	西关	永和成皮烟、成生烟、杂拌烟	曲沃、新绛、运城、包头
天和茂	原有毅	北关	和生烟、和生定	绥远、张家口
蔚生源		西关	蔚生烟、蔚生定	忻县
祥云集	张侗	席村	祥生烟、祥生定、杂拌烟	祁县、汾阳、忻县、绥远、张家口
谦亨永	刘占亨	席村	予生烟、予生定	大同、张家口、绥远
奎盛盖	阎树祯	席村	奎盛皮烟、云生烟	洪洞、赵城、介休
大德庆		席村	庆生烟、庆生定	蒙古、绥远
裕顺永		苏村	裕丰皮烟	灵石
新隆奎	董启祥	席村	新隆皮烟	平遥
兴隆昌		北白集村	王梦龙皮烟、兴隆皮烟	碛口、柳林、陕北、平遥
日生昌	王辑瑞	高村	日生烟、日生定、日生皮烟	蒙古、绥远、张家口、平遥、介休
玉通永	庞子玉	西许村	明生定、明生烟	张家口
裕源宏		西许村	宏生烟、宏生定	绥远、张家口
福生庆		西许村	福生烟	蒙古、绥远
永发和	刘琳	东凝村	月生烟、月生定	张家口地区
天盛张		东凝村	张生烟	介休、孝义
永和久	秦子坚	东凝村	永和久皮烟、久生烟	新绛、运城、介休
奎泰和	郭爱堂	高显	奎生烟、奎生定、奎泰皮烟、拔萃皮烟	蒙古、内蒙古、张家口、宁夏、甘肃、平遥
长盛源	张永绥	高显	原生定、晋生定、杂拌烟	绥远、张家口、祁县
德新和	同存葵	高显	新生烟、新生定	绥远
福德生		高显	福德皮烟	沁县
益顺永		北王村	益顺皮烟	霍县

^① 段士朴：《曲沃烟史简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二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续表:

义和泰		北赵村	义和皮烟	沁县、襄垣
永兴和	郑世宽	下坞村	郑世宽、晶生、永兴皮烟	长子、屯留
世昌和		杨谈村	世昌皮烟	洪洞
协成顺		杨谈村	协成皮烟	临汾、洪洞
福昌公		城内	福昌皮烟	曲沃、绛县
谦德亨	赵武	西凝村	昌字皮烟、谦生烟	太原

除曲沃各烟号外,邻近县份经营旱烟业的商人开始行商至省内外,被称为“河东商人”。京师广安门大街的河东会馆为山西烟商所建,该会馆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初建时“前后四层,过道一方,楹列屋翼其旁,共计肆拾陆间。凡深长三十五杆零五寸,北阔十三杆零三寸,南阔十二杆零七寸”^①。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共整修、扩建四次,参与集资商号众多^②。参见下表:

表 4—6 乾隆嘉庆年间在京山西烟商数量变化表

年份	商户数	捐银(两)
乾隆二十五年(1760)	532	863 两 6 钱 4 分
乾隆四十四年(1779)	480	773 两 5 分
嘉庆七年(1802)	402	969 两 1 分
嘉庆二十二年(1817)	263	1328 吊(折银 1021 两 5 钱 4 分) ^③

资料来源:据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6—85页资料统计。

从上表可以知道,在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57年间,河东会馆共整修、扩建四次,虽然参与集资商号数量有所减少,但集资数额呈上升趋势。光绪年间奏报称,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师尚有山西烟商295家,且烟商生意“全在以银买烟,以烟卖钱,再将卖烟之钱,收买银两,用以买烟,往来周转,可获蝇头之利,此中营业之性质然也。”^④因此烟商多数兼营兑换银钱业务,自称“烟钱铺”,“夫北京烟钱铺数百年,其赖此生活者殆万有数千人。”^⑤山西烟商除在山西省内及蒙俄地区经营烟草外,还活跃于

^①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②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③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④ 清巡警部档,《烟钱铺商人呈巡警部徐正堂禀》,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⑤ 清巡警部档,《烟钱铺商人呈巡警部徐正堂禀》,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南方省份。同治年间,湖南省衡阳县“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斤,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阳”^①。

4.3.4 棉布业

棉布业是明清时期山西民间手工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山西境内已有许多地区可以产布,但是山西本省所产棉布并非山西布商所资贩卖的大宗,他们深入到全国各个产布区收购布匹,行商全国进行售卖。

山西布商所贩之布大都来自湖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湖北是清代兴起的棉布产区,云梦县是湖北棉布转贩西北的必经之路,山西布商多在此地凉晒、改捆,乾隆《云梦县志》记载,云梦城内:“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凡山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运,布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至河南渡黄河,布多微黯,故西商于云立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籍以有相通”^②。汉阳也是棉布产地,其所产棉布“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③,且“远者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④。此地亦为山西布商的重要商贸市场,山西商人在汉阳收购的棉布,“卖至汉口加以染造,”以应“远贾之需”^⑤。

直隶产布区如元氏县“郡近秦陇,地既易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⑥。南宫布“其输出,西自顺德(府)以达泽潞,东自鲁南以达徐州。”该县建成村所产棉布,“西达太原,北至张家口;而郝家屯布店尤多,自古北口输出内外蒙古”^⑦。正定府无极县,在县城、郭庄等集镇和产布的甄村、南马、南候坊等村镇开设布店60余家,从业人员1000人左右,其中四五百人是山西忻州、五台、繁峙、代县、宁武、大同人。^⑧

山西布商行商范围遍及全国的许多城镇和地区。如山东齐河、聊城、馆陶等县,均有山西商人开设的布庄。齐河县棉布以“齐河大布”著称,有山西客商在城镇设庄收买,销往北口外,以乾嘉年间最盛。^⑨河南洛阳山西潞泽商人经

① (清)罗庆芾修,彭玉麟等纂:同治《衡阳县图志·货殖》,卷十一,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② (清)吕锡麟修,程怀璜纂:道光《云梦县志略·风俗》卷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③ (清)陶士俊修,刘湘烺纂:乾隆《汉阳府志》,卷二八,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④ (清)黄式度修,王柏心纂: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九,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⑤ (清)刘嗣孔修,刘湘烺纂:乾隆《汉阳县志·物产》,卷一〇,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⑥ (清)胡岳修,赵文检、王钧如纂:光绪《元氏县志》卷一,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

⑦ 黄容惠修,贾恩斌纂:民国《南宫县志》卷三,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

⑧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⑨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营绸布的店铺、作坊达 130 余家。^①周口也有山西商人所设布行。^②山西翼城县商人在京师多业布匹，并修建等多座会馆乾隆四年（1739）《创建翼城会馆碑序》共记录捐银字号和商人 103 个，其中布店 11 家，共施银 353 两 6 钱。道光十七年（1837）《新建布行公所碑记》中记录捐银布店 14 家，共捐钱 700 千文^③，按银 1 两折制钱 1 500 文算^④，共捐银约 467 两。

布商在省内许多地区活动频繁，如汾州府孝义县“男妇皆能纺织”，所产棉布由布商“鬻于西北州县外”^⑤。泽州府阳城县，所用棉布“来自远方，约行千余万匹”^⑥。朔平府左云县的布商多“代州、崞县寄民”^⑦。

4.3.5 铁货业

潞安府和泽州府是清代山西铁冶及铁器制造的重要产区。明代就曾“有明宣大总督王崇古疏请，以潞锅与诸部互市”^⑧的记载。清代县志中也对潞泽地区的铁器生产屡有记载：“铁行炼石铸山，货于不涸之府”^⑨；“潞之西山中，有苗化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借而食者常百余人。”^⑩

入清之后，山西民营冶铁生产及铁矿的开采虽受到清政府的种种干预，但仍然继续发展。全省铁矿产地，除明代的 25 县外，又增加了闻喜、解县、隰县、大同、宁武、临县、中阳、赵城、安泽、辽县、和顺、昔阳、保德、灵石、陵川、虞乡等 16 县。由于冶铁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山西境内出现一些以出产优质铁制品而著名的城镇。陵川在清雍正时期专门生产铁钉的作坊有 12 家。晋东南之阳城、晋城、荫城（长治县属），当时号称三城，以出产优质铁货闻名：阳城以生铁货为主，大小锅、笼盖、笼圈，以及犁、耙齿、炉条等。晋城以板

^①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② 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2—39 页。

^④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 年版。

^⑤ （清）邓必安修，邓常纂：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民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⑥ （清）沈继炎修，杨念先纂：民国《阳城乡土志·商务》，清光绪末年修，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⑦ （清）李翼圣原本，余卜颐增修，蔺炳章增纂：光绪《左云县志·风俗》，清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民国间石印本。

^⑧ （清）李楨、马继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风土记》，卷八，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⑨ （清）杨俊修，李中白，周再薰纂：顺治《潞安府志·地理四·气候·物产》卷一，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⑩ （明）唐甄《潜书》下篇《富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铁货为主,如大板铁、小板铁、三股铁等。荫城以熟铁货为主,如铁锅、炒瓢、马勺、菜刀、斧头、锯条及锄、镰等,荫城为潞泽(上党地区)铁货集散地,清乾嘉年间,即有“荫城铁水奔流全国”之说,长治县荫城镇已经成为铁货集散中心,这些铁货从产地,驼运至位于汾水下游的绛州;或用陆运至翼城,再用大车运到绛州,估计年运铁货1 000万斤以上。^①清代的方志中大多以“荫城铁货”来命名山西潞泽地区的铁货。长治县荫城镇,为高平县和长治县交界,清代已成为潞泽地区铁货集散地,共有铁行30余家,制造铁器之炉300余家^②。

此外,平定府盂县四面多山,故矿产资源品种繁多,储量丰富,其中铁矿资源仅次于煤炭,主要分布在南娄、下曹、路家村、牛村、仙人、北下庄、东木口、土塔、芪池、榆林坪等乡镇的200多个村庄。康熙《盂县志》载:“其利之取不尽而用不竭者,独炭与铁与磁土而已”^③。清代末期,冶铁业的发展更为兴盛。光绪二十四年(1898),牛村、白土坡、南流、赵家塙、清城等村,有炼铁炉60余座,年产生铁4 500吨。^④瑞典学者丁格兰也感慨:“山西铁矿在清季成为中国最大铁业者”^⑤。

山西铁货行销范围甚广,至少包括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如陕西鄂县,“铁货,如铁钉、铁锁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由河口陆运至鄂,每年共销六七万斤。铔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鄂,每年共销十万叶。……铁锅由山西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⑥。澄城县“铁器及铁由山西运入朝邑,由朝转入境内”^⑦。河南林县“铁器自(山西)壶关县来”^⑧,河南清华镇自明代就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山西铁货云集于此,转运各地。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在《适晋纪行》中记载:“余以庚午六月起于家……抵清华镇,山西之冶器集焉”^⑨。咸同年间,德国人李希霍芬说:“成千上万的人和牲畜年复一年地把凤台这个重要煤铁产区的产品运往清化”^⑩。此外,直隶

^①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页。

^③ (清)蔡瑛纂修:康熙《新修盂县志》,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④ 参照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盂县志·孟县铁货》,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⑤ 丁格兰《中国铁矿志》谢家荣译,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⑥ (清)佚名编:《鄂县乡土志》,清光绪末年抄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

^⑦ (清)金玉麟修,韩亚雄纂:《澄城县志·土产志》,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⑧ (清)康仲方修,卫济世纂:《续林县志·风土论》,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⑨ (清)林荔:乾隆《凤台县志·艺文》,卷一五,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⑩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143页。

束鹿县,“铁器……多由获鹿、山西泽州、潞安等处运来”^①。山东聊城,“铁货自山西贩来”^②;潍县也有“铁器,山西客商贩来,销售岁约五千金”的记载。在北京的山西潞安府铁货商人还与在京同籍的经营铜、锡和烟袋业的商人一同建立了潞安会馆。^③山西铁器不仅行销北部省份,在南方也有一定市场,《山西通志》记载:“潞铁作钉为南省造船所必需,取其易锈(锈)也”^④。

4.3.6 皮毛业

山西多山,畜牧业历来比较发达,皮毛产量颇丰,形成了大同、忻州、交城、寿阳、潞安等多处皮毛加工生产和集散中心。《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

“山西以牧羊著称,硝皮业也随之发达,全省硝皮业之发轫,以大同、交城两地最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已有硝皮场之经营”^⑤。其中,交城主要加工产自甘肃的滩羊皮^⑥,当地皮商贩洗皮革,腥秽填壑,地方官为此发布告示,禁止在圣母庙前溪水中沤制皮革,其文曰:“照得交城,依山为邑、所少者水,城内东南隅,离相寺圣母庙前,清流一曲,地属离震,实启文明,何为洗皮浸革之需,居民苦之。暮春初夏,秽气满城,见者伤心,行人掩鼻,遂使清净法坛,终年齷齪,风雅圣地,昼日腥膻”^⑦。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皮革加工已经比较普遍。硝皮业发达时期,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895—1898)之间,其时皮货国外贸易兴旺,交城大同两地每年销售总值各在百万两以上,交城硝皮庄由十家增至一百余家,大同由十余家增至八十余家,可谓晋省皮货业之黄金时代。^⑧

山西商人除将本地皮货运至它处贩卖之外,还从蒙古、俄国大量进口,“进口货以兽皮为大宗,织物次之,大都转输于汉地,蒙古人所用甚少,每年贸易最盛时在二三月间”^⑨。张家口是内地较大的皮毛交易市场,“口外出产如驼马、牛羊及各色皮张、毛片……均为入口转售宣府十属三厅及京津或山西一带之货。……由俄销售蒙境及内地者,以哦噶绸(即哈喇),金线毕兔绒、回绒、牛皮并各色皮张、驼毛、黄芪、蘑菇、木板为大宗,口上设细皮作坊,凡由俄进

^① (清)张凤台修,李中桂纂:《束鹿乡土志·物产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铅印本。

^② (清)向楠编:《聊城县乡土志·商务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本。

^③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④ (清)王轩等:光绪《山西通志·风土记》,卷一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18页。

^⑤ 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⑥ 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63页。

^⑦ 转引自张正明等:《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⑧ 参阅解光启《交城县民间硝皮业历史资料综述》,载《交城文史资料》第九辑。

^⑨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口之水獭、海龙、银针、灰鼠、紫貂、白狐、元狐、红狐腿及乌城、库伦所来之黄狐、猞猁、沙狐、貂毛、羔儿皮等均由该作坊制之，乃能分批运销各处。其粗皮张以山羊、绵羊为最多。而鹿茸一项，口上设有专庄”^①。

归化城也是北方重要的皮毛市场，其“物产以家畜为大宗；若毛网、毡毯、制皮等亦均著名”^②。城内“屠宰牧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货行”，均集中在城南门外十字街。^③牲畜、皮毛是西包头镇集散的大宗商品。光绪年间包头开办的皮毛业商号有20多家，皮毛来源扩展到宁夏、肃州、青海、库伦等地。^④上述二城中经营皮毛业的商人中有为数众多的山西商人。

氍毹是手工编织的一种毛纺制品，清代山西孟县商人经营此行者甚多，并于嘉庆二年（1797）在京师煤市街小椿树胡同建有会馆。该会馆东院厅事三楹，北屋三楹，毗连小院一座，内设庖厨，地基计1亩2分，共费银2300多两。^⑤当时孟县在京六家氍毹行共同出资修建孟县氍毹行会馆，其集资方式为：“每售氍毹一匹，恭除香资银一钱。迄今凡九阅春秋，日积月累，合计得贰千三百余金”^⑥。六号出银数额分别是义兴号536两5钱、永兴号529两3钱、大成号433两9钱、大顺号453两、义成号176两、义和号184两1钱，合计银2312两8钱。按《碑记》中“每售氍毹一匹，恭除香资银一钱”计算，在北京的孟县籍氍毹行九年间共售氍毹23000余匹，平均每年销售量近2600匹氍毹，每家商号每年的平均销售量为430匹。

4.3.7 粮食业

山西晋中、南地区的太原盆地和运城盆地，是人口繁庶，粮食相对缺乏的地区。乾隆年间，太原盆地的太谷^⑦、平遥^⑧等县所产粮食已经远远不够当地食用。晋南绛州同样“产收之粮，恒不敷本地居民之食。”^⑨浮山^⑩、曲沃^⑪、荣河^⑫

^①（清）李廷玉：《游蒙日记》，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载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版。

^②（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都会》卷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③张曾编纂：《古丰识略》卷二十。

^④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⑤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⑥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⑦（清）高继允修，姚孔硕、涂逢豫纂：乾隆《太谷县志·风俗》，卷三，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⑧（清）恩端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地輿志·风俗》，卷一，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⑨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卷首，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等县都感到土狭人满，粮食匮乏。山西粮食主要取给于陕西关中地区及清代新开发的归绥六厅。陕西米麦沿渭水输往晋南是一条传统输粮路线。每至麦熟，山西富商便赴关中大量收买麦石，在陕的山西盐商也抽资收麦输晋，乾隆八年关中麦熟后一月间，运销山西“已不下二十万石”^⑩。北路归绥各厅粮食运往太原盆地；水路沿黄河南下至蒲、绛等州。归化城一带所产粮食运往晋中、晋南，水路由黄河南下。乾隆初年，归化城利用“牛皮混沌”编筏装米，沿河而下，至壶口起岸陆行十里复行装船，运至晋南。^⑪乾隆中后期，赴归化粮贩多造小型“圆底船”运粮以便通过急流、漩涡，至壶口连船起运陆行后再下水，至禹门镇转换平底大方船再运至荣河、永济境内。^⑫陆路则“自北而南委输络绎不绝，近至省城，运输韩侯岭”^⑬。北路粮食输入规模很大，以致太原、汾州二府米价低昂要“恒视北路之丰歉为准”^⑭。山西境内许多县份的民人从事粮油业，“（左云）邑缸油布当粟店多系代州、崞县寄民”^⑮，晋中临汾、襄陵两县民人多在外地从事此业。

山西粮商在外省也十分活跃，如河南周口是重要的商品转运枢纽，粮食是当地集散的最大宗的商品，山西商人在此建有陆陈会馆，为粮业会馆。每至麦熟，“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货，乘麦收价贱之时，在码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踏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百余万块不等，车载船装贩运他省，皆渊藪也。”^⑯北舞渡镇亦有山西商人经营陆陈行（即粮行），此外油坊业也是山西商人在此主要经营的行业，油业众商曾单独集资于咸丰二年（1852）修建老君庙。^⑰在朱仙镇从事粮食贸易的山西商人也有不少，在此地开设有白米行和陆陈行，此外，酒曲也是当地山西商人所经营的商品之一。^⑱

⑩（清）鹿学典修，武克明等纂：光绪《浮山县志·风俗》，卷二十六，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⑪（清）张兆衡纂修：道光《（新修）曲沃县志·风俗》，卷十，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⑫（清）马镜、王希濂修，寻燮炜纂：光绪《荣河县志·风俗》，卷二，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⑬《陕西巡抚塞楞额为遵旨查复本省麦石卖出省情形奏折》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历史档案》，1990年第三期。

⑭《山西巡抚刘于义为筹划将口外之米以牛皮混沌运入内地事奏折》，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历史档案》1990年第三期。

⑮ 乔光烈：《论黄河运米赈灾书》中称这种水陆联运方式从口外至晋南约计“每石水陆运费不过四钱，内外商民，获利颇厚”。转引自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8年第二期。

⑯ 转引自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8年第二期。

⑰ 曾国荃：《曾文襄公奏议》，卷八，《申明栽种粟粟旧禁疏》，光绪《广灵县志·政令》，卷六。

⑱（清）李翼圣原本，余卜颐增修，蔺炳章增纂：光绪《左云志稿·风俗》，清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民国间石印本。

⑲ 参看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⑳ 参见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㉑ 参见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4.3.8 杂货业

杂货行是清代山西商人经营较多的一个行业，它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酒、鞋、油、面、南货、首饰、药材、丝绸、颜料、瓷器、糖、手工业制品等，行商范围也比较广。

乾隆年间朱仙镇经营杂货业的山西商人有 90 余家^①；洛阳有来自潞、泽二州杂货商 14 家^②；在周口经营杂货业的山西商人数量更多，道光年间周口重修山陕会馆集资中，参与集资的杂货业商号达 180 余家，共捐银 7 900 余两，占各行捐资总数的 3/4^③。宣统元年重修雁门关道路时，碑刻中也有杂货行参与集资^④。在京师经营杂货业的多为临汾、襄陵两县商人，建有临襄会馆和临汾东馆^⑤。“凡晋省商人，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等，夙敦乡谊，共守成规，同在临汾乡祠公会……”^⑥，乾隆三十二年（1767）修建临汾东馆时有在京临汾杂货商 35 家参与集资，共捐银 907 两 8 钱，均每号捐银 26 两。光绪十四年《重修临襄会馆碑》有 52 家商人和商号参与集资。在光绪九年（1883）该会馆的干果行之永顺义，颜料行之全升李，烟行之德泰厚等协助纸行星记、洪吉、源吉、敬记四号共同抵制牙行讹诈行为，“在大兴县将牙行呈控。五月内，经大、宛两县会讯断结，谕令纸张众行等，各守旧章，并不准牙行妄生枝节”^⑦。直至民国年间，仍有较强实力，民国二十一年（1933）《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载：“吾乡自前朝，即有山右会馆。既而临襄会馆，广安门外财神庵、平水义园，统由临襄会馆管辖。……各处屡次兴工构造屋宇，以及增产所费洋四万三千元有奇，历年积储洋三万五千元有零。并由同乡诸公商号捐助洋二千五百元，除一切需用外，尚有不敷洋五千四百五十元，俱从经理人及各会首分担垫办”^⑧。

4.3.9 运输业

山西的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种。陆路运输的工具主要是马、牛、骆驼、驴、骡等牲畜，山西商人大量从事对蒙、俄贸易，使用的主要交通

^① 参见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

^② 参见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③ 参看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④ 该碑现存雁门关，笔者曾于二 00 五年夏前去抄录。

^⑤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3—29 页。

^⑥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第 88 页。

^⑦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第 88 页。

^⑧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8 页。

和运输工具为驼、马，因此牲畜行在中蒙贸易中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山西商人经雁门关至杀虎口，再出走口外，经过长途运输将货物运至库伦及恰克图，此段运输路程，夏秋二季（6—11月）共5个月，以马和牛为主。马可驮80公斤左右，牛车可载250公斤左右。马队需行四十日以上，牛车较缓慢，约六十日。冬春二季（11—6月）共7个月，由骆驼运输，可驮200公斤，日行40公里以上。一般35日左右到达库伦。此外，还有一种由骆驼拖拉的拖车也参与运输。^①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在山西境内，见到商人运货驼甚多，与山西布政使蒋洲商议在当地购办300—400匹。^②同年奏明在“晋省归化城、朔平府一带，商贩驼只盛多”，请旨敕令在此地采买1000—2000只。^③在太谷县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大观楼捐银碑》所镌施银商号中，亦有车铺、驼店的捐资记载^④。此外，在宣统元年至二年重修雁门关道路碑记中有牲畜行参与捐资的记录，其中包括3家驼社，还有马行、马店和马店社各1家，共捐资71两。

水路运输，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平遥市楼碑记中记录了通源船行和合兴船行各捐银一两。^⑤位于汾河岸边的太原、平遥、绛州，黄河上西包头镇、河曲、碛口镇、永济等商业城镇均为航运业较为发达的城镇，由蒙区转运而来的粮食、盐^⑥、胡麻油^⑦等均可由水道南下。关中输往山西的粮食依靠渭、汾两水之航运入晋。^⑧其运输工具见于记录的有圆底船、平底船和牛皮混沌等。

4.3.10 货栈业和酒饭行

货栈业，主要从事存放来往商旅货物、商客住宿以及协助运输等业务。清代，山西商人往来于蒙俄与内地，贩运大量货物，由于是长距离贩运，而口外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因此需要在沿途市镇进行休整，故中俄商道上的货栈旅店行较为发达。平遥城在清代中叶是晋中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南省运来的茶叶、蒙古出产的皮货、潞泽地区生产的铁器，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各种土特产品均集中于此，故货栈旅店业十分发达，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金井市楼》

^① 转引自渠绍森等：《山西外贸志》，太原：山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第112—113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二，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戊申。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二，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

^④ 史若民等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371页。

^⑤ 史若民等编：《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⑥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⑦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⑧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

碑中记载参与集资的货栈旅店，有存仁店、信成店、天元店、和盛店、恒裕店等五家。另据《平遥古城志》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城内著名货栈旅店有13家^①。嘉庆十八年（1813），栈店有50余家^②。此外，重修雁门关道路碑记中镌有店行和驻店的捐资记录^③，两店共捐银6两，钱42千文，折白银27两^④。在归化城有餐饮业的行会性质组织，即“仙翁社”和“聚仙社”，该行业也称“酒饭行”^⑤，为来往商旅或当地居民提供餐饮服务。

4.3.11 牙行

牙行，是经营中介业务的商行，牙行亦可理解为牙人的同业组织。清代山西在各县城乡市场中均设有牙行，如乾隆年间，解州安邑县收牙帖税银156两8钱，比额外商税、匠价银、田房正税、头畜税、当税等杂课均^⑥；闻喜县乾隆年间牙帖税为128两4钱^⑦；蒲县牙税7两2钱^⑧；平陆县牙帖税银23两8钱^⑨；道光年间，大同城乡牙行共计310人，其行业涉及斗行、牲畜贩卖、泥靛补衬、棉麻、铁、炭货、水果、烧酒业、车辋、棺板、木材、脚力等。参见下表：

表4-7

所属类别	名称	牙人数
斗行	斗牙	74
牲畜皮毛业	牛驴牙、羊牙、绒毛牙	74
炭	炭牙	49
水果	瓜牙、果牙	34
房屋及泥靛补衬	房牙、泥靛补衬牙、补衬麻牙、泥靛牙	27
烧酒	烧酒牙	18
脚力	脚力牙	13
店	店牙	10
铁	铁牙	6
木材	棺板牙、木牙	2
棉麻毛	旧棉花牙、旧棉花麻牙	2
车辋	车辋牙	1
合计		310

资料来源：（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赋役》，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

① 杜拉柱：《平遥古城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②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94页。

③ 该碑现存雁门关，笔者曾于二〇〇五年夏前往抄录。

④ 据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⑤ 该碑现存雁门关，笔者曾于二〇〇五年夏前往抄录。

⑥ （清）言如泗修，吕蘧、郑必阳纂：乾隆《解州安邑县志·田赋·杂课》，卷四，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⑦ （清）李道唐纂修：乾隆《闻喜县志·田赋·杂课》，卷三，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

⑧ （清）巫慧修，王居正纂：乾隆《蒲县志·赋役·额外杂税》，卷三，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⑨ （清）言如泗、韩夔典修，杜若拙、荆如棠纂：乾隆《平陆县志·田赋·杂课》，卷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刻本。

小结

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的广阔地域内进行商业活动,经营金融业、茶业、烟业、棉布业、铁货业、皮毛业、粮油业、杂货业、运输业、餐饮住宿业和牙行等行业,并在许多地区和城市拥有较大的势力,建立会馆。大量山西商人长时间、广泛围的经商活动,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我们从山西富商家族的资本额,山西商人所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商号、票号的经营额及周转资本等可窥一斑。

清代,山西拥有百万、千万银两资产的豪商巨贾为数众多。清初的“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①。“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②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钜。”其资产在“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③共有14家,参见表4-8。

山西商人、商号大量从事对蒙、俄贸易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是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等三家,大盛魁年均贸易总额在1000万两白银左右。^④元盛德,年贸易额800万两;天义德,年贸易额700万两,除此三家规模最大的商号外,其余规模较小的商号年贸易额多则500—600万两,少则10—25万两。^⑤

茶叶是山西商人对蒙俄贸易商品的大宗。清初,在江西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⑥。清末,山西商人每年经张家口运往库伦、恰克图等地的砖茶40余万箱,价值2083.1余万两白银;由漠北各盟旗运往张家口

^① 《清高宗实录》卷1257,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庚寅。

^② 《军机处录副》、《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折》,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转引自王尚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山西多富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⑤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页。

^⑥ 袁于《茶市杂咏》,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304页。

转销中原的兽皮、毛皮、贵重药材等，价值 1 767.5 余万两。^①

表 4-8 山西富商资产表

姓氏	资产额	住址
候	七八百万两	介休县
乔	四五百万两	祁 县
常	数百万两	榆次县
候	八十万两	榆次县
王	五十万两	榆次县
何	四十万两	榆次县
冀	三十万两	介休县
曹	六七百万两	太谷县
渠	三四百万两	祁 县
刘	百万两内外	太谷县
武	五十万两	太谷县
孟	四十万两	太谷县
杨	三十万两	太谷县
郝	三十万两	榆次县

资料来源：（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山西多富商》，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

票号创办后，山西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表现形式除山西商人自身的资本积累及商号贸易额之外，还表现为票号本身的资本额及汇兑业务的周转资本额。例如光绪末年，山西 27 家票号的资本总额为 519 万两白银^②。再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 14 家分号收交汇兑银 3 222.5 万两^③，其总利润为 60.17 万两白银。^④

我们虽然没有山西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所集聚资本的具体数额，但上述数字，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山西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本额度是相当巨大的。山西商人在其长达数百年的商贸活动中集聚了巨额商业资本，并且将其中的大部分运回山西省内，从而在山西省内形成资本集聚。资本集聚为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提供了前提条件。

^①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5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38—662 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69—474 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30 页。

第五章 清代山西的城市

清代，山西商人不仅驰骋省外全国各地的市场，在山西省内的活动亦十分活跃。他们所开设商号的总号设在本乡本土，并在省内许多城镇开设分号。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山西境内大批的城市繁荣起来。城市中的雇佣关系得到发展，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城市的建设得到相当改善。清代山西城市，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城市类型、城市机能，都较前代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节 晋中区

5.1.1 平遥

平遥，位于山西省汾河谷地，是晋中地区重要的商品转运枢纽，清代山西著名的商城之一。平遥县清代属汾州府，东邻太原府，东南与潞安府、沁州接壤，距太原府 190 里^①。

平遥古城是我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县城的典型代表。其城墙周长 12 里，高 3 丈，四周有 6 座城门，东西各二，南北各一，有瓮城。平遥城的地形以西南最高，衙署即建在城之西南部。古城平面方正端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构成城内主干线，此外还有 8 小街、72 条小巷呈井字或丁字形相交，城内大街小巷，大多是南北向或东西向的直线，轴线突出，布局严谨。^②

东大街，东起亲翰门里，西至南大街北端，长 571 米，宽 5 米，是正对东门东西向的主干街。从秦陇通往京城的京陕驿道由平遥城东、西大街穿越而过，所以东大街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商业街。街道两旁以店铺为主，间有各业作坊。京货、布庄、杂货铺、烟店、梨店（干鲜果店）、粮油店、肉铺、药店、剃头棚、钱肆、当铺、凭铺、柜架铺、皮箱铺、漆器店、皮货店、古玩店、酒肆等，开设有多家。

北大街，北起瓮城脚下，南至西大街，长 557 米，宽 4 米，是正对北门的南北向主干街，道路南高北低，与东西城墙平行，距离相等。道路两旁，酱店、粉房、糟房（酒作坊）、药铺、车行（木业）、褶子铺（帐簿作坊）、栈房、钱庄、

^①（清）恩瑞修，武达材、王舒等纂：光绪《平遥县志·地輿志》，卷一，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② 以下参看杜拉柱：《平遥古城志·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

质局、当铺等遍布。

西大街，西起凤仪门里，东至南大街北端，长 861 米，宽 5.1 米，是正对西门的东西向主干街。在大街西段，设有多家客栈、货栈。而东段则多“前店后厂”、“前店后居”的店铺。

南大街，南大街南起兴国寺门前，北至东、西大街的衔接点，全长 690 米（从南城墙算起为 738 米），是正对南门方向的南北大街，它与东面的东城墙和西面的沙巷街平行且距离相等，“金井古楼”横跨街心，大街两旁店铺林立。

乾隆年间，随商业的发展，平遥城内除东、西、南、北四条商业大街外，城隍庙街、衙道街等几条主要街道亦店铺林立，其中不少店铺以经营大批量、大宗项的中转业务为主。各种南北货物源源不断地载运进古城，再发往外省、外县。至光绪朝，平遥城内设有“衙巷二市、十字街一市、市楼街二市、东街二市、西街二市、大西城二市、小西城二市、南门街二市”^①等多个市场，较前朝更加繁荣。

市楼位于平遥古城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市楼东南脚下有水井一眼，世传“井内水色如金”，故又名“金井楼”，为本县古十二景之一。市楼为三重檐木构架楼阁，高 18.5 米，黄绿琉璃瓦顶，歇山造。底层面阔进深各 3 间，占地 133.4 平方米。平面呈方形，南北向为通道，东西筑砖石台基，四角立通柱，外包砖墙。东西各有券门一道，四周围廊，柱间栏额、平板枋联接，上施斗拱，一斗二升交麻叶，明间平身科一攒。平座斗拱为五踩重翘，平身科两攒，角科有附角斗，相拱做成鸳鸯交首拱，滴珠板狭长，全部斗拱外露。二层平座筑廊，前后隔扇门装修，内施楼板，设神龛，南向供关圣大帝，北向祀观音大士，另有奎星阁。屋顶装天花板，上层檐下，斗拱七踩，平身科三攒，皆出翘，角科诸拱排比，均为清代特有的手法。楼顶施色彩琉璃瓦，嵌镶成南“喜”北“寿”的精美图案。市楼为市井装点性建筑物，是县城内唯一楼阁式高层建筑，长期以来被看作平遥城的一项标志性建筑。市楼具体始建年代不可靠证，但在清代曾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嘉庆十八年（1813）、道光十七年（1837）、同治八年——九年（1869—1870）、光绪三十一年——宣统元年（1906—1908）进行过五次重修。参见表 5-1。

^①（清）恩瑞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建置》，卷二，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表 5-1 平遥市楼修缮年表

年 代	捐款	建 筑 与 修 缮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 1758）	341. 79 两	重新修整市楼整体，增塑观音大士像
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3）	3516. 34 两	以铁箍加固四隅大柱，对市楼破损处均用上好材料修补；将顶檐用琉璃装饰，给各神像重塑金装。将楼底石道重砌加长
道光十七年（公元 1837）	715. 3 两	重新铺瓦、粉刷、着色，修缮一新
同治八年——九年（公元 1869——1870 年）	1520. 4 两	重加修整，以振“市气”
光绪三十一年——宣统元年 （1906——1908）	4314. 8 两	重新修缮，焕然一新

资料来源：据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市楼碑记、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记》、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市楼碑记》、同治八年至九年（1869—1870）《重修平遥县市楼碑记》、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元年（1906—1908）《重修平遥县市楼碑记》等碑统计。

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市楼碑记镌有捐资商众 314 家，可以区分出的行业有，货栈旅店行、铁铺、烟铺、麻店、油店、花店、木厂、驴柜店、当行、钱铺、银炉、漆铺、帽店、箱店、酒店、锡铺、酱铺等行业。其中 10 家烟铺，4 家铁铺，麻店或麻布行 6 家。

嘉庆十八年（1813）对市楼的重修是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捐资最多的一次。此次共有 1 600 多家字号参与募化，募得白银 3 516.34 两。可以明显看出的行业有：除了货栈旅店行、铁铺、麻店、油店、花店、木厂、驴柜店、当行、银炉、酒店等行业外，还增加了盐店、布铺、银楼、染料庄、颜料庄、洋货行、缎店、粉房、茶行、药材店、珠局、翠局、料铺、帐局、染房、面铺、干铺、押铺、印局、荷包店、缸房、衣铺、船行、磨房、铜铺、肉铺等。较之乾隆二十三年（1758）碑刻所记载的行业丰富了许多。

道光十七年（1837）对市楼的重修无论从参与捐资的商号数量还是集资总数来看，都是 5 次修缮中规模较小的一次，共有 272 家商众参与集资，共捐银 700 余两。其中，商号 232 家，捐资 677.8 两。可以明显看出的行业有：酒馆、银楼、油店、花店、木厂、烟店、铜铺、麻店、梨店、面铺等。

据同治八年——同治九年（1869—1870）对市楼重修中，共有 184 家字号参与集资，共施银 1 520.4 两。其中票号 13 家，共捐银 585 两，排在首位。光绪三十一年——宣统三年（1906—1908）重修市楼有捐银字号 418 家，共捐银 4 314.8 两。

金融业是平遥城内的重要行业。乾隆二十三年的（1758）《今将捐资姓名开

列于后》碑共记载钱铺 5 家捐资 3.64 两、银炉 2 家捐资 0.44 两，当行共捐资 12 两，包括当行、银炉和钱铺在内的金融行业在总捐资中名列第二。^①嘉庆十八年（1813）在重修市楼捐资的 1 600 多家字号中，有典号 26 家、当铺 58 家、印局 1 家、押铺 1 家、钱铺 1 家、帐局 1 家、银炉 1 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平遥城内的金融业以典当业等为主要发展形式。道光十七年（1837）的重修市楼中，首次有票号参与集资，计有 7 家票号，其中以日升昌记、蔚泰厚记、蔚盛长记捐资最多，分别施银 16 两；万成和记施银 12 两；新泰厚记和三和世记分别施银 8 两；天成亨记施银 4 两，票号共计施银 80 两，占商号捐资总额的 11.8%，排在各行业之首。此时距 1823 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记的诞生只有 14 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平遥票号由 1 家发展成 7 家。在同治八年——同治九年（1869—1870）对市楼重修中，有 13 家票号参与集资，共捐银 585 两，排在首位。光绪三十一年——宣统三年（1906—1908）重修市楼有捐银字号 418 家，共捐银 4 314.8 两，其中票号 11 家，捐银 1 640 两，占总捐资的 38%。

此外，在平遥修城、修志、修庙的集资中，票号业均积极参与且所捐银两都超过其他行业，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至咸丰六年（1856）冬月，平遥筑城开渠，日升昌、蔚盛长、蔚泰厚等 3 家票号各捐 400 两，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义兴永等 4 家票号各捐 270 两，光泰永、万成和、聚发源等 3 家票号各捐 200 两，隆盛长、日新中等 2 家票号各捐 140 两，另外万盛和（碑残不知捐银数）等共 13 家票号，总共捐银 3 160 两（不包括万盛和捐银）。这 13 家票号还与其他字号 11 家，共计 24 家共同管理城工总局帐簿^②。光绪八年（1882）重修《平遥县志》，有 40 家字号捐银助修县志，其中票号 15 家，分别是日升昌、协同庆、百川通、协和信、蔚泰厚、松盛长、谦吉升、乾盛亨、蔚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长厚、蔚盛长、云丰泰、其德昌各捐银 100 两，其他字号 25 家，有 5 家捐 100 两，其余各 20——80 两不等^③。光绪二十四年（1898）《补修清虚观新建纯阳宫碑记》，捐银商众、村庄共有 818 个，字号 433 个。其中，票号 12 家：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天成亨、新泰厚、协同庆、协和信、蔚盛长、蔚长厚（各捐 50 两），乾盛亨（捐 38 两），其德昌（捐 18 两）^④。

^① 据乾隆二十三年的（1758）《今将捐资姓名开列于后》统计，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7—161 页。

^② 咸丰六年碑刻《平遥县筑城开河记》，现存放于平遥古城清虚观内。

^③ （清）恩瑞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卷首，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④ 光绪二十四年碑刻《补修清虚观新建纯阳宫碑记》，现存放于平遥古城清虚观内。

货栈旅店业是服务性行业，为来往客商提供住宿及存放货物的仓库，平遥城是晋中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南省运来的茶叶、蒙古出产的皮货、潞泽地区生产的铁器，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各种土特产品均集中于此。其货栈旅店业十分发达，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金井市楼》碑中记载的捐资商户可以反映，其时，城内著名货栈旅店商，有存仁店、信成店、天元店、和盛店、恒裕店等五家。另据《平遥古城志》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城内著名货栈旅店增加到13家，分别是益成店、天锡店、丰盛店、通盛店、永盛店、天成店、合盛店、大益店、两义店、增源店、信成店、万顺店、悠远店。到清嘉庆十八年（1813），平遥的货栈旅店商发展到最盛时期。著名栈店有：恒升店、天裕店、光裕店、三元店、合兴店、忠义店、长盛店、义顺店、世隆店、合隆店、元丰店、长泰店、升元店、兴盛店、泰来店、协盛店、晋源店、全兴店、义和店、集义店、祥泰店、信诚店、大悦店、万亿店、通盛店、永顺店、德顺店、万盛店、逢源店、益天店、天锡店、涌聚店、协泰店、天兴店、协信店、复信店、裕隆店、晋太店、太和店、恒义店、广大店、悦来店、亨通店、正和店、通源店、复义店、允成店、永盛店、万亨店、泰和店、方至店、天盛店、丰盛店、天成店、谦德店。

将上述《平遥古城志》中记载的字号与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记》中所记载的捐资商号相对照，可以发现有大量字号相重合，这说明当时的货栈旅店业已具相当规模和实力，并积极参与捐资重修市楼：^①据碑刻资料推算，其中信成店当时至少已有56年的历史；天锡、丰盛、通盛、永盛、合盛等店，当时也有37年的历史。

另外，由于平遥是较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商客众多，城市建设对木料及木器的需要量较大，因此城内木行也较为发达。乾隆三十一年（1766），平遥城内木行为其祖师鲁班建祠，《建木行祖祠碑》载，木厂行6家：元盛厂、富东厂、德盛厂、乾雍厂、东义厂、合盛厂，共捐12两。木匠行捐银人名、字号81个，包括皮箱铺、车铺等，捐资最多者5两。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五次参与重修市楼的商号家数及其捐银两数总的来讲呈上升趋势；其各自所占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到后来同治、宣统两次的修缮，商号捐资几乎占百分之百的比例，并且，此时的票号捐资已在总商号捐资中占很大优势。而重修的年限间隔也逐渐缩短，说明平遥商业的逐步繁荣和商号实

^① 杜拉柱：《平遥古城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

力的逐渐增强。

5.1.2 太谷

太谷，清代属太原府，位于平遥东部，距太原 120 里^①。太谷古称阳邑，西汉置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名太谷至今。清代中叶，为太谷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太谷县城成为山西重要的商业城镇之一，其城内“栋雨云连，阊阖鳞次，民物殷阜，商贾辐辏”^②，有“旱码头”、“小北京”、“金太谷”之誉。

太谷县城，始建于北周建德年间（6 世纪中叶），清代，城内有四门，东曰宾阳、南曰丽正、西曰登丰、北曰眺燕，周 10 里。^③城内街巷大部分为东西、南北走向，少数为斜巷。有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四条主要街道，其中东、西、南三条街道为主要商业街。鼓楼筑于城中心，辐射东、南、西三条大街，北大街与西大街中段相交。楼北为县衙，民宅集中于城内四隅。

城内鼓楼，又称大观楼，“去县治百余武，……其上名四大观，迴口鳞宇，下跨康衢，四面轩豁，登临其上，凡廛市之稠密，城郭之环抱，以及乡镇村落，或近或远，无不朗朗在目”^④。该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太谷县城标志性建筑。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进行大规模重修，据其《重修大观楼捐银碑》记载，当时太谷捐银商户有 600 家左右，共捐银 3 543 两 2 钱，钱 133 150 文，共折银 3 645 两 6 钱 2 分（按 1 两白银折制钱 1300 文^⑤）。其中单个商号最多施银 60 两；最少施钱 300 文。捐银商户中可以看出所经营的项目 30 多种不同行业。参见下表：

①（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疆域》，卷一，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②（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序》，卷一，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③（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城池》，卷二，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④据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72 页，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大观楼碑记》。

⑤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 年版。

表 5-2

所属类别	具体行业	捐银
金融业	票号、帐局、当铺、赁局、钱局或钱店、炉院	166. 38 两
纺织印染业	花店、靛店、帽铺、染坊、麻铺、衣铺	18. 7 两
粮油副食加工业	肉店、酒店、面店、油铺、咸店、菜铺、药店、	33. 8 两
金属器皿制造业	金铺、银铺、铜铺、锡铺	6. 5 两
运输服务业	车铺、驼店	1. 4 两
其他制造业	木厂、翠店、柜铺、磁铺、纸局、胰局、石厂、砖厂	51. 1 两
其它	茶店、烟店、刻字铺、斗行	34. 8 两
不详		3332. 94 两

资料来源：据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 363—371 页，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大观楼碑记》统计。

表 5-2 可见，金融业是太谷最重要的行业，志成信是太谷第一家票号，其前身为苏广绸缎庄^①，“股东是（太谷）城南五里沟子村负家，该号内统有各行商业，各个名市和码头都设立分庄，……该号不论在本省和外埠信用都很高”^②。道光年间，财东负氏与孔氏合资改组志成信为票号，志成信遂成为“太谷之领袖票号”。志成信最盛时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沈阳、锦州、营口、上海、苏州、南京、汉口、沙市、湘潭、广州、开封、济南、周村、烟台、吉林、太原、忻县、解县、运城、新绛、曲沃等共 24 个城镇设立分庄。每股分红最多时达到 14 000 两。^③

从下表 5-3 可以知道，道光中叶的太谷县城金融业的组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票号，也有帐局，还有当行和钱铺，同时还存在较小的金融机构——赁局和炉院。其中，当行参与捐银的商号数量和捐银均最多，其后依次为票号、帐局、钱铺和赁局，炉院最少。票号虽只有一家参与捐银，但在金融业单个商号捐银中数量最多，为 25 两，远远高于其他。由此可见票号虽产生不久，但已显示出其雄厚资金实力。

^①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0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 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59 页。

表 5-3

具体行业	捐银商号数量	字号名称	捐银
票号	1	志成信	25 两
帐局	2	用通五、砺金德	10 两
当行和当铺	11	城当行、乡当行、公盛当、聚源当、双合当、天裕当、天恒当、恒美当、恒昌当、阜本当、亿中当、	120 两
钱铺或钱局	3	源丰钱局、义元钱铺、万源钱铺、	9 两
赁局	1	信合赁局	2 两
炉院	1	聚亿炉院	500 文 (折银 3 钱 8 分) ^①
合计	19		166 两 3 钱 8 分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据史若民等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 363—371 页，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大观楼碑记》统计。

清同治、光绪年间，太谷县成为省内的金融中心，“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②。卫聚贤称：“山西之金融中心，确系太谷”^③。由于太谷的在金融业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当时“太谷标”成为省内金融界放宽利率的一项重要指标。“山西之标，分为两种，一为太谷标，即为太谷一县之标；一为太汾标，即太原府所属之祁县、榆次、与汾州府所属平遥、介休之标。……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势力，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立一标。且各路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太谷，办收交，开利率，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做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经济势力之大”^④。也正因为太谷县经济地位的重要，清末各行省组建商会时，山西省商务总会开始曾设在太谷县城。

5.1.3 祁县

祁县，清代属太原府，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由县治东北 140 里达省治^⑤。祁县“扼汾潞之要，控豫引雍”^⑥，地当要冲，交通便利，历来为

^① 1 两白银折制钱 1300 文。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 年版。

^②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太谷县志·序》，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③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 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 页。

^⑤ （清）刘发航修，李芬纂：光绪《祁县志·疆域》，卷二，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⑥ （清）刘发航修，李芬纂：光绪《祁县志·疆域·城池》，卷二，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山西交通枢纽之一。乾隆《祁县志》载：“祁县南道河东，通秦陇，东南逾上党，达中州，北当直省孔道，固四达之衢也”^①。清代有两条驿路通过县境：一条是秦陇等地北上必经之路，有“川陕通衢”之称；另一条是由晋中通往晋东南的孔道。

祁县城，东西长约 850 米，南北长约 700 米，呈长方形，周长约 3 公里。城设四座城门，东曰“瞻凤”、西曰“挹汾”、北曰“拱辰”、南曰“凭麓”。整个城区布局以十字街口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垂直交叉，南正北直，东西对应，四条大街路面均宽 6—7 米，以十字交叉为骨架，全城辅以 28 条街巷。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均为商业街，临街门面大都为商号店铺，其中东、西二街更为繁荣。大德诚茶庄、亿中恒钱庄均坐落于西街，且毗邻；祥云集烟店、巨贾渠家宅院、大德恒票号、宏晋银号、谦和诚杂货店等字号均坐落于东街。此外，在东街街巷中还有起先业茶后改票号的长裕川茶庄、祁县富商何家宅院等。

道光十七年（1837），祁县第一家票号合盛元创立，随后相继成立了大德兴、大德通、元丰久、三晋源、存义公、大德恒等票号。至光绪十九年（1893）祁县城内先后创办票号 13 家，^②形成祁县帮票号，祁县城逐渐成为山西省金融中心之一。

祁县城是清代南茶北运在山西境内重要的中转站，城内开有多家茶庄，极盛时达到十数家，分号遍布于各大城市。现将祁县城内部分茶庄情况列表：

表 5-4 清代祁县城内部分茶庄情况统计

名称	东家	业务	地址
大德兴	乔氏	茶庄兼汇兑	小东街路北
大德诚	乔氏	钱庄兼茶庄	西街路北
大玉川（三玉川）	大盛魁	茶庄	财神庙街路北
巨盛川	大盛魁	茶庄	财神庙街路南
长裕川	渠氏	茶庄兼营盐业	—
永聚祥	何氏	茶庄	东大街路北
亿中恒	乔氏	茶庄兼营钱庄	—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 年版，第 44—47 页。

^①（清）陈时纂修：乾隆《祁县志·关梁》，卷二，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

^②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79 页。

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大德诚和长裕川。大德诚茶庄设在西街北路,是祁县富商乔氏投资的生意,兼营茶庄和钱庄。这家茶庄专办三和茶(又称千两茶)、德和贡尖。^①长裕川茶庄的前身是长顺川,在城内段家巷,其东家是城内富商渠氏,专营砖茶和红茶。^②茶叶的广泛外销,不仅为茶庄积累了雄厚的资金,还给财东带来丰厚的利润。“长裕川”财东渠氏在城内东大街修建富丽堂皇的“渠家大院”。“永聚祥”财东在东街街巷修建豪宅“何家宅院”。

除茶庄、票号外,祁县城内零售商业亦十分活跃,销售烟货的有“祥云集”和“长盛源”。“祥云集”开设于道光年间,坐落在东大街路北,是曲沃总号设在祁县的分庄,经营手工旱烟,主要产品有祥生烟、祥生定、杂拌烟等。^③“长盛源”开设于咸丰五年(1855),其前身是“长盛德”,兼营花布庄和烟店,号址城内西大街路北,主要经营各种杂烟和包烟。^④此外,祁县城内还有烟、酒、油、面、南货、首饰、药材等商行存在。^⑤

第二节 晋南区

5.2.1 解州

解州,位于山西省南部,傍河东盐池。解州古称解梁,清代雍正年间改为直隶州,自州至省治930里^⑥。因盐池全部在解州管辖之内,故称盐池为解池。解州州城周长“九里十三步,四门,东曰长乐、西曰崇宁、南曰镇山、北曰永安”^⑦,是解州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城内设有州署、吏目署、西场盐大使署、驻外委千总署、道正司等行政部门。城内四坊,乾隆年间“共一千三百二十六户,共六千六百三十五口。”^⑧由于盐产及优越的地理位置,解州在清代中期便发展成为市肆繁华,五方杂处的晋南商城。

解州为三国名将关羽的故里,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坐落于此,此关帝庙

^①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版,第57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版,第68—69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版,第61页。

^⑤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九十五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版,第1050页。

^⑥ (清)马丕瑤、魏象乾修,张承熊纂:乾隆《解州全志·疆域》,卷一,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⑦ (清)马丕瑤、魏象乾修,张承熊纂:乾隆《解州全志·城池》,卷三,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⑧ (清)马丕瑤、魏象乾修,张承熊纂:乾隆《解州全志·户口》,卷三,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是列入古代国家祭祀的关帝本庙。“关帝庙，在城西外百步，南面条山，北负硝池，”^①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宋朝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建，此后历经多次地震、战争、火灾，屡毁屡建。清康熙四十一年（1072）庙内大火，又历十载而重建，即现存建筑。庙以东西向街道为界，分南北两大部分，总占地面积约 66,600 余平方米。街南称结义园，由结义坊、君子亭、三义阁、莲花池、假山等建筑组成。残存高 2 米的结义碑 1 通，系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言如泗主持刻建。街北为正庙，座北朝南，仿宫殿式布局，占地面积 18,570 平方米，横线上分中、东、西三院，中院为主体，主轴线上又分前院和后宫两部分。前院依次是照壁、端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坊、御书楼和崇宁殿。两侧是钟鼓楼、“大义参天”坊、“精忠贯日”坊、追风伯祠。后宫以“气肃千秋”坊、春秋楼为中心，左右有刀楼、印楼对称而立。东院有崇圣祠、三清殿、祝公祠、葆元宫、飨圣宫和东花园。西院有长寿宫、永寿宫、余庆宫、歆圣宫、道正司、汇善司和西花园以及前庭的“万代瞻仰”坊、“威震华夏”坊。全庙共有殿宇百余间，主次分明，布局严谨。笔者曾于二〇〇二年四月陪同导师许檀女士前赴考察，收集到一批珍贵的碑刻资料。以下，将以此次收集的资料为中心对清代解州的商业进行考察。

春秋楼位于关帝庙的后部，楼内有关羽读《春秋》像，故名。春秋楼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现存建筑为清同治九年（1870）重修的。刀楼和印楼的南北墙上，镶嵌清同治九年（1868）重修关帝庙春秋楼时远近商众布施石碑数通。从现有碑刻资料上来看，解州关帝庙春秋楼的这次重修采取集资方式。无论行商、坐贾均系认捐，似未采取抽厘方式，故无法依据抽厘所得对其经营规模做出估算。不过我们仍可根据碑文资料对该地商业做进一步的考察。

碑刻资料中共记载了参与集资的字号 864 家，其中直接可以从字号名称中看出所营行业包括：药材行、柏木行、玉器行、茶行、线行、当行、粉局、麻行、木厂、栗店、山货行、彩局、皮货行、扫帚行、皮箱局、油店、钱局、票号、针行、钱局、缎店、金局、银局、纸局、盐店、花炮局、草帽行、香房、靛行、油布局、夏布行、菸店等 32 类店铺，工商业类别比较齐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

在不同行业的集资中，捐银最多的是包括当铺、钱局和票号在内的金融业，共捐银 395 两 3 钱。捐银数额名列第二位是药材行，在碑铭中共出现两次，一

^①（清）马丕瑤、魏象乾修，张承熊纂：乾隆《解州全志·坛庙》，卷三，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次捐银 256 两，另一次与其余九家商号共捐银 85 两，每家平均 8 两 5 钱，如此计算，药材行共捐银 264 两 5 钱。名列第三的是包括粟店、粉局、油店在内的粮油业，共捐银 180 两 1 钱。茶行 5 家捐银 157 两 1 钱，列第四。木行 5 家，捐银 82 两 9 钱 5 分钱列第五。^①详见下表：

表 5-5 同治九年（1870）重修春秋楼捐银行业统计

所属类别	具体行业	捐银
金融业	票号、当行、钱局	395 两 3 钱
药材行		264 两 5 钱
粮油业	粟店、粉局、油店	180 两 1 钱
茶行		157 两 1 钱
其他行业	麻行、彩局、靛行、针行、扫帚行、花炮局、草帽行、油布店、纸局、香房、皮箱行、山货行、金局、皮货行、夏布行、木行	120 两 45 钱
不详		7798 两 5 钱 5 分

注：白银 1 两折制钱 1500 文。^②

四家参与捐银的票号分别是：平（遥）帮票号百川通、蔚泰厚；祁（县）帮票号元丰玖；太（谷）帮票号志诚信。参与捐银当铺有通泰当、充益当两家及闻喜当行。捐银钱局只有 1 家，即隆盛钱局。当铺和钱局是早于票号出现的金融机构，便于民间小额信贷。自 1823 年国内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创办以来，各地商人纷纷效仿，而山西票号以平、祁、太三帮实力最为雄厚。三帮均有票号在解州设立分庄，足以看出山西票号商人对此地的重视。繁荣的商业是金融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金融业捐银数额较大，除了说明当地金融业较为发达之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解州商业的繁荣。

药材行捐银 264 两 5 钱，位列第二。山西本省主要出产甘草^③、党参等药材。而“大黄、黄耆、甘草、枸杞、黄芩、车前、泽泻、蒲黄、木贼、艾蓬、蒲公英、白蒺藜”等则多产自蒙古。“大黄为蒙古物产大宗所在有之，多运入内地。”^④故此处药材行的药材除来自山西本省，还有可能来自邻近省份，亦有可能来自蒙古地区。

捐银总数列第三的是粮油业，包括粟店、粉局和油店，共捐银 180 两 1 钱。

^① 据镶嵌于解州关帝庙印楼、刀楼南北墙的《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统计。

^②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年版。

^③ （清）李培谦，阎士驥等：道光《阳曲县志·舆地图下·方产》，卷二，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葛英篆刻本。

^④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物产》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粟是未脱壳的小米，产于我国北方黄河流域，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解州位于山西西南部的汾河谷地，拥有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适于粟的生长。解州所辖夏县盛产粟，且夏县民人俗尚商贾，秋收之后，除留部分做口粮外，将其余在市场出售。故有“（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每新谷登场，量存一家口食，余即棗卖，以作资本，外出贸易……粮食转贩他处。”^①从经营粟米的店铺参与捐资的数量及捐银数额来看，粟米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粮食，市场需求量较大，而当地粟的种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当地“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②，“山西平（阳），汾（阳），蒲（州），解（州）等处，人稠地狭。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给于河南，陕西二省。”^③其二，解州及相邻的安邑“地濒鹵海”，“闾閻之夫率趋盐利握算，佣工不务本业”^④。贩盐利大，故当地居民多业盐或从事相关产业，而不事农业。

陕西关中粮食是山西粮食的主要来源之一，乾隆八年关中麦熟后一月间，运销山西“已不下二十万石”。^⑤曾国荃在任山西巡抚时向朝廷汇报山西粮食出路也称，同治以前“平、蒲、介、绛以陕西米麦为大宗”^⑥。关中粮食经渭水入运城盆地是一条传统输粮路线。渭水眉县以东，便可行舟，沿黄河输入汾水多用“漕粮小船”，早在康熙四十四年，晋省就捐造百只漕粮小船，在汾河往返试行，^⑦以资运粮。此外，河套粮食沿黄河南下至蒲、绛等州。虽然此段黄河为季节性航道，一年仅有6个月^⑧可行船运米，但利用黄河水运运输口外余粮一直是清代解决晋中南缺粮问题的一条途径。乾隆初年，归化城利用“牛皮混沌”编筏装米，沿河而下，至壶口起岸陆行10里复行装船，运至晋南。^⑨乾隆中后期，赴归化粮贩多造小型“圆底船”运粮以便通过急流、漩涡，至壶口连船起运陆

①（清）鲁九阜《鲁山木先生集》，《稟后众水平稟事宜》。

②（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

③（清）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三，《请开杂禁疏》，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④（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风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⑤《陕西巡抚塞楞额为遵旨查复本省麦石棗卖出省情形奏折》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历史档案》，1990年第三期。

⑥（清）曾国荃：《曾文襄公奏议》，卷八，《申明裁种罌粟旧禁疏》。光绪《广灵县志·政令》，卷六。

⑦《山西巡抚葛礼奏报造船将竣工竣折》，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转引自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二期。

⑧《山西巡抚刘于义为筹划将口外之米以牛皮混沌运入内地事奏折》，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历史档案》1990年第三期。

⑨《山西巡抚刘于义为筹划将口外之米以牛皮混沌运入内地事奏折》，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历史档案》1990年第三期。

行后再下水，至禹门镇移米入平底大方船再运至荣河、永济境内。^①由此可知，这些粟店所经营的粟米大都来自与山西紧邻的陕西关中或口外归化各厅。

捐银总数列第四的茶行，参与捐银的共有 5 家，共捐银 157 两 1 钱。清代前期山西商人远赴福建贩茶，南茶北上由泽州入晋，解州非南茶入晋孔道，而此地茶庄较多，捐银数额较大，应当是以供应本地消费为主。

表 5—6 所列是解州捐资数额分类统计。捐银 100 两以上的大商号，有 44 家，占商号总数的 5.1%；捐银在 10—100 两之间的中等商号有 72 家，占商号总数的 8.3%；10 两以下的小商号有 748 家，占商号总数的 86.6%。864 家合捐银 8 878 两 5 钱 5 分，钱 43 400 文，按钱 1 500 文价 1 两白银计，总共捐银 8 907 两 5 钱^②。

表 5—6

分类	捐资额	商号数	占总数%	金额	占总捐银%
大商号	100 两以上	44	5. 1%	5256 两	59%
中等商号	10 两以上	72	8. 3%	1131 两	12. 7%
小商号	其余	748	86. 6%	2520 两 5 钱	28. 3%
总计		864	100%	8907 两 5 钱	100%

资料来源：据镶嵌于解州关帝庙印楼、刀楼南北墙的《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商号在参与集资的商号数量上，远远少于中、小型商号，只占参与捐银商号总数的 5.1%，而在捐银数额上则大大多于中、小型商号，占到捐银总数的 59%。大商号数量较多，城内消费容量较大，消费群体多元化，且发展较为均衡，以致各种规模的商号均有与之相适的消费群体。既可以支持众多大商号的生存和发展，又有中、小商号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解州城内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5.2.2 运城

运城，位于解州安邑县境内，一名路村，历代以来皆属安邑，因运司驻扎，故名运城，又名凤凰城。^③在安邑县治西 15 里，解州东 40 里。至省治 920 里。

^①（清）乔光烈：《论黄河运米赈灾书》中称这种水陆联运方式从口外至晋南约计“每石水陆运费不过四钱，内外商民，获利颇厚”。转因自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8 年第二期。

^②据镶嵌于解州关帝庙印楼、刀楼南北墙的《重建春秋楼绅商布施碑记》统计。

^③（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疆域》，卷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①

运城兴建于元末，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座盐业专城。清代，运城“周围九里十三步，计一千七百丈，高二丈。四门，东曰放晓，西曰留晖，南曰聚宝，北曰迎渠”^②。城内设有巡盐察院，运司署，运同署，分驻运城州判署，中场、东场、西场三大使署，都司署。此外，还有经历司署、知事署、库大使署、把总署、运学教授署等官僚机构，建有运储仓、运漕仓，养济院，司艺所，公桑园等。^③城内设九坊，分为四街。九坊是：厚德、和睦、宝泉、货殖、荣恩、贤良、甘泉、永丰、里仁。四街是城内规定的集市之处。^④街坊棋布，衙署星罗，仓库坛庙无不备具。^⑤在城市体制上，运城“其地属安邑县辖”，但除“一切编户保甲悉于安（邑）就理”外，其盐政并不在县政治理范围内，而体制自备，“坛壝学校、官师武备、坊市保甲及报祭宾兴诸典礼，俨与邑等”^⑥。

清代，池盐的采集实行“畦归商种”。具体而言就是，将所有的盐池盐畦盐地交给商人生产，商人按领畦地纳课，并拥行盐引，由开始的盐商产销一体，成为后来的产销分离，出现了“坐商”和“行商”。康熙十九年（1680），有坐商513名，每商一处，领地8分3厘^⑦；坐商每领一号畦地，纳课6锭，每锭银50两，一号畦地即纳银300两。康熙二十七年（1688），盐池的产销商人分开，产商不管运销，运商不管产盐。运商须在北京备案方可经营。业盐者大多是平阳本地人，也有其他府州商人。这种“畦归商种”的经营形式，使盐产量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商人各自指挥自己雇佣的盐工进行生产，其生产关系较前代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池盐运销方面，明初是实行以物易盐的开中制。明中叶以来，改变为纳银凭引运销后，大大活跃了商人货币资本。到了清代，池盐生产由官办改为商办后，随着生产和运销业务的扩大，商人在清前期又分化为专事运销的商人——运商；专事生产的商人——坐商，进一步推动了池盐业运销的发展。清乾隆年间（1736—1795）池盐运销秦晋豫三省，且“在山西则太原、

①（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疆域》，卷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②（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城池》，卷三，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③（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公署》，卷三，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④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⑤（清）石麟、朱一凤等：《河东盐法志·运城》，卷八，雍正五年（1727）刻本。

⑥（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序》，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⑦（清）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盐法》，卷四五，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汾州、宁武、辽、沁、平定、忻、代、保德等四十二州县领河东之引，而不食河东之盐。陕西惟邠州之长武，及凤翔之一州七县领河东盐引而食花马池盐，余则皆仰给于河东也”^①。

官署衙门的文武官员，以及隶属书吏、人役等为数众多，是构成运城人口的特殊部分。而“或以科第奋迹，或以货郎起家，”的安邑缙绅，半数以上在运城居住^②，是运城人口的另一组成部分。此外，“每岁浇洒之时，工作人夫盈千累万”^③，因此以涝采池盐为生的盐丁也是运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运城内还有“富商大贾”和“游客山人”等。

随着盐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增加，运城内的其它商业部门也逐渐发展起来。到清前期，运城已是“商民辐辏，烟火万家”^④，“人集五万”^⑤的商业城市了。乾隆年间已经是“地濒卤海，五方杂处，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⑥，且“顾商贾聚集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几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⑦从而使运城吸纳了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成为晋南经济中心。这样使得运城“五方杂处，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至安邑缙绅运城居半。或以科第奋迹，或以货郎起家，是亦晋省一都会也”^⑧。从而使得“本邑渐形零落，仅成为县政中心，商肆居民不是增益，游观者或消为荒堡”^⑨。由于运城的兴起，使得解州日渐衰落。并且，这种势头早在明代就初见端倪，乾隆《安邑县志》载，明人袁翱说：“（商人）纷纷然皆都于潞村（运城），而居解之民浸以凋落。”^⑩由此可见，运城确是以盐兴起，以盐业经济为主的山西南部重要的商业城镇。

①（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疆域》，卷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②（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风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③（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风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④（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志·运城》，卷八，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⑤（清）言如泗：乾隆《安邑县志·序》，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⑥（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风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⑦（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物产》，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⑧（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风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⑨赵祖朴、周毓瑄修，景定成纂：民国《安邑县志·城邑考》，卷二，民国二十三年（1934）修，稿本。

⑩（清）言如泗：乾隆《安邑县志·艺文》，卷十二，袁翱《复盐池西禁门记》，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5.2.3 绛州

绛州，位于省境南部，清代为直隶州，距省城 750 里^①。因地处汾水下游，地狭人众，境内人民重商服贾，乾隆《直隶绛州志》载“绛（州）古唐地，旧称土瘠民贸，迄今地狭土燥，民无可耕俯仰无所资，迫而履险涉遐，负贩贸迁以为谋生之计。”^②“城市之民，无寸田，多贸易，盈难而虚速，乡民务耕织，悬崖畴经苟可种，无间旷，抱布贸易，殆无虚日，土狭而瘠使然也。”^③

清代，绛州城城周 9 里 13 步^④，城内店铺鳞比，市肆繁华，与山西北部的大代州城，有“南绛北代”之称。绛州濒临汾水，为清代汾水沿岸的重要码头。绛州航运路线即由绛州禹门口，归黄河，顺流而下，至风陵渡，又向西进入渭河逆流而上，经渭南、西安，可达咸阳。李燧著《晋游日记》这样描写：“绛州城临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厘辐辏，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竞弋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⑤“登浮图，俯视闾闾，烟火万家，历历在目。”^⑥

航运的便利是绛州在清代繁荣，并逐渐成为秦晋之间的商品集散市场的重要因素。“每岁初冬，陕船自渭河入黄转汾以至绛，春初西返”^⑦，“至 8 月以后停运。”全年通航时间有 6 个月。“航船全系木制，长 4 丈，高 5 尺，吃水 2 尺多，载重 10 万多斤。每只船有水手 20 余人。船内设有卧舱、伙房。”^⑧由绛至风陵渡，为顺水，行速；转渭为逆水，行缓。返航反是^⑨。由于装载有限，故“船只由绛入陕，只载铁货一种。由陕回绛，运货则以菜子油为主。”^⑩

经绛州输入陕西的铁货主要来自晋东南之潞泽地区。铁货从产地运至绛州，运力以骆驼为主，也有用推车和驴驮先将铁货运至翼城，再用大车运到绛州的，据黄鉴辉估计，年运铁货达 1 000 万斤以上。¹¹绛州的铁货除航运入陕外，还有大车运输。

另外，秦晋商品生产的差异也是决定绛州商品集散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

^①（清）张成德修，李友洙、张我观纂：乾隆《直隶绛州志·疆域》，卷一，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②（清）张成德修，李友洙、张我观纂：乾隆《直隶绛州志·艺文》卷十七，马恕《绛民疾苦记略》，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③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礼俗》，卷十，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④（清）张成德修，李友洙、张我观纂：乾隆《直隶绛州志·城池》，卷一，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⑤（清）李燧：《晋游日记》，卷一，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

^⑥（清）李燧：《晋游日记》，卷一，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九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

^⑦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卷首》序，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⑧任永昌等：《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载《山西文史资料》，1984 年第 4 期。

^⑨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63 页。

^⑩任永昌等：《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载《山西文史资料》，1984 年第 4 期。

¹¹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63 页。

秦盛产菜子油、木材等，甘肃所产皮毛也由秦入晋销于晋省各地。山西潞泽地区的生铁以及各类铁货经绛水运销往陕甘。清代由京城至秦蜀官道畅行，京津杂货由官道经晋，至曲沃县高显镇西折，不再走官道，沿汾河滩西行，达绛由水运至陕。因此，当时绛州不仅舟楫畅行，而且城内车马、骆驼络绎不绝，街道两旁车马店、过载店、各类店铺鳞次栉比，有“小苏州”之称。

第三节 晋东南区

潞安府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北临沁州，西靠平阳府。长治为潞安府治，以长治县为附郭，县城“城中四门，直径四里，周围凡二十四里，城既宽广，楼亦高大。……南北穿城七里，东西穿城五里。门四，上各有楼，东曰潞阳、南曰德化、西曰威远、北曰保宁。”^①在省治东南450里。^②泽州府位于潞安府南，西与平阳府及绛州接壤，凤台为泽州府治，以凤台县为附郭，县城“城周九里三十步，东、西、南门各二。”^③在省治东南680里。^④

潞安府和泽州府的地理位置重要，交通方便。潞安府的屯留县历为上党关隘，自古有“韩国要地”、“三晋通衢”之称。东经潞城、黎城有官道可直达河北邯郸。北经境内的老爷山有官道，可达并州。往西通过境内摩珂岭上的上党关可达平阳。南经潞安、焦作即达新郑、洛阳。黎城县也位于交通要路，“黎（城）处二漳之间，与豫州接壤。壶口一关有车不得方轨，人不得口肩之势，故设巡检以司之。……盐法于是有赖，商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⑤泽州南临河南省，从清代祁县乔家开设的大德诚茶庄赴湖北办茶的“水陆路程底”中可知，办茶必经泽州府。^⑥

潞安府与泽州府同处太行山脉南端，自然环境不十分优越，不利于农业发展，且该二府地少人多，产不敷食。潞安府“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⑦泽州府“介万山中，枉得泽名，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

①（清）李楨、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建置·城池》，卷三，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②（清）李楨、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地理·疆域》，卷三，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③（清）张貽琯修，郭维恒等纂：光绪《凤台县志·城池公署》，卷一，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④（清）朱棣修，田嘉穀纂：雍正《泽州府志·疆域》，卷五，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⑤（清）程大夏修，李御、李吉纂：康熙《黎城县志·职官十二》，卷二，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⑥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祁县至安化水陆路程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⑦（清）杨骏修，李中白，周再熏纂：顺治《潞安府志·地理四·气候·物产》，卷一，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食不足，……贾人冶铸盐荚，曾不名尺寸田。”^①虽然如此，但潞安府与泽州府在明代甚至清代均以盛产铁器及朝廷贡品——潞绸和泽绸而闻名全国。

明代，潞安府和泽州府是全国著名的丝绸产地，曾在明万历年间（1575—1620）达到高峰，由于“潞绸机杼斗巧，织作纯丽”^②而被朝廷征派，成为贡品，“万历中诏潞安进纳二千四百匹，未几复命增五千匹”^③。当时，潞安府潞绸的生产规模很大，“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号称利藪，其机则九千余张”^④，万历三年（1575），坐派山西黄绸（潞绸）2 840 匹，用银 19 334 两；万历十年（1582），坐派 4 730 匹，用银 24 670 两；万历十五年（1587），坐派 2 430 匹，用银 13 000 两；万历十八年（1590），坐派 5 000 匹，用银 28 060 两。在短短十五年里，向山西坐派潞绸 15 000 匹，用银 80 064 两。^⑤明季，潞绸生产的规模空前，而仅“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⑥。

清代，潞安府的长治县和泽州府的高平县仍向朝廷纳供潞绸，但其生产规模和纳贡数量远不及明代。据嘉庆《大清汇典事例》记载：“潞绸：顺治初年，山西省长治高平二县，岁织潞绸三千匹。八年，……每岁织三百匹，长治县一百八十六匹，高平县一百一十四匹。康熙六年题准，减去大潞绸一百匹，改织小潞绸四百匹……每年长治县大绸一百二十四匹，小绸二百四十八匹。高平县大绸七十六匹，小绸一百五十二匹。十四年议准，……每年长治县织解大潞绸六十二匹，小潞绸一百八十六匹。高平县织解大潞绸三十八匹，小潞绸一百四十匹。十七年题准，潞绸每匹准销银十二两五钱，小潞绸每匹准销银二两七钱五分”^⑦。康熙年间（1662—1722），潞绸贡纳部分维持在 300—400 百匹。

乾隆二十九年（1764）调潞缎 90 匹、泽绸 50 匹以及其他省份所产丝绸运至新疆进行贸易交换。^⑧乾隆三十三年（1768）调泽绸 300 匹供新疆贸易。^⑨乾

①（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五。

②（明）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

③（清）李楨、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风土记》，卷八，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④（清）杨俊修，李中白，周再熏纂：顺治《潞安府志·地理四·气候·物产》，卷一，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⑤转引自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⑥（清）张淑渠、姚学瑛等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卷九，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⑦《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二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⑧《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3辑，55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2辑，370—37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隆三十八年(1773)为伊犁贸易需要,调取凤台、高平产双色泽绸200匹。^①乾隆三十年(1765),陕甘总督因喀什噶尔贸易需要,特请准从山西采办潞绸、泽绸,由驿传递送到甘肃。^②此后,山西的泽绸一直被列入运往新疆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伊犁、乌什、叶尔羌等地的指定产品。嘉庆时(1796—1820),山西每年上解户部的农桑绢300匹,生丝绢1200匹,大潞绸30匹,小潞绸50匹。潞绸在民间也得到广泛的使用和认可,“是绸(潞绸)也,士庶皆得为衣。”^③潞绸和泽绸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丝线作原料,“山邑不出桑茧,丝线取给于山东,河南,北直等外。”^④潞绸织造还取材于四川阆中县,“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⑤。

如果说,潞绸是明代潞泽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那么,清代该地区最重要的产业是冶铁及铁器制造业。明代就曾有“以潞锅与诸部互市”^⑥的记录。清代潞泽地区的冶铁和铁器制造业十分繁荣,潞安府“铁行炼石铸山,货于不涸之府”^⑦,“潞之西山中,有苗化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借而食者常百余人。”^⑧而泽州府无烟煤和铁矿分布颇广,陵川县和阳城县都有很多^⑨。潞安府长治县和泽州府高平县交界处,铁矿蕴藏丰富,光绪年间隶属潞安府的长治县南乡,有冶铁炉20—30座,每炉每日产铁300—400斤不等,总计每天产铁1万斤左右。^⑩在泽州府属高平县东乡的陈曲河、米山河一带,西乡的香庄河、山后一带,共有铁矿炉156座,每日每炉出铁300—500斤,总计每天产铁7万—8万斤。

清道光年间是泽州冶铁业最为繁盛的时期,凤台县共有熔炉千余座。熟铁炉约计百余座。铸铁业共有熔炉四百余座¹¹,产量十分巨大。大阳镇和高平县是

^①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3辑,第584—58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② 《户部提本》,兼管吏部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等《谨题为奏明事》,存第一历史档案馆。

^③ (清)张淑渠、姚学瑛等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艺文》,卷三一,《请停止砂锅绸疏》。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④ (清)吴九龄修、蔡履豫纂:乾隆《长治县志·赋役》,卷七,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⑤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平露堂刊本。

^⑥ (清)李楨、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风土记》,卷八,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⑦ (清)杨岐修,李中白,周再熏纂:顺治《潞安府志·地理四·气候·物产》卷一,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⑧ (明)唐甄《潜书》下篇《富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⑨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页。

^⑩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5页。

¹¹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三编,第171—172页。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3—144页。

泽州府炼制生铁的主要地区。^①

潞泽地区所生产的铁货主要来自泽州府之阳城、凤台，潞安府之荫城，当时号称三城。阳城以生铁货为主，大小锅、笼盖、笼圈，以及犁、耙齿、炉条等。凤台以生产锅鼎刀剪为大宗^②。荫城镇属长治县，紧临县治，是长治县和高平县铁矿“萃聚之区”，城内共有铁行 30 余家，制造铁器之炉 300 余家。^③荫城以熟铁货为主，如铁锅、炒瓢、马勺、菜刀、斧头、锯条及锄、镰等。^④

潞泽地区的铁货或从产地运至绛州，顺汾河而下入陕^⑤；或与当地所产无烟煤一起运至河南清化镇。^⑥潞泽铁货运至清化镇的数量相当大，“路上……络绎不绝，成群结队的骡车，满载着种类繁多的铁器，平均每天 150 吨左右。”^⑦

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潞泽地区境内一些小城镇的发展。泽州府大阳镇原本是一个小村镇，随着当地冶铁业的繁盛，逐渐成为“人烟稠密”的城镇，并且产量巨大，“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足有几亿人是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⑧阳城县位于泽州府南部，县城原“袤五百五十有九丈，…咸丰三年重修，建凡城周围二里三百一十二步，高三丈五尺，三门，门各有拱极楼一座。”“城西北隆起，形势天然，东西长而南北狭，东南狭逾甚，俗称凤凰城。”^⑨虽“水陆不便，舟车不通，”^⑩但丰富的铁矿及铁制品的生产使得当地从事此类生产及贸易的商人较多，并随之带来其他商品的流通。冶铁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当地家庭铁冶小作坊的发展，“有大量的厂子从事于铁的继续加工。特别时制造铁丝和铁钉。这种业务大半是规模极小，在村民家中进行。”¹¹（泽州）有“好几百家小铁铺，它们之间有着分工，每一家制造某一种铁器”。¹²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39 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六编，第 465—466 页。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4 页。

^③ 光绪二十八年，山西黎城县禀开潞属煤矿情形，政艺丛书，艺书通辑，卷五，第 11 页。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5 页。

^④ 任永昌、杨作梅：《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年版。

^⑤ 任永昌、杨作梅：《新绛县的航运业与铁货业》，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年版。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3 页。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3 页。

^⑧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39 页。

^⑨ （清）赖昌期修，谭澧、卢廷芬纂：《阳城县志·方輿·城池》，卷四，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⑩ （清）沈继炎修，杨念先纂：民国《阳城乡土志·商务》，清光绪末年修，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¹¹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0 页。

¹²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 142 页。

清代,由于盛产绸缎和铁器,潞泽地区的人民外出经商成风,“(高平县)四郊东务农,西服贾”^①。“长治县志,永宣成宏之时,士敦行,务实农商,亦俭素朴”^②。潞商的足迹遍及国内许多地区。乾隆十一年(1746)《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载:“吾山右之贾于京者,多业铜、铁、锡、炭诸货。以其有资于炉也,相沿尸祝炉神。其伏魔殿、佛店前后,修举于潞商”^③。民国九年(1921)《潞郡会馆纪念碑文》载:“广渠门内,东兴隆街,今名土地庙,旧有潞郡会馆炉神庵一座。院外余地,是潞人坟茔。例如祭祀会议,养病停柩,向为郡人铜、锡、烟袋三帮经理”^④。此外,洛阳建有潞泽会馆^⑤、山东周村的山陕会馆是泽州商人所建。

第四节 晋北区

5.4.1 杀虎口

杀虎口位于朔平府右玉县城西北70里,三厅县(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交界处,是清代山西最早设立的一个税关。

杀虎口,明代中叶成为蒙汉交易的重要场所。嘉靖二十三年(1544)筑堡,周长2里,高3丈5尺,万历四十三年(1615)于近堡处另筑新堡,名平集堡,周2里,中建客店,内外交易。^⑥由于两堡分设,终为不便,遂在两堡中间东西筑墙,合二为一,前后左右各开堡门,东西南北四下畅通,合堡周长540丈,共计3里,并驻有官吏、兵丁。^⑦从而,杀胡堡边疆贸易市场逐渐完善。堡内“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⑧。

清统一内、外蒙古之后,更名为“杀虎口”,于顺治八年(1651)设监督一员,经收税课,^⑨内设户部抽分署、笔帖试署、驿传道署、巡检司署、协镇署、

① (清)朱棣修,田嘉穀纂:雍正《泽州府志·风俗》,卷十一,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② (清)张淑渠、姚学瑛等修,姚学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风俗》,卷八,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③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④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⑤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载《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⑥ (清)刘铭传撰:雍正《朔平府志·建置·城池》,卷四,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⑦ (清)刘铭传撰:雍正《朔平府志·建置·城池》,卷四,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⑧ 《明实录》卷五五八,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

⑨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二日,第455-45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中军都司署等行政机构，^①设立杀虎口税关。杀虎口税关以边墙及黄河为界，在东至天镇县新平口，西至陕西神木口，长达 200 多里的边线上多处设卡征税，并且规定“商人载运货物例须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路私行。”^②

蒙古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唐努乌梁海、科布多、扎萨图汗部、三音诺颜部及内蒙六盟地区牧民生活所需的绸缎、布匹、茶叶及日常生活器具皆主要由内地商人，经杀虎口出关供应。而蒙古之牛、羊、驼、马、皮革、木植等所出，均有杀虎口缴税进关销往各地。^③因此，杀虎口成为蒙汉商品交汇的要冲，在雍正年间，已形成“商贾络绎”^④的关市。

进出杀虎口税关的货物种类多样。明代只允许汉民以绸缎、布匹、茶叶等货物与蒙民之马驼牛羊相交易，为军事战略目的而严禁铁器及铜器的交易。清代，由于政府鼓励商民屯垦关外土地，因而加大关外犁、锹、镢等铁制、铜制生产工具和铁锅等生活用具的需求量，于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准许“铁器一项，杀虎口于商贩出口时详细查明，如系农具、及民间日用器物，按则征税，将名色件数注于票内，令商持票赴口验放。”^⑤从而，除废铁及铁料之外，所有铁器均许出口。

由杀虎口进关的货物，除蒙古所出牛、马、羊、驼等牲畜外，还包括油、酒、烟、盐，及木材等。明代，油、酒、烟、盐、木材等并不进口销售。随着汉民的移居关外，以及蒙汉商贸活动的增多，上述物品可以运销，并开始交纳关税。大青山木植税银，归并杀虎口监督征收。河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解部复收。乾隆年间，归化城落地木税，以四百十六两为定额，令杀虎口监督征收。^⑥乾隆二十六年（1761）准许“归化城出产油酒烟三项，与皮张杂货税银及土默特牲畜税钱，归并杀虎口按则抽收。”^⑦嘉庆年间，准许鄂尔多斯盐斤进口销售，吉兰泰池盐由该处蒙民自行捞运，“兴贩入口者，由杀虎口驮，自陆路贩售，不准水运，其贩盐之人，照例收税。”^⑧

①（清）刘铭传撰：雍正《朔平府志·建置·公署》，卷四，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②《清穆宗毅皇帝实录（二）》，卷八十八，同治二年十二月。

③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④（清）刘铭传撰：雍正《朔平府志·赋役·税课》，卷七，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⑤《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二，卷二百三十九，《户部八八·关税六·禁令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⑥《大清会典事例》工部，卷九百四十一，《工部八〇·关税一·官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⑦《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二，卷二百三十六，《户部八五·关税三·直省官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⑧《大清会典事例》户部二，卷二百二十四，《户部七三·盐法四·河东》，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5.4.2 归化城^①

归化城，蒙语为“库库和屯”，万历初赐名“归化”。清雍正元年置归化城厅，乾隆六年升为直隶厅，为归绥六厅之一，亦是山西归绥道驻所。。归化是漠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沟通漠北、漠西、天山以北各地区的经济联系的总汇。

乾隆年间随着蒙古各部的经济发展，蒙汉之间物资交流日益扩大，归化城“商贾云集，诸货流通，而蒙古一带土产日多，渐成行市”^②。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在该城设关，抽收“油、酒、烟三项与皮张、杂货税银，及土默特牲畜税钱”。定例：“凡商贩货物按驮科税为多”，也有按数量征税者；“油、酒铺房分上、中二则按年科税；土默特蒙古牲畜税每价银一两收制钱八文。”^③归化城税关初由杀虎口监督兼管，乾隆三十一年（1766）改为专设归化城监督管理。三十三年（1768）又定：归化城一带“出产油、酒、烟、皮张等项及关东等处发来商货，从草地行走，未经杀虎口征税者俱为口外土产，归化城按则抽收；其内地一切杂货贩运出口，经由杀虎口纳过税银，到归化城入铺零星发卖者不再重征。若货物运抵归化城以后，商贩车载驮运又贩往他处售卖者，则无论土产与外来货物，均于出栅时按则收税。”乾隆三十五年（1770）定归化城落地税银 15 000 两，牲畜税钱 9 000 串；嘉庆四年增盈余银 1 600 两。^④

在雁门关碑文^⑤中，归化城的捐款者只有 59 家，但以商社为多，故实际参与集资的商号估计可达 200—300 百家。其中宝丰社捐钱 155 千，集锦、聚锦、醇厚等社各捐钱 110 千，福虎、青龙等社各捐钱 60 千，其他各社分别捐钱 20 余千或 10 余千，合计捐钱 743 千，占全部捐款的 77%。其中宝丰社为银钱业，集锦社为外藩业、聚锦社、醇厚社经营杂货，威镇、荣丰、衡义等社则经营粗细皮毛。^⑥表 5—7 是归化城各商社捐资数量及其经营行业对照表，请参见。

据光绪中叶的记载，归化城“是一个聚集着不少巨贾富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着百万巨额的生意。总共卖出十万多箱茶叶，将近一百万匹布及其他物

^① 本节内容详见许檀、乔南：《清代的雁门关与塞北商城》，将刊于《华中师大学报》。

^② 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0 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六、卷二三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卷二三七、卷二三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 宣统元年年至二年重修雁门关道路碑，包括宣统元年《留芳百代》以及宣统二年残碑一通，此外还有《修雁门关道路碑记》、《张家口布施碑》、《丰镇布施碑》、《太谷县布施碑》等，共计六通，现在位于山西省朔州市雁门关，笔者曾于二 00 五年八月前去考察，并抄录碑文资料。

^⑥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99 页。

品。”^①归化城最大的商号都是经营蒙区贸易的，主要往来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古城等地。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大盛魁，它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张家口等地均设有分号。单是同蒙古的贸易额每年达 900—1 000 万两。该商号自备有 1 500 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其次是元盛德，有 900 峰骆驼，每年的贸易额达 800 万两。再次，天义德有骆驼 900 峰，年贸易额 700 万两；义和敦有骆驼 700 峰，年贸易额 500 万两。此外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等数家商号，年贸易额分别为 10—25 万两，各有骆驼 150—200 峰。他们运往蒙古各地销售的货物主要有茶叶、绸缎布匹、皮货、铁器、木器等等。^②

表 5-7 归化城各商社捐资额与经营行业一览表

商社	捐钱	经营行业 ①
宝丰社	155 千	银楼、钱庄
集锦社	110 千	外贸业
聚锦社	110 千	粮布纸张业
醇厚社	110 千	京货估衣业
福虎社	60 千	磨面业
青龙社	60 千	碾米业
集义社	26 千	靴鞋业
威镇社	26 千	老羊皮业
荣丰社	17 千	羔皮业
毡毯社	17 千	毡 行
仙翁社	17 千	戏园、饭馆业
聚仙社	11 千	茶馆业
马店社	13 千	羊马行
衡义社	11 千	细毛皮业
合计	743 千	

① 经营行业据《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第 199 页。

茶叶是从归化城输往蒙区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是砖茶和白毫茶，光绪初年大约每年销量在 10 万箱左右。其中砖茶分为 24 块一箱和 39 块一箱的两种，前者主要供应土默特地区，每年销量 3—4 万箱；后者运往乌里雅苏台，每年也达 3 万箱。白毫茶则销往伊犁和东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的维尔年斯克、塔什干等地，每年销量 3—3.5 万箱。不过从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俄国人开始自己

①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03—104 页。

②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7 页。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40 页。

向国内运销茶叶，晋商经营的白毫茶因此大受影响。^①

纺织品也是销往蒙区的重要商品，年销量将近 100 万匹。不过，光绪年间归化城销售的布匹几乎全是外国货，其品种有花旗人头粗洋布、花旗飞龙斜纹布、杂牌斜纹布、杂牌细洋布、粗洋布、洋标布、太和羽绫、虎牌哗叽等等。国产纺织品只有丝织品，而棉布则只有大布一种。^②

归化城商人从蒙古各部落换回的主要是驼马牛羊等牲畜。购买骆驼的多是专门从事运输的商号；马匹被运往长城以南，甚至远及上海和广东；羊则主要供应北京、河南、山西等地，其中仅北京的夏盛和、夏和义、天和德、三和成等几家商号每年从归化城购买的羊就达 50 万头。^③

运输业是归化城的重要行业。除各商号自备骆驼运输之外，专门从事运输业的大商号有 12 家，各有骆驼一百至数百峰。其中元德魁有骆驼 500 峰，天聚德 400 峰，这两家商号的驼队专走归化城到古城一线；双兴德、天兴恒等 10 家商号共有骆驼 2 430 峰，往返于蒙古各部和东土耳其斯坦，或从张家口把茶叶运往库伦。此外，归化城还有上百家有三四十峰骆驼的小商号，全城可供出租的骆驼总数有 7 000~7 500 峰，可以运输货物 10 万普特。其贸易范围主要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古城等地。^④

金融业也是归化城的重要行业。在雁门关的集资中，宝丰社捐钱 155 千，当行捐钱 60 千文，而大裕当则在行业之外又单独捐钱 5 千文，这三者合计已达 220 千，占全部捐款的 22.8%。又如，前述的大宗牲畜交易并不在归化城内，来自蒙古各部的牲畜和其他商品多运往包头和克克伊尔根，而货款则在归化城结算，“因为这里有许多家银号，支付货款比较方便”^⑤。此外，大盛魁、天义德等商号在蒙古各部落也经营放款业务。^⑥

5.4.3 大同

大同，位于晋北，是大同府治所在地，以大同县为附郭，西临朔平府，东与直隶接壤。在省城东北 610 里。^⑦

^①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2—94 页。

^②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4—95 页。

^③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8—99 页。

^④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6—97 页。

^⑤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8—99 页。

^⑥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93 页。

^⑦ （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疆域》，卷四，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大同城，城周长 13 里，高 4 丈 2 尺，有四座城门，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①由于北临口外，地逼边墙，因此，大同城的军事地位较为突出，城墙坚实。其城门各建有谯楼，城墙四周建有四座角楼，另外建有 54 座望楼，96 个窝铺。其城西半属大同前卫，东半属大同后卫，西北角楼较为雄壮，称乾楼。分别于乾隆十二年（1747）、二十八年（1763）重修城墙。^②

大同城内街坊以四牌楼十字街为适中之地，街口四面建坊，东曰和阳，街西曰清远，街南曰永奉，街北曰武定，四条大街直抵四座城门，^③将大同城分为四隅，城内共有大小街巷 136 条^④。

由于大同城是府、县两级行政机构所在地，故城内官署衙门众多。城内有府署、经历司署、县署、典史署、提督学院行署，还有阴阳学、医学、僧纲司、道纪司。军事机构有，总镇署、中营游击署、左营游击署、右营游击署、前营都司署。府署，在城内西北隅，内有清军厅、理刑厅、兵刑分署、司狱宅、督粮厅、经历宅、知事宅、粮署分署、吏曹公解银亿库、寅宾馆、杂货库、市货库。^⑤大同城由明代抵御蒙古的前沿转变为清代对蒙贸易的商业城镇，在北门、东门及南门外发展了大片的关厢地区，后增筑城墙；在北门外，由于军事需要，增修兵营。^⑥因此，城内有为数众多的大小官吏、隶属书吏、兵丁。

大同城是大同、朔州两府的文化中心，每逢寅申巳亥之年，三年一届的乡试即在城内提督学院举行，届时“合大、朔两郡之生童，途棚按试，”且“科岁相接，为通省岁考之终，即通省科考之始，”因此“院督规模宏敞。”^⑦从街巷布局来看，城内西北隅和东北隅为官府衙署区，西南隅为寺庙区，东南隅为文化区。

大同特殊的军事地位，使得城内兵丁人数众多，消费能力巨大，明代中后期，“大同地方，军民杂处，商贾辐辏，”^⑧“至若陆驮水航之物，藏山隐海之珍，靡不辐辏而至者，大都多东南之产”^⑨，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⑩。清初，“城

①（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营建·城池》，卷五，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②（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营建·城池》，卷五，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③（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坊表》，卷五，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④（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⑤（清）吴辅宏修，王飞藻纂，文光校订：乾隆《大同府志·衙署》，卷十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四十七年（1782）重校刻本。

⑥ 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63 页。

⑦（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营建》，卷五，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⑧《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二。

⑨（明）李维祺纂修：万历《山西通志》卷六，明万历年间修，崇祯二年（1629）刻本。

⑩（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

之有南关也，是商贾货财之所凑集。”^① 清代中叶，城内商贾云集，“邑之懋迁者太原、忻州之人固多，而邑民之为商者亦不少”^②。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

《云冈堡石佛寺历年续修工程并历年施舍银钱春瞻地亩碑记》中就有布行、杂货行、干菜行、帽行、皮行、缸行、当行和钱行的捐款记载。至道光十五年（1835）

《重修下华严寺碑记》中的捐银记载，大同城内的行业有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分别是：棉布行、粟店行、钱行、碾行、当行、油行、南宫行、估衣行、口米行、银行、木店行、口袋行、帽行、毡行、毛袄行。^③

道光年间，大同城乡有从事斗行、牲畜贩卖、泥靛补衬、棉麻、铁、炭货、水果、烧酒业、车辒、棺板、木材、脚力等行业的官牙 310 人。此外，城内还有当商 52 名。^④参见下表：

表 5—8

所属类别	名称	牙人数
斗行	斗牙	74
牲畜皮毛业	牛驴牙、羊牙、绒毛牙	74
炭	炭牙	49
水果	瓜牙、果牙	34
房屋及泥靛补衬	房牙、泥靛补衬牙、补衬麻牙、泥靛牙	27
烧酒	烧酒牙	18
脚力	脚力牙	13
店	店牙	10
铁	铁牙	6
木材	棺板牙、木牙	2
棉麻毛	旧棉花牙、旧棉花麻牙	2
车辒	车辒牙	1
合计		310

资料来源：（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赋役》，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斗牙在官牙总数中最多，共 74 人，斗行是与粮食买卖有关的牙行。大同城内人口众多，所需粮食数量巨大，而大同本地“地界北边，气寒土瘠，春分后始播麦，六月终始熟，亦有立秋后始登麦者”^⑤，所产无多。但由于清代的大量开垦荒地，使得口外归化城诸厅成为粮食产区，故本城所售粮食来自归绥六厅。

牲畜牙共 68 人，在众牙行中排第二。大同界连蒙古草原，是内地通往蒙区

①（清）胡文焯等纂修：顺治《云中郡志》卷十三，清顺治九年（1652）刻本。

②（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③参见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4 页。

④（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赋役》，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⑤（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与俄国的商品贸易孔道,各种牲畜和皮毛制品及手工业产品云集,除供本城消费外,更多的是转运省内其他地区。“蒙古人民专事畜牧,故其物产以家畜为大宗。输出诸品以此为最。”^①,蒙民所产牲畜有部分自大同转运省内。城内从事皮毛制品的手工艺匠人为数颇多,“其匠艺之最众者尤有毛袄匠、口袋匠,十倍于它处。”^②

炭牙位列第三,共 49 人。大同在康熙年间就大量出产煤炭,康熙己卯年(1689)大疫,“(大同)西山煤佣,死者甚众,暴骨于野”^③。道光年间“西乡一带农人冬日多贩煤,”^④因此,城内炭牙众多。

由于大同城内人口日益增多,使“城中四角街巷一百三十六条,房舍比栉,”且城内房屋还在不断修建和增多,需要大量修建房屋的匠人,使得匠人“盖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⑤,故城内房牙和泥靛补衬牙活动活跃。此外,大量当商的存在也是对当地商业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反映。

5.4.4 丰镇^⑥

丰镇,又称“衙门口”,乾隆十五年(1750)置丰镇厅,光绪十年(1884)升为直隶厅,是清末山西口外散厅之一。

光绪《丰镇厅志》记载:该城“大街通衢有九,小巷僻路亦数十余条,民房廛舍比栉鳞密”。光绪初年,全城“土著民人”4 480 余户,男妇大小约 30 000 口。该城之巨商大贾“率皆太原、忻、代、云郡、蔚州人”,“往来运贩归化、绥远、张家口各城”^⑦。另有记载称,“无论从居民人数,还是从本地贸易和转口贸易量来说,丰镇都算是张家口与归化城之间最大的一座城市”。^⑧

皮毛业是丰镇的重要行业之一。该镇“从蒙古收购羊毛、皮张和熟羊皮,转销大同府、天津及中国其他地方。”^⑨《丰镇厅志》记言,该镇手工业以“皮

^① (清)姚明辉纂:光绪三十三年《蒙古志·物产》,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② (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③ (清)曾国荃、张煦等修,王轩、杨笃等纂:光绪《山西通志》,卷一四三,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④ (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⑤ (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⑥ 本节内容详见许檀、乔南:《清代的雁门关与塞北商城》,将刊于《华中师大学报》。

^⑦ (清)德溥修,麻丽五纂:光绪《丰镇厅志·风土》,卷六;光绪《丰镇厅志·户口》卷五,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⑧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⑨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革、毛袄、口袋等物匠艺最繁，较他处为十倍云”^①。雁门关《丰镇布施碑》中，有西盛毛店、三成皮店、义源毛店、三成皮店等的捐款。其中西盛毛店一次就捐银120两，位居全镇之首，甚至超过当行、缸油碾面行等行业捐款，其经营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茶叶转运也是丰镇的重要行业。据波兹德涅耶夫记载“在张家口和归化城之间的整个地区，甚至直到北方的蒙古，丰镇的‘老信’之多是很出名的。‘老信’就是山西人开的一种专门用牛车给人拉货的商行里赶车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丰镇与俄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俄国每年至少有12000箱茶叶是由‘老信’从张家口运到库伦去的。”在丰镇专门从事茶叶运输的有十几家商行，其中规模最大者，如复合成、福兴永、复元店、广盛店四家，各有大车300辆；其次，崇和合、天合胜、天泰永、崇和泰、恒庆店、复合永等六家，各有150辆。仅此10家商号就有大车2100辆，而且全都是运茶的。“大车数量如此整齐划一，乍一看来是很奇怪的。原来中国人按照历来的规矩，给他们的每个代理人一律是150头牛和同样数量的大车，因此一家商行有几个办茶的代理人，它就有几个150辆大车。”^②

木材也是丰镇商人经营的重要货物之一。从“张家口承运茶叶到库伦的丰镇‘老信’，回来时总是在库伦采买建筑用的木材或木制品到丰镇。因此他们为运茶叶而所取的运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蒙古和中国的木材价格。如果库伦的木材便宜，他们付的茶叶运费就低。老信们也同意这样低的价钱，因为他们在运送茶叶方面受到的损失可以在购买木材时找补回来。”^③在《丰镇布施碑》中我们看到有复盛木店、德瑞木店的捐款。

除大宗转运商货之外，丰镇商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主要集中在苏尼特左、右二旗和阿巴嘎旗。“他们一般都在三月去蒙古，九月或十月回来，每家商行都要派出七至十名伙计，运去的货物主要是布匹、铁器和茶叶”。丰镇的茶叶、布匹、铁器多是从张家口进货，粮食则来自山西；从蒙区购入土碱运往张家口，或是到苏尼特右旗的二连诺尔湖买盐运回丰镇，“他们一般都是在每年六月从丰镇装上蒙古人所需要的粮食、茶叶和布匹，运到苏尼特人那里去换盐”；“他们把盐运到丰镇之后卖给专门的盐商，在丰镇专门做盐业生意的商行共有六家”，

①（清）德溥修，麻丽五纂：光绪《丰镇厅志·风土》，卷六。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②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9页。

③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每年收进的盐约有两千大车，共计 120 万斤左右。”^①

由于丰镇未设税关厘卡，不少归化城商人在蒙区“换回各色牲畜及绒毛、皮张”或直接贩往丰镇，或取道丰镇运往宣化、大同销售，以避税课。故清末丰镇商业日趋繁盛。光绪二十八年（1902）岑春煊的奏报称：“丰（镇）、宁（远）两厅所产土货以四项牲畜及绒张、马尾等项为大宗，商贩往来售运，销数颇巨。该两厅地面向无厘卡，不独土货无应完之厘金，即客贩经过亦无征收。从前商情浑朴，凡归化商民前往各蒙部办运货物，换回各色牲畜及绒毛、皮张者皆仍回该城出售；近则边商客贩多趋便捷，往往将蒙部换回牲畜即由山后赶往该两厅售卖，绒毛各货贩往宣（化）、大（同）者亦胥取道于此，商路日辟，运货日增。”^②在雁门关的集资中，丰镇共有 620 余家商号参与捐资，捐银 2 600 余两，钱 577 千文，正显示了清末该镇商业之兴盛。

第五节 黄河沿线

5.5.1 西包头镇^③

西包头属萨拉齐厅，在归化城以西 300 里，濒临黄河。清初它不过是个小村落，嘉庆十四年（1809）升镇，设巡检司。

乾隆中叶归化城设关征税，其中牲畜税一项，系在绥远城、西包头、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城等处“设立蒙古笔帖式二员并安设书役，抽收四项牲畜税钱”^④。道光三十年（1833）间黄河土默川航段中心码头河口镇被淹，河运中心西迁至包头的南海子渡口。以此为契机，该镇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宁夏、甘肃、青海等地皮毛、药材和粮食的集散中心^⑤。咸丰四年（1854），清政府将西包头镇、萨拉齐、托克托城三处定为归化城的分税口，凡“口内贩来一切货物并从口外贩入土产等货”，可“就近在西包头等处税厅照例完纳，赴归化城入棚时即验明放行，毋庸再征。”^⑥

牲畜、皮毛是西包头镇集散的大宗商品。光绪中叶西包头镇的牲畜贸易等

^①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9—50 页。

^② 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4—55 页。

^③ 本节内容详见许檀、乔南：《清代的雁门关与塞北商城》，将刊于《华中师大学报》。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18 页。

^⑥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方面已逐渐取代归化城的地位,光绪十九年(1893)的记载称:“近十几年以来,呼和浩特的牲畜交易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在购买牲畜方面,而且在购买蒙古的各种原料方面,归化城的作用都已让位于包头和克克伊尔根。目前来自蒙古的牲畜和原料主要是运往后两个地方。现在呼和浩特之所以参与这类贸易,只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家银号,支付货款比较方便^①。据说,光绪年间包头开办的皮毛业商号有20多家,皮毛来源扩展到宁夏、肃州、青海、库伦等地。其中,广恒西店于光绪十九年开业,资本5800两,伙计30余人,开业三年即盈利5万多两,雇工扩大到100余人,很快成为皮毛业之首户^②。在雁门关碑刻中我们也见到该店的捐款。

山西祁县乔家开设的复盛公是包头的著名商号,乾隆年间乔家在包头经营粮油业起家,嘉道以降陆续开设了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以及其他复字号店铺,经营范围逐渐扩大。仅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在包头就有19个门面,伙计达四五百人之多。民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谚。^③

雁门关集资中来自西包头镇的捐款包括两部分:其一,《张家口布施碑》中西包头的捐款,计有208家商号,共捐银684两;其二,宣统二年季秋月残碑中所镌西包头镇的捐款,计有135家商号,共捐银185.9两,捐钱6.3千;二者合计,该镇共有340余家商号参与集资,共捐银869.9两,钱6.3千。其中可区分出行业者,如大德恒是祁县乔家开设的票号,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号则以经营粮油、杂货为主;广恒西店是皮毛字号,如月号是货店,永和成、兴隆昌是曲沃的烟号,等等。

5.5.2 河曲

河曲属保德州,位于山西西北部的晋、陕交界处,西、北濒临黄河,与陕西隔河相望。黄河由北环西向南流经县境长达74公里,且蜿蜒曲折,河曲故而得名。在清代发展成为晋西北“水旱码头”。曾有诗以:“一年山水流莺啭,百货云集瘦马驼。”^④来称赞当时河曲商贾云集的繁盛景象。

清代,河曲县城城周9里8步,有东、西、南三座城门,为山西境内黄河

^①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志·商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③ 刘静山:《山西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载《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④ 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曲县志·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上的一个重要码头。由河曲输出货物,以烟草、石炭(煤)等为主。河曲所在的保德州,在乾隆时就盛产烟草,“凡河边淤土,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习俗惟利是趋,而不以五谷为本计也。”^⑩烟草利润大于粮食,因此当地居民纷纷种植,而所产烟草除一部分用于本地消费外,大都转销外地。

河曲产煤,“炭窑最多”^⑪,因“价不昂,而利甚溥,”故“日用所需,莫便于此。”^⑫因此,河曲民人部分以开采和贩运煤炭为生。“近河者水运有舟楫”^⑬运往蒙地贩卖。

河曲输入的货物主要是盐斤、胡麻油和稻米。盐斤分由蒙古和陕西两地运至,“河曲界连蒙古,民间皆食蒙古盐,河东池盐不能到也。”^⑭此处蒙古盐为阿拉善盐,由距河曲290里的托克托城之河口村“水陆并运”而来^⑮,后“因蒙盐禁止水运,各土贩有用驴驮。从托而托城之河口村,零星买回在市售卖。”^⑯因此,蒙盐价昂。而“州境与陕西府谷县相隔一河,陕省沿边各州县均食鄂尔多斯盐斤,州属民人因阿拉善盐价贵,间有赴府谷县集场采买”^⑰,由于鄂尔多斯盐斤价格较低,因此“贩运回州出售者,其盐随买随卖,并无积存。嗣故市集盐斤并不短缺。故蒙盐不至,尚有鄂尔多斯之盐可以源源接济。”^⑱

“晋北惟胡麻油其用最溥,”而“胡麻产口外”,每年秋季收割以后,“载以船筏,顺流而下,”运至山西境内黄河沿岸的河曲等地,河曲当地农民从事胡麻油生产和销售的人很多,他们“以牛口大石磨碎,蒸煮榨取其汁为油。”^⑲将剩余油渣用以饲牛或肥田。所产之油贩卖至晋北的广大地区。河曲不产稻,当地居民“以稷、豆、麦为恒食,稻自甘肃、宁夏舟运而来”¹¹。

5.5.3 碛口

碛口镇,属汾州府临县,地处晋西北吕梁山西麓,面向黄河,背靠卧虎山,

^⑩ (清)陆耀《烟谱》,《昭代丛书》卷四十六,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⑪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民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⑫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⑬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⑭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⑮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⑯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⑰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⑱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¹¹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食货》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位于黄河与湫河交汇处，与陕西境内水路码头吴堡隔河相望，清初由永宁州与临县各管其半，于“咸丰初，汾州府通判移驻碛口，设三府衙门，又设厘税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复设临县巡检。”^①

碛口位于黄河与湫水河相交汇的大同碛的上游。黄河主河道流经碛口镇脚下，形成平水期水面宽 350—500 米，是可以停泊 200—300 艘的天然码头。有两条主要商道将碛口镇的货物外运：一顺湫水河北上，经候台镇、樊家沟、翻吴老婆山。经离石到吴城，再经由吴城转往晋中各地；一渡湫水河，南下麒麟滩，沿黄河滩下孟门，至军渡，赴晋南、河南各地。^②良好的水陆运输条件下，碛口成为山西境内黄河上一处重要的水陆码头，

碛口镇主要由三条商业街，13 道小巷构成，小镇依山就势，院院层叠。乾隆年间，碛口镇已很繁荣。“碛口之名已古，而碛口镇之名则自清乾嘉间始著”^③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黑龙庙碑》记载：“碛口镇又境接秦晋，地邻河干，为商旅往来舟楫上下之要津也。……人烟辐辏，货物山积。”^④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碛口有坐商 60 余家，客商数百。民国五年至民国八年，碛口黑龙庙进行了大规模的落架重修。其碑碣记载，本镇施银商号有 351 家，另有汾州、祁县、孝义、交城、平遥、文水、介休、临县以及绥德、西包头、河口、河曲、保德、府谷、下三交、柳林等地商号 271 家参与集资。其时，碛口城内有坐商 360 余家，日渡船只 50 多艘，装卸货物不下百万斤。有搬运工人 2 000 余人，日过驮货牲畜 3 000 余头。全年营业额在 50 万元（银元）以上者有 10 余家，每年货船不下 4 000 余艘。有油店、花店、分金炉、银匠铺、染坊、磨房、当铺、皮毛店、盐碱店、饭铺等多种行业。^⑤可见当时碛口繁荣景象。

碛口镇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晋省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表 5-9 为清末民初碛口主要转运货物。

^① 胡宗虞修，吴命新纂：民国《临县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② 阎刚平：《碛口——黄河古码头，晋商西大门》，载《文史月刊》，2005 年第 7 期。

^③ 胡宗虞修，吴命新纂：民国《临县志》，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④ 引自高春平：《明清以来山西碛口镇的商业兴衰》，载张正明等主编：《中国晋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77 页。

^⑤ 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大典》卷二，《地市概览》之第九编《吕梁地区·临县》，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版。

表 5-9 碛口转运货物的种类

	来货	去货
东路	豫布、洋布、晋南棉花、熟铁货	皮、毛、碱、粉条、粉皮
西路	皮、毛、碱	布匹、棉花、生铁货、瓷器
南路	无货	小米、豆、麦
北路	油、盐、碱、杂粮	无货

资料来源：据民国 15 年（1926）9 月，由山西教育厅编辑处编辑的初级小学补习科用《商业课本》第一册第 28 课《碛口》^①统计。

表中东路来货，包括河南生产之棉布，即“豫布”，舶来之洋布、晋南产之棉花。熟铁货应来自清代盛产铁货的晋东南潞泽地区。西路来货，应指由黄河对岸的陕西地区运至碛口的商品货物，包括皮、毛和碱。碱来自陕西者，应为鄂尔多斯盐“陕省沿边各州县均食鄂尔多斯盐斤”^②。皮、毛产地应该在蒙古，经陕西运至碛口。北路来货，应为顺黄河由北而来的蒙古货物。包括油、盐、碱和杂粮。油者，应为晋北地区普遍食用的胡麻油和照明用油，种植于口外，加工于河曲^③，运销汾州等地。为碛口转运货物的大宗，有“碛口街里尽是油，油篓垒成七层楼，骡马骆驼驮不尽，三天不运满街流。”“碛口三天不发油，汾州城里黑黝黝”^④的民谚。盐和碱应为阿拉善所产，由上游托克托城之河口村上船，经河曲，至碛口。杂粮则产自晋北地区或蒙古境内。

布匹、棉花、铁货及瓷器等商品经西路入陕，再北上运至蒙古。皮、毛、碱等商品则向东经陆路运至晋中等地。

5.5.4 永济

永济，是蒲州府治之所在，位于晋省最南端，东临解州，西濒黄河，为晋陕交通要冲，与陕西隔河相邻，距京师 2 200 里。^⑤由于地狭人众，自古崇尚商贾。“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菑者，百室不能一焉。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十而九，商之利倍于农”^⑥。“为秦晋要扼，西控潼关，俯临黄河，重镇也。”^⑦

永济城周 8 里 349 步，有四座城门，东曰迎熙、南曰首阳、西曰蒲津、北

^① 转引自阎刚平：《碛口——黄河古码头，晋商西大门》，载《文史月刊》，2005 年第 7 期。

^②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③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④ 转引自阎刚平：《碛口——黄河古码头，晋商西大门》，载《文史月刊》，2005 年第 7 期。

^⑤ （清）周景桂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田赋》，卷五，清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⑥ （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

^⑦ （清）李燧：《晋游日记》，卷一，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

曰振威。^①顺治八年(1651),因城内居民寥落,县令曾“招商贾聚货”于“鼓楼下集”而使之成为“一郡辐辏”^②。清代中叶以来,永济城内市集频繁,商业繁华,“大市旧在东关……南北牛站巷,东西皆肆店交易者,朝往暮归日率为常。”^③

永济位于黄河东岸,城外的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黄河最繁忙的渡口之一。由于“陕西惟邠州之长武,及凤翔之一州七县领河东盐引而食花马池盐,余则皆仰给于河东也。”^④潞盐由此入陕。此外,蒲州丰富物产,也多由此转运陕西。

此外,位于解州东南部平陆县的茅津渡,也因潞盐南运而发展起来。“平陆县之茅津渡与河南陕川之会兴头地方两岸相对,为晋豫通津”^⑤，“地当水陆之冲，值八省通衢。自虞版以下，依山凿径，绵延百余里，扼关陕咽喉，由晋入豫者道所必经。故皇华冠盖之络绎仕宦，商旅之辐辏，纷至沓来，不胜纪计，而三晋鹵商辇运盐斤，尤当孔道。”^⑥从而使茅津“市里鳞次，商贾云集，……称一邑巨镇。”^⑦

小结

从以上对山西城市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山西城市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第一，城市商业繁荣，人口众多。运城“商民辐辏，烟火万家”^⑧；绛州“市厘辐辏，商贾云集”^⑨；杀虎口“商贾络绎”^⑩；归化城“商贾云集，诸货流通”¹¹；大同城内商贾云集，“邑之懋迁者太原、忻州之人固多，而邑民之为商者亦不少”¹²；河曲“百货云集”¹³；碛口“人烟辐辏，货物山积。”¹⁴。

① (清)李荣和、刘钟麟修，张元懋纂：光绪《永济县志·城池》，卷二，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② (清)李荣和、刘钟麟修，张元懋纂：光绪《永济县志·市集》，卷一，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③ (清)李荣和、刘钟麟修，张元懋纂：光绪《永济县志·市集》，卷一，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④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滋纂：乾隆《解州安邑运城志·疆域》，卷一，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页。

⑥ (清)刘鸿达修，沈承恩纂：光绪《平陆县续志·艺文》，卷下，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⑦ (清)刘鸿达修，沈承恩纂：光绪《平陆县续志·艺文》，卷下，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⑧ (清)蒋兆奎：《河东盐法志·运城》，卷八，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⑨ (清)李燧：《晋游日记》，卷一，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⑩ (清)刘铭传撰：雍正《朔平府志·赋役·税课》，卷七，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11 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12 (清)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13 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曲县志·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 引自高春平：《明清以来山西碛口镇的商业兴衰》，载张正明等主编：《中国晋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第二，各个经济小区内均形成了一批特征相似的城市。在每一个经济小区内均有一系列、特征相似的城市迅速成长起来，例如晋中区，平遥、祁县、太谷是山西票号总号聚集地，其金融特征明显；晋南区，运城、解州、绛州是围绕河东池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晋东南区，长治、凤台、阳城是以冶铁业和铁器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晋北区，杀虎口、归化城、大同、丰镇则是由于中蒙贸易而发展和繁荣的城市；黄河沿线西包头、河曲、碛口、永济是以黄河航运业为主的城市。

第三，出现核心城市。如运城“为巡盐治所，牢盆聚集，商贾辐辏，往来者莫不道经于其地。”^①同时，“运治物产盐，为大合两池所出，以供三省所需，美利溥矣，余与解安大略相同。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几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②从而使运城吸纳了更多的资金和劳动力，使得运城“五方杂处，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至安邑缙绅运城居半。……是亦晋省一都会也”^③。而运城所在安邑县之安邑城“渐形零落，仅成为县政中心，商肆居民不是增益，游观者或消为荒堡”^④。

第四，城市数量增加。除府治、县治外，由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一些小城镇，逐渐发育成为工商业繁华的商业城市，如西包头镇、碛口镇、丰镇等均在此列。

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经济活动集聚体，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城市从而成为各个经济小区中经济发展最快的点。清代山西城市发展的特点表明，城市集聚特征明显。

^① 张毓桐修，王攀桂纂：民国《安邑县志续编·文选下》，卷十五，民国三十五年（1946）抄本。

^②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澐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③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澐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风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④ 赵祖朴、周毓瑄修，景定成纂：民国《安邑县志·城邑考》，卷二，民国二十三年（1934）修，稿本。

第六章 清代山西的农村集市

第一节 农村集市的发展

集市是人们约定俗成进行定期交易的场所。明代后期,山西各地程度不同地为疏密不等的集市网络所覆盖。清代,集市贸易已经成为山西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省治太原周围有许多集市,其中阳曲县城内有城西米市集、上北关集,四乡则有:阳曲镇集在城北 30 里、青龙镇集在城北 50 里、黄土寨集在城东北 60 里、东黄水集在城东北 80 里、大孟镇集在城东北 90 里、阳兴镇集在城东北 130 里、东社村集在城西 15 里、河口村集在城西 80 里、向阳镇集在城西北 30 里、西高庄集在城西北 40 里、泥屯镇集在城西北 55 里、官头村集在城西北 90 里、大川都集在城西北 90 里逢子坡、岔上村集在城西北 100 里、小店镇集在城西北 120 里等,共有 17 处。^①蒲州府城内“大市在东关,急递铺南,北牛站巷,东西皆列肆店,交易者朝往暮归,日率为常。……鼓楼下新集,每月六次”^②。蒲州府城外“东丰镇集在州东三十里,考老镇集在州东北三十里,东张镇集在州北五十里,大阳屯集在州南五十里,焦卢屯集在州南五十里,小李屯集在州南八十里,永乐镇集在州南一百一十里。”^③运城“四关各十日轮转”^④。

山西集市以每旬开市二至三次最为普遍,集期大都以一六、五十、二七、四九、三六九相搭配。如乾隆年间,隰州共有 9 个集市:康城镇集以一六为期;水头集和大麦郊集以五十为集期;石口集以四九为集期。^⑤乾隆年间,汾州府介休县境较大市集有“东关月十五市,张兰镇月十五市,郝家堡月十五市,湛泉镇月十五市,孔家堡月十五市,义棠镇月十五市。”^⑥

每旬开市三、四次或更多者间亦有之。清初,浮山县城四门均有集市,按季轮换。雍正年间,县城集市设在东西两街,每月农历三、六、九日为集日。^⑦

^① (清)李培谦,阎士驥等:道光《阳曲县志·户口》卷七,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葛英纂刻本。

^② (清)侯康民修,贾滂纂:康熙《蒲州志·市集》,卷二,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

^③ (清)侯康民修,贾滂纂:康熙《蒲州志·市集》,卷二,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

^④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璠等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⑤ (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市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⑥ (清)王谋文纂修:乾隆《介休县志·堡寨·市集》卷一,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⑦ 浮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浮山县志·集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解州安邑运城城内的集场为四关轮集^①。运城集场在城内东西北三关十日一轮^②。临县“城内每逢单日则集，由四坊递轮。逢一在东关，逢三在下市楼，逢五在贤良坊，逢七在文庙西，逢九在东门。”^③光绪年间，潞安府长治县境内有多处集市，有荫城、西火、韩店、苏店、八义等 15 处集市。“城内以二、四、六、八、十日市；鲍店镇、石哲镇、大堡头村、张店村、南漳村、东里村、南席村俱以一、三、五、七、九日市；璩村镇以三、六、九日市；南呈镇、郭村以二、五、八日市；布村以一、四、七日市”^④。平定府盂县在清末，全县有城关、上社、西烟、牛村四大集镇设固定集日。城关双日为集，其它镇有单、双集日之分，每月集日最多六次。^⑤大同府灵邱县城东“凡贸易工作悉居之，士民亦杂处焉，双日为集，……集初设关厢内，近数载贸易颇伙往来拥挤，市民咸以市集起色。”^⑥

平定府寿阳县境内市集也非常频繁，见表 6-1：

表 6-1

地点	位置	时间
县城	城内	一三五七九日集
张净镇	县正东三十里	二六日集
羊头崖镇	县正南三十五里	一四八日集
北河镇	县西南五十里	三六十日集
西落镇	县西南八十里	二五九日集
遂城镇	县西南七十里	(按今无集)
太安驿镇	县西南五十里	四九日集
胡家堙镇	县正西八十里	一六日集
段王镇	县正西四十里	三八日集
上峪镇	县正西三十里	四九日集
南燕竹镇	县正西二十五里	三八日集
平头镇	县西北六十里	五十日集
宗艾镇	县西北二十里	二六日集
解愁镇	县正北四十里	四八日集

资料来源：(清)马家鼎、白昶修，张嘉言、祁世长纂：光绪《寿阳县志·舆地志·形势》，卷一，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①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濫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②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濫等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③ (清)杨飞熊修，崔鹤龄、李思豫纂：康熙《临县志·集市》，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

^④ (清)李桢、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建置·市集》，卷三，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⑤ 孟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孟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⑥ (清)宋起凤原本，岳宏碧增订：康熙《灵邱县志》，卷四，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集市所贸易的商品种类多样,如太原府榆次县农耕所用之牛马,家禽等多在集市上“买之旁县”,而县内民人善于用柳条编织器具和苇席,或种植时令瓜果,亦多在集市上交易,从而“岁资之为利,以供衣食租赋”^①。解州集市和店铺的商品也较为丰富,“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玫瑰罗列,见于无物不有”^②。大同府灵邱县城内集市贸易商品包括“肩蔬负薪粟粮布匹之类”^③。保德州州市在城中,“仅粟米粟”,主要交易粮食,而城外“东沟集,每逢二七贸易杂货”^④。

一些城市的集市还订立了具体的规则。乾隆年间,运城御使杨绳武,为了杜绝欺行霸市行为特立约法八条,比如粮食到市,每石止许牙用一升;斗户不许调鬼语,欺哄乡愚;客贩任赴行家,不许斗户远接;斗遵官较,禁置副斗及剗削口底,并用鸡子木刮;杂米先尽穷民;斗止许正身,不许朋伙窝案;生员、衙役、宦仆不许揽充斗户,市棍不许插身把持;集场务于东西北三关十日一轮,摆到通衢,不许隐藏场院之内,等等^⑤。

行龙先生通过对清代至民国各州县所修地方志的查阅和整理,对这一时段内山西 36 个州县的农村集市的数量分布及变迁进行了研究^⑥,笔者稍作改动,制表如下:

表 6-2 清代与民国山西若干州县集市数变化表

	府州	县份	清前期	清中叶	清后期	民国
晋中 区	太原府	祁县	7	5	8	—
		文水县	5	—	14	—
	汾州府	介休县	6	2	—	2
		平遥县	8	—	8	—
		汾阳县	—	12	12	—
		临县	22	—	—	11
	平定府	平定	—	7	9	—
		寿阳县	—	15	14	—
		盂县	—	14	—	—

① (清)俞世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风俗》,卷七,清同治二年(1863)风鸣书院刻本。

②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③ (清)宋起凤原本,岳宏鼎增订:康熙《灵邱县志》,卷四,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④ (清)王克昌修,殷梦高纂:康熙《保德州志·市集》卷一,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⑤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澹等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三,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⑥ 参看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变迁》,《中国经济师研究》,2004年第2期。

续表:

晋西南区	平阳府	吉州	1	—	—	—
		太平县	—	7	7	—
		襄陵县	3	—	5	—
		浮山县	2	2	—	—
		曲沃县	10	9	9	9
	蒲州府	荣河县	4	11	11	—
		猗氏县	3	—	3	—
		万泉县	—	2	—	13
	霍州	灵石县	—	10	—	11
	隰州	蒲县	—	5	5	—
绛州	绛县	6	—	4	—	
晋东南区	潞安府	长治县	—	19	18	—
		长子县	—	12	12	—
		屯留县	4	—	9	—
		襄垣县	—	6	—	7
		潞城县	5	—	—	—
	泽州府	高平县	11	—	11	—
		陵川县	9	—	4	—
	辽州	辽州	9	—	9	—
	沁州	沁源县	6	—	4	—
		武乡县	—	11	—	12
晋北区	大同府	广灵县	1	1	1	—
	忻州	定襄县	5	—	—	—
	代州	五台县	—	4	4	—
		繁峙县	—	3	3	—
	保德州	保德	2	—	2	—
		河曲县	0	—	3	—

注: 由于城内不论有几次集市, 其地点只有一个, 即城内, 故将所有城内集市数看作 1。

表 6-3 清代与民国山西 16 州县集市场次数变化表

县份	清前期	清中叶	清后期	民国
介休县	6	21	—	39
屯留县	48	—	129	—
荣河县	78	—	—	48
太平县	—	56	36	—
汾阳县	—	120	120	—
平定	—	60	72	—

续表:

祁县	105	—	120	—
猗氏县	21	—	21	—
灵石县	—	111	—	117
长子县	—	156	156	—
襄垣县	—	84	—	99
高平县	178	—	178	—
武乡县	—	108	—	117
广灵县	9	9	9	—
五台县	—	39	39	—
繁峙县	—	45	45	—

从表 6-2 可以看出,在 36 个州县中,除太原府文水县、蒲州府荣河县和万泉县、潞安府屯留县的集市数有较明显增加;汾州府临县、泽州府陵川县的集市数有明显减少外。其余州县则变化不大。

从表 6-3 可见,在可资比较的 16 州县中只有汾州府介休县、潞安府屯留县的开市场次有较大增长;蒲州府荣河县、平阳府太平县的集市场次减少幅度较大。其余州县集市场次数变化不明显,甚至完全没有变化。

集市崛起归根结底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没有农村经济的振兴,也就没有乡村中集市的勃兴。只有当农村经济实力增强,剩余农产品增多时,才有足够的交易量来维持一个集市的存在和延续,新集市的产生需要同样的物质前提。

蒲州府万泉县,乾隆《万泉县志》载:“解店镇……清康熙元年知县郑章倡建店舍兴起市集”^①,此时村镇集市当仅此 1 处,至民国年间《万泉县志》载,村镇集市有 12 处,^②在新增集市中,9 处每旬开集仅 1 次,余者每旬开集 2 次。行龙先生认为,民国时期万泉县的集市既可以看作开集稀疏的集市,亦可视为举会频繁的庙会,它们是集市与庙会合二为一的结果。清代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山西庙会大量增加,因此万泉集市数量变化是在其集会合一的特殊情形下对全省庙会发展共同趋向的间接反映,其中并不包含来自经济实力方面的意蕴。蒲州府荣河县的集市由清前期的 4 处,增加到清中期和清后期的 11 处;而集市场次则由清前期的 78 次,减少为民国时期的 48 次。然而康熙荣河县志明确记

^① (清)毕宿燕修,张史笔纂:乾隆《万泉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

^② 何炎、程瑶楷修,冯文瑞、王景命纂:民国《万泉县志·集会》,民国七年(1918)石印本。

有冯村市、西李市、程村市、王显市俱废。这显然是明末战乱的遗痕,意味着在此之前荣河村镇集至少一度曾达7处之多,拿它再与乾隆年间10处比较,增幅实际并不算大。^①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从1 643.3万减少至1 065.8万,可能也是一些县份集市数量的明显减少的直接原因。泽州府陵川县清前期城镇集市共9处,清末减少为4处。平阳府太平县在清中期集市场次较密,为56次,然而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使当地人口和农业生产均受到严重打击,集市场次迅速减少,清末为36次,较清中期减少36%。

从总体上来看,山西多数县份的集市数和和场次数在整个清代变化不大。表6-2中所列36个州县中,有将近80%的州县集市数量长期停顿。全省集市数量增减相抵,在总体停滞的基础上微微有所上升。^②

第二节 庙会的发展

庙会,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庙会除祭神外,其另一主要功能是贸易。太原府榆次县五月城隍庙会,“届期资货云集四方,客商辐辏而至,发兑交易日余始罢”^③。太谷县“立春……二十一日汾河村民于庙祀神演剧,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④代州繁峙县城每年三月十八日有砂河香烟庙会,届时“远近士民各以鸡鸭羊只入庙酬神,是日商贾云集”^⑤。平阳府浮山县每逢庙会,“招集远近商贾贩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⑥。绛州庙会以古龙坡的“老君庙会”和“东华山娘娘庙会”名气和规模最大,每逢会期,陕、甘、豫、冀、鲁等省客商云集。^⑦

清代,山西很多州县都有庙会,少则一二处,多则十数处。太原府榆次县“正月于怀仁、二月于聂村东阳、三月郭家堡、四月王都村、五月于邑城隍庙中,七月源涡鸣谦驿,凡会则陈优伶合乐,其城隍庙则会场之尤大者。”^⑧平定州盂县,一年之中有33次庙会,会期长则5天,短则3天,全年至少有100日

^① 参见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参见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清)俞世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纪事》,卷四,清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

^④ (清)思浚、赵冠卿修,王效尊等纂:光绪《太谷县志·风俗》,卷三,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⑤ (清)吴其均纂修:道光《繁峙县志》,卷二,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⑥ (清)鹿学典等修,武克明等纂:光绪《浮山县志·风俗》,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⑦ 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绛县志·商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⑧ (清)钱之清修,张天泽纂:乾隆《榆次县志·风俗》,卷六,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之多。^⑩汾州府临县的城关、三交、碛口、招贤、南沟、兔坂、安家庄、从罗峪、白文等地有庙会。其中七月会最隆重，七月初一碛口会，继而三交、城关、白文、兔坂、刘家会相继进行，一直持续到月底。其次是正月会，正月十三碛口会，继而是三交、招贤、城关、白文。^⑪

平阳府浮山县“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东门外东岳庙逢会，七月十五日城隍庙逢会，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张公祠逢会，招集远近商贾贩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⑫。吉州城关、柏山寺、大庙沟等地有农历三月二十七、四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腊月十三等庙会^⑬。蒲州府猗氏县有庄武王庙会、城隍庙会、关王庙会、东关集、高头里会、等庙会^⑭。

潞安府长治县“岳鄂王庙会九月二十六日在南关，百货俱集，旬日而止；关帝庙会九月十三日在县北乡鲍店镇亦旬日而止；草坊会五月十三日在县北乡三日而止；尧庙会四月二十八日在县西南乡五日而止。”^⑮清嘉庆、道光年间最盛，全县年约百余次。^⑯辽州榆社县每年正月至十月间，月月有庙会。^⑰

大同府大同县庙会从正月初八的八仙日始，二月初三有帝君庙会、三月初三曹夫庙会、三月十八娘娘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四月十五鲁班庙会、五月十一城隍庙会、六月初六玉龙洞庙会、六月十三龙王庙会、六月十九观音庙会、五月十三和六月二十三关帝庙会、六月二十三火神庙会、七月十五龙池孟兰会、八月二十七文庙会。城郊沙岭、寺村、阳和坡等村春祈秋收也举行庙会。^⑱右玉县大寺庙庙会，农历四月初八；娘娘庙会，农历三月十八；雷公山慈云寺庙会，大南山显明寺庙会；牛心山庙会；封神台庙会；马莲滩村西六月六海子滩庙会。杀虎口从二月初八文昌庙会开始到十月十三东岳庙会，几乎每月有会。^⑲保德州河曲县庙会正月3次，二月2次，三月3次，四月4次，五月2次，七月3次，八月2次，十月1次，共计20次。会期以3日居多，共计60多日。¹¹

^⑩ 孟县志志编纂委员会编：《孟县志·商业》，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⑪ 临县志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县志·商业》，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年版。

^⑫ (清)鹿学典等修，武克明等纂：光绪《浮山县志·风俗》，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⑬ (清)吴葵之修，裴国苞纂：光绪《吉州志》，清光绪五年(1879)年版。

^⑭ (清)潘铎修，吴启元、高绍烈纂，宋之树续修，何世勳、陈简仪续纂：雍正《猗氏县志》，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修，清雍正七年(1729)续修刻本。

^⑮ (清)李桢、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建置·市集》，卷三，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⑯ 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垣曲县志·商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⑰ 胡德荣编：《榆社县志·商业》，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⑱ 大同地方志办公室编：《大同县志·商业》，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⑲ 右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右玉县志·商业》，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¹¹ 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曲县志·商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庙会所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以日用百货、牲畜、农具为主。太原府太谷县的阳春会:“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坛,不可胜数。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大会矣。”^①汾州府介休县九月二十至二十九是张兰镇泰山庙庙会,届时平遥、沁源、霍县、孝义、汾阳等地商号和手工业作坊都前来参加,此外还有文水的皮货、浑源的挽具、沁州的麻货、上党的药材,内蒙古的骡马。^②解州庙会“商贾云集,百货具陈”^③。临县正月和七月庙会是以牛、马、驴、骡为主的庙会。七月初一碛口会以瓜果为主,十月初二是从罗峪粉羊会,上市粉羊可达数千只,汾阳等地客商前往购买。腊月十八为城庄公鸡会,上市公鸡可达数千只。六镇古会尤以三交会驰名晋陕,每年的骡马大会,陕西米脂、定边、关中、神木、榆林等地来的骡马驴数量可观;河南、河北、晋东南、洪赵等地前来购买牲畜者接踵磨肩。三交骡马大会时,周围十数里村庄都住满各地客人。^④平阳府浮山县庙会交易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百货、农具、瓜果、蔬菜、牲畜、金货、估衣、京广杂货、日用生活用品等^⑤。

并且许多庙会有其固定的主要交易产品。如大同府大同城内六月十三的龙王庙会,以布行为主;六月十九的观音庙会以银匠为主。^⑥宁武府神池县六月初六的八角镇庙会主要以交易牲畜为主。^⑦绛州闻喜县三月初三县城祖师庙庙会也以交易牲畜为主,称为骡马大会。^⑧

清代,山西有 4 大庙会,即:正月解州会、四月尧庙会、七月五台山会、九月鲍店会。其中长子县鲍店会,以商贾之繁盛、行业之众多、交易金额之巨大,在山西各庙会中首屈一指^⑨。鲍店,距长子县城北 40 华里,位于潞安府的长子、屯留二县中间,为晋、豫、秦交往的要道。鲍店会起自何时,已难稽考,但它的极盛时代是在清代中叶。会期从农历九月十三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历时 100 天,主要交易商品有牲畜、估衣、广货、京货、药材等。会期前半个月

①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76 页。

② 山西省介休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介休市志·商业》,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 年版。

③ (清)李燧:《晋游日记》,乾隆六十年四月初四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5 页。

④ 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县志·商业》,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年年版。

⑤ 浮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浮山县志·集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

⑥ 大同地方志办公室编:《大同县志·商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⑦ 神池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神池县志·商业》,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

⑧ 闻喜县志编纂委员会:《闻喜县志·商业》,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 年版。

⑨ 王家驹:《长子鲍店会》,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一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年版。

为牲畜会，以骡马、牛羊为主，还有骆驼、驴等牲畜，每年有十几万只羊，千余头骡驹上会交易。在骡马大会结束之后，庙会便逐渐以药材交易为主，故又叫药材大会。每逢会期，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藏、青海、太原、京师等地药商，纷纷赶着骡马队、骆驼队，前来进行药材交易。药材交易品种之多，成交额之大，十分惊人，与当时的河南禹县药会、河北安国药会齐名。在广、川、闽各省大部分药商中享有“山西鲍会”之誉。^①鲍店会的广货店以长治的万胜顺、万胜高和晋城的集全顺3家为最大，庙会棚址也供这3家优先挑选，广货店经营苏杭绸缎、广东铜器、北京丸药以及吸食鸦片用的太谷十样景烟灯、寿州烟斗、汉口的水烟袋和官绅们用的缎靴与戏剧道具、乐器等。绸缎庄有河北顺德府复盛程和武安天德恒两家，专售苏杭绸缎。会上有京货铺数十家，主要销售绸缎零块、各色梭布、皮金、珠边、丝线、回绒、手帕、脂粉、珠花、儿童鞋帽、玩具等。首饰楼也有十余家，经营各种银饰，此外，庙会上有多家估衣铺。^②

小结

清代，山西商人在全国商业金融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农副产品加工业、工矿业等商品生产的发展亦十分活跃和多样，这都为农村集市和庙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清代山西的集市发展并没有呈现“活跃”情形，没有出现“一个快速成长的极盛时期”。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如保德州的河曲县“近塞苦寒”^③；汾州府汾阳县“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汾阳尤最。人稠地狭，岁之所入，不过秣麦谷豆。”^④位于汾水冲积平原的绛州“绛古唐地，旧称土瘠民贫，迄今地狭土燥，民无可耕俯仰无所资”^⑤。甚至在“富甲天下”的晋中祁、太、平地区也是“土瘠民贫，俗尚勤俭”^⑥，平遥也是“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

^① 张小根：《鲍店药材会》，载《山西文史资料》第十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② 以上参看王家驹：《长子鲍店会》，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一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③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④ （清）周貽纘修，曹树穀纂：道光《汾阳县志》卷十，杂识。清道光三十年（1850）修，咸丰元年（1851）刻本。

^⑤ （清）张成德修，李友洙、张我观纂：乾隆《直隶绛州志》卷十七，艺文，马恕《绛民疾苦记略》。清乾隆三十年（1756）刻本。

^⑥ （清）郭溥修，周继芳纂：康熙《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清康熙四年（1665）刻本。

间终岁勤劳。”^①在这样一种维持生存的状态下，山西居民可以用以交换的农产品较少，相应集市数量就停留在较低程度

其二，天灾影响，“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急剧减少。山西地处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清同治十三年（1874）山西中部已经开始显旱，到光绪三年（1877）发展成全国大旱。旱情一直延续到光绪五年（1879）才有所缓解，但瘟疫、鼠患接踵而来，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当时，凤台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②；猗氏县“多者十损六、七，少亦十之三、四”^③；新绛县“村中户绝半，人十毙六、七”^④；太原县“民死于饿者十之六、七”^⑤。受灾最为严重的是临汾县，人口从 174 558 人减少到 73 716 人，即减少 58%。^⑥全省人口由受灾前的 16 433 000 减少至受灾后的 10 658 000，总计减少近 600 万。^⑦这些受灾最严重地区恰恰集中在当时山西商品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晋中、晋南及晋东南地区，大大破坏了当地的手工业生产，这无疑对整个山西省的集市发展予以巨大打击，延缓了山西集市的发展和数量的增长。

其三，庙会的替代作用。庙会是农村集市的一种，但它的交易者和交易商品来源更广泛，交易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会期间隔也 longer，多循季节更替而举办。由于庙会具有如上特点，故会上交易商品也更为丰富，如太原府太谷县阳春会，所交易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潞安府长子县鲍店会，交易的商品同样包罗万象，且数量巨大。随着农副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庙会因其举办周期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为一致的特点而规模扩大，数量急增，从而吸收了农民的大部分农闲产品，集市交易商品则相对匮乏，不能提供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物品。正如光绪《文水县志》记载：“境内无多商贾，平居一簋之微，无从购置，惟特有庙会，则四方齐集，百货杂陈，民间日用之需，耕获之具，皆取给焉”^⑧。

^①（清）王绶修，康乃心纂：康熙《重修平遥县志》，卷三，田赋志，物产。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

^②（清）张貽瑄修，郭雄恒等纂：光绪《凤台县志·纪事》，卷四，清光绪八年（1880）刻本。

^③（清）徐浩修，潘梦龙纂：光绪《续猗氏县志》，卷上，户口。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④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旧闻考》，卷十，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⑤（清）薛元钊修，王效尊纂：光绪《太原县志·祥异》，卷下，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⑥（清）潘如海、李荣和修，婁文藻、张榜花纂：民国郑裕孚增修：民国《临汾县志续编·户口》，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修，民国十年（1921）增修刻本。（清）曾国荃、张勋等修，王轩、杨笃等纂：光绪《山西通志·户口》，卷六五，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⑦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3页。

^⑧（清）范啟瑩、王炜修，阴步震纂：光绪《文水县志·市集》，卷三，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结 语

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境内以山地、丘陵等地形为主，平原仅占总面积的 19.7%，境内有黄河、汾河两大水系，东部太行山、西部吕梁山纵贯南北，中部由北而南分布有大同、忻定、太原、临汾、长治和运城等盆地，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散列其间。由此，山西境内划分为四个经济小区，即晋中区、晋南区、晋东南区和晋北区。

山西省境内山川起伏，北部地瘠民贫，唯有南部和中部分河沿岸土地稍沃。晋中、晋南两区是山西农业条件较好的区域，但人口稠密；晋北区地瘠天寒，农业生产条件尤差，人口较稀，但口外归绥六厅由于清初的垦殖而产粮较多，其余粮可以向晋中、晋南输送。总体上来说，清代山西地狭人众，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产出不足食用，是一个缺粮省份。同时，经济作物种植有相应的发展。

清代山西的工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工矿业两部分，农副产品加工业包括纺织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皮毛加工业、酿造业等行业，工矿业包括盐业、冶铁业、煤炭业等行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工矿业在清代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并且在烟草加工业、盐业、冶铁业等行业中显现出产业集聚的特点。

山西人在习俗和观念上重视商贾，促进了山西商人进行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的行商范围包括京津、直隶、山东、河南、两湖及东北、西南等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深入蒙古草原、俄罗斯腹地。具体从事的行业包括金融业、茶业、烟业、棉纺织业、铁货业、皮货业、粮食业、杂货业、运输业、餐饮业、牙行等。山西商人在长时间、广泛围的商贸活动中，聚集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他们将这些资本运回本乡本土，在山西本地形成资本集聚。

清代山西城市较之前代有较大的发展。并且各个经济小区的城市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晋中平遥、祁县、太谷是清代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是省内金融中心；晋南解州、运城、绛州均是由于河东盐业生产和运输而发展起来的晋南城市；晋东南潞安府和泽州府是明代以产绸、清代以产铁著称的生产型城市；晋北大同、归化城、杀虎口、丰镇均是由于对蒙贸易而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贸易城市。此外，黄河沿线的西包头镇、河曲、碛口镇和永济均是以航运业为主导产业的城镇。城市发展总体表现出繁荣、数量增多的特点，特别是在各个经济小区均出现一批特征相似的城市，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核心城市，这些均表明清代

山西境内城市集聚逐渐形成。

包括庙会在内的农村集市的发展是清代山西经济发展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满足当地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清代山西集市在数量和场次上均没有大的变化,集市交易商品种类也相对贫乏,其原因在于山西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后,自然灾害等原因。相比之下,庙会的发展迅速,在规模、商品数量、参与人数上均超过集市,对集市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清代山西境内经济的发展呈现了集聚化特点,出现了工矿业产业集聚,商业资本集聚,商业及金融业等新型产业的集聚,最后促进了城市集聚。城市集聚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繁荣;凸现了所在经济小区的经济特点;进一步加快了民人脱离土地、外出经商的步伐,从而带动境内产业进一步发展;引起民风、民俗的一些改变。发生在清代山西经济的“集聚效应”使山西成为富甲一方的省份,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社会分工的发展。

7.1 集聚机制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集聚是指资源、要素和各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和过程。它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集聚机制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惯性,能够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巨大的经济效应。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主要通过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和城市集聚实现。

产业集聚是指资金、设备、信息、技术和劳动力向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聚合。严格意义上讲,资本集聚包括在产业集聚内,它是企业扩展自身实力的基础,资本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商业活动的交易量及其扩展能力。人口集聚是指人口由分散的广域空间向相对狭小的空间密集的过程。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经济活动的集聚体,工业、交通运输业、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个特殊的经济区域中。但是由于集聚和扩散都是相对而言的,当一个中心城市向周围的腹地产生扩散效应时,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也是其他周围城市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集聚的过程,即城市的集聚。

产业的集聚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定地域的产业集聚将吸收区域要素向特定地域流动、集聚,在整个区域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在区域主导产业不断集聚的推动下,区域的增长中心和发展中心逐渐形成,从而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强大拉动力。同时产业的集聚在边际报酬递减规

律的作用下，会促成集聚地的要素向周围地区转移，辐射整个区域，使区域资源在流动中实现再配置，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扩散效应。一定数量的人口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为消费提供了市场。因此人口集聚是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的基础。城市的形成虽然必须以稠密的人口和商业与贸易等产业的发达为条件，城市的集聚必须以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为基础，但是城市的集聚也可以反作用于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一个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集聚性越强，对周围地区的产业和人口的向心力越强。一般地，城市的规模越大，则城市的功能越完善，交通运输网络更健全，为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提供的外部环境更好，则相关的产业更愿意集中到城市中，更多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也愿意随之流动到或移民到该城市中，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

基于前面数章对清代山西经济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用集聚机制对清代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集聚特点进行讨论。

清代山西人口繁庶，相对于狭小的生存空间和耕地面积来说，自然而然地在省内形成集聚，从而为产业集聚提供了前提条件。加上省内丰富的盐、铁、煤炭资源，从而在盐业、冶铁业和烟草加工业等工业领域出现产业集聚现象。同时，由于省内自然条件的限止和工矿业的发展等因素，山西商人懋迁省外，带回大量商业资本，在省境形成了资本集聚。而商人将集聚的资本大量投向土地和金融业，其结果是进一步促进了人口集聚和新兴产业的集聚。以下我们以山西商人的资本流向作为切入点来进行讨论。

山西商人的资本流向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具体而言即商业、金融业、近代产业和奢侈品。这里我们只对其投入到生产部门的资本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故不对其奢侈品消费进行讨论。此外，由于投资近代产业也不是山西商人中的普遍现象，故在此不作讨论。

山西商人的一部分资本继续投向商业领域，在省内和省外均引起山西所属商业企业的集聚。以茶业为例：咸丰、同治年间，太原府祁县有长裕川、巨贞川、永聚祥、大玉川、裕盛泉、德逢源、大德诚、巨盛川、大德川、宝聚川、长源川、宏源川、通川盛、福廉泰、大德兴等茶庄近 20 家。大者资本 10 万两（长裕川、大玉川），小者 2 万两。^①光绪七年（1881）在湖北汉口的山西太原、

^① 吕洛青：《祁县茶庄初探》，《祁县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 年版，第 44 页。

汾州两府的茶商共有 38 家。计太原、汾州两府红茶帮 15 家为：大德玉、裕庆成、宝聚公、大升玉、天顺长、祥发永、大泉玉、乾泰魁、兴泰魁、独慎玉、达顺成、久成庆、大昌玉、兴隆茂、广和兴。太原府盒茶帮 23 家为：庆丰元、长顺川、长裕川、翁盛泉、隆盛元、乾裕魁、大道恒、天聚和、协成泉、祥泰厚、复泰谦、大德昌、德巨生、长盛川、兴隆茂、义泉贞、大德兴、聚盛泉、巨贞和、大涌玉、裕盛川、义生合、谦泰兴。^①山西茶商在恰克图的商号有奚德察、王宗乔、达兴友、尤庆源、宋义成、达泉友、郭发成、德兴义、于护国、于兴龙、席绍胡、梅有德、梅有康、修发成、尤颂乔、乔发成、哈秋有阿、桑友康、恒宋成、王胡成、郝隆乔、纳盛胡、达盛永、义合美、兴友号、桑友成、恒兴德、哈盛察、郭胡兴、郭宋隆、郭隆国、董宗永等 33 家。^②

再如归化城内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的资本计两千万两，约合四千万银卢布。每年向呼和浩特输送的羊为八万至十万只；元盛德商号，年贸易额 800 万两，有驼 900 峰往来于归化和乌里雅苏台；天义德商号，年贸易额 700 万两，有驼 900 峰，除此三大路商号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规模较小的商号，其年贸易额多则 500—600 万两，少则 10—25 万两，自养骆驼 150—200 峰。^③

平遥城内的货栈旅店业繁盛，嘉庆十八年（1813），平遥城内的著名栈店有：恒升店、天裕店、光裕店、三元店、合兴店、忠义店、长盛店、义顺店、世隆店、合隆店、元丰店、长泰店、升元店、兴盛店、泰来店、协盛店、晋源店、全兴店、义和店、集义店、祥泰店、信诚店、大悦店、万亿店、通盛店、永顺店、德顺店、万盛店、逢源店、益天店、天锡店、涌聚店、协泰店、天兴店、协信店、复信店、裕隆店、晋太店、太和店、恒义店、广大店、悦来店、亨通店、正和店、通源店、复义店、允成店、永盛店、万亨店、泰和店、方至店、天盛店、丰盛店、天成店、谦德店等 55 家。^④

此外，山西商人所从事的棉布业、杂货业、皮毛业、运输业、粮食业等行业，在省内及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纷纷建立会馆^⑤。山西商人所经营的各个行业均呈集聚态势。上述行业的集聚属于商业产业集聚，

^① 《汉口山陕会馆志》，卷下，转引自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2 页。

^② 渠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上册，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年版，第 64—65 页。

^③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第六章，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41 页。

^④ 杜拉柱：《平遥古城志》，中华书局，2002 年版。

^⑤ 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三节内容。

商业产业集聚不仅为山西商人带来更多的商业资本，同时吸纳更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些领域，从而为城市集聚创造前提。

山西商人资本的另一大流向是投资金融业。商业资本大量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①山西商人，清代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异地放贷，在北方各省市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直隶各州县“多系山西富户挟货而来，囤积米石，放债盘利”^②。在山东“晋省等处富商大贾，越境放债、贱价准折”^③，其经营深入城乡各地，如曹州府曹县“商贾辐辏，城内及东关，城外若西北之魏湾、西北之桃源、东南之青甸，南方之大义及监堤之望鲁集、刘家口，皆有山西商人开设典当、钱庄、均生意茂盛”^④。在京师，山西商人更是盛及一时，如山西灵石县杨氏，以豪富名，在京师开设当铺七十余所，京中人呼之为当杨”^⑤。自乾嘉以来“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⑥。在临清，合城仅典当十六七家，皆西人^⑦。河南各州县盐、当各业多为晋商，密县“操奇赢网市利者，皆外来之人，大者盐、当二商”^⑧。孟津县，本地商人“无厚资居赢者，盐当各商多晋人”。^⑨晋商足迹，除北方外，也达到了南方，如山西富人钱青，出白镪数万与汪孚，使往杭州放债，取称贷之息，汪挟重货，化富相，居会馆，一时娑人子乞假于门者络绎不绝^⑩。在湖北安陆，也有山西汾州人“贾义士”在此放债。¹¹另外《俗话倾谈》载：“山西当商，多在江南金陵大城放官账”¹²。因此，有“西客利债，滚剥遍天下”的说法。¹³高利贷资本继续为山西商人创造财富的同时，促进了金融业的集聚，特别是票号产生之后，这种集聚尤显突出。

①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1944年版。

② (清)黄可润纂修：乾隆《无极县志·卷末·附录》，清乾隆十三年(1747)修，二十二年(1757)刻本。

③ 《孔府档案史料选》第三编，第六册，“公府田产”(上)第41页。转引自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④ (清)陈嗣良修，孟广来、贾延纂：光绪《曹县乡土志·商务》，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⑤ (清)王韬：《遁窟谰言·江楚香》卷一。

⑥ (清)李燧：《晋游日记》，乾隆六十年闰二月二十一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⑦ (清)王俊修，李森纂：乾隆《临清州志》，卷十一，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⑧ (清)景纶修，谢增纂：嘉庆《密县志·风土》，卷十一，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

⑨ 赵擢彤修，宋绪纂：嘉庆《孟津县志·风俗》，卷四，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⑩ (清)破额山人：《夜航船·汾州客》，卷五。

11 (清)朱翊清：《埋忧集·贾义士》，卷七。

12 (清)邵彬儒：《俗话倾谈》，转引自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3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闸河日记》，卷六。转引自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道光初年日升昌票号创办,随后候姓富商将其麾下五家绸缎庄和细布庄纷纷改组成为票号。票号将存款、放款与汇兑相结合,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款项,进行放款生息,收入甚丰,除汇费收入和压平差色收入外,还有存放利差收入。巨额的利润吸引了一大批山西商人投资票号,使其发展迅速。从道光初年至清末,共有40多家票号先后创办,其分号拓展到全国的许多通商大埠,以至“今山西钱贾……散步各省,汇票出入,处处可通”^①,而票号总号则集中设在晋中地区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城。大量票号在地域上的集中,带来资本和人才的集中:光绪年间,平、祁、太三帮票号综合资本为529万两白银^②。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万两^③,其总利润为60.17万两白银。^④此外,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蔚泰厚毛鸿翎,以及各大票号的大掌柜都集中在平遥、祁县、太谷三城。资本和人力资源的集中带来票号业这一新兴金融业的产业集聚。山西商人将其集聚的资本投资在金融业上,促进了票号业作为新兴金融业的发展,而统一区域内众多票号在企业数量和资本实力上的迅速增长,形成了金融业的产业集聚。

商业、金融业、以及前面论述的工矿业等产业的集聚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平遥县城“市肆纵横,街衢皆黑壤,有类京师,盖人烟稠密之故”^⑤。太谷城内“商贾辐辏,甲于晋阳”^⑥。介休县“城内烟火万家,商贾宾客之所至,云迹辐辏”,“入其市门,俨如都会。”^⑦其张兰镇原先只是一个小村镇,乾隆嘉庆年间成为“屋舍鳞次,不下万家,盖藏者十之三商贾,复四方辐辏,俨如大邑”。^⑧地处解池边的运城,随着潞盐生产和销售而繁盛,城内九坊四街,烟火万家,成为“群商所处,诸路所通,百物所聚,商旅辐辏,卖贩云集”^⑨的晋南商城。河津县“商贾盈途,渐趋繁华”^⑩。旅蒙要冲——杀虎口“商贾农工,趋负贸易,

^① (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十一,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② 参见本文第四章第三节内容。

^③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474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页。

^⑤ (清)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⑥ (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序》,卷一,清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⑦ (清)徐品山、陆元德修,熊兆占等纂,嘉庆《介休县志·疆域》,卷一,嘉庆《介休县志·艺文》,卷十三,祝德全《续修县城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⑧ (清)徐品山、陆元德修,熊兆占等纂,嘉庆《介休县志·艺文》,卷十二,刘尔聪《修张兰城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

^⑨ (清)石麟、朱一凤等:《河东盐法志·艺文》,卷十一,雍正五年(1727)刻本。

^⑩ (清)茅丕熙、杨汉章修,程象灏、韩秉钧纂:光绪《河津县志·风俗》,卷二,清光绪六年(1880)

内地民人难以数计”^①。归化城亦由于诸货流通，而成为蒙古地区的贸易中心，商业枢纽城镇。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原先只是军事重镇，随着运输业和城内零售、批发业务的增多，逐渐发展成为“繁华富庶，不下江南”^②的商业城市等等。前以述及，不再赘述。

山西城市的发展繁荣，在地域上形成具有相似特点的城市的聚集，以晋中平遥、祁县、太谷三座金融业城市的形成为例，上述三城在票号创立之前，由于地处通衢，而成为商品集散中心，以及山西商人南茶北运的中转站。而首家票号日升昌在平遥创立之后，受其利益驱使，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商号转行经营票号，从而形成票号业的集聚，进而平遥、祁县、太谷三城发展成为金融中心。潞泽地区的长治、凤台、阳城三城，随着境内冶铁业和铁制品加工业的发展，而逐渐繁荣，由当地的行政中心逐渐发展成为以铁制品生产和销售为主导产业部门的城市。晋南的解州、运城和绛州也是在池盐的产、运、销等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以池盐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群。晋北的杀虎口、归化城、大同、丰镇也是在中蒙贸易过程中，逐渐成为以贸易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黄河沿线的西包头、河曲、碛口、永济在对贸易商品进行航运过程中，逐渐成为航运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

空间上聚集在较近区域的城市，出现了城市集聚现象，从而加强了其所在经济小区的特点，即晋中金融区、晋南盐业产区、晋东南煤铁产区、晋北中蒙贸易区、黄河沿线航运区。

7.3 集聚作用

7.3.1 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首先，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得到发展。以潞泽地区冶铁业及铁制品加工业为例，除熔炼铁水的高炉外，境内还有“大量厂子从事铁的继续加工，特别是制造铁丝和铁钉”^③，并且还有从事各种铁工业的厂子，数以百计，“如铸造厂、化铁炉、打钉厂、拉丝厂等等”^④。同时，还存在许多专门从事铸铁和铁货运输的脚力，“他们在路上络绎不绝，成群结队的骡车，满载着种类繁多的铁器”

刻本。

^① 黄鉴辉：《杀虎口关的消长隆替》，载《文史研究》，1992年第1—2期。

^②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9页。

①。

第二,产业集聚区内生产、销售以及业务量的规模很大。曲沃全县的烟坊年产烟丝 4 000—5 000 吨^②。河东盐,清代产量最高时达到 1 500 万斤^③,若按池盐每斤单价 25 文计算^④,则池盐年产值为 312 500 两白银(1 两白银折制钱 1 200 文^⑤)。潞泽地区,冶铁业繁盛,凤台县“铁冶遍于西南,岁入白金数十万”^⑥。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西铸铁产量为 50 248 吨^⑦,也即 100 496 000 斤,按每斤二十文计算^⑧,其年产值为 1 674 333 两白银(1 两白银折制钱 1 200 文^⑨)。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煤炭年产量为 2 215 吨,并且此后逐年递增^⑩。茶叶出口以价值计,嘉庆年间每年为 228 499 卢布,同治年间每年出口增至 5 976 204 卢布¹¹,增长 25.15 倍。另据恰克图税关调查,恰克图茶税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道光三十年(1850)为 4 808 084 卢布,在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十年(1860)为 4 827 990,¹²20 年税旺不衰。山西票号业务量及盈利数额巨大,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筑修关东铁路,其经费合计 800 000 余两¹³,几乎全部由山西票号汇解;光绪五年(1879),蔚丰厚票号的账期红利总数为 214 438 两¹⁴;日升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总利润为 601 712 两白银¹⁵。

第三,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而这种互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动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产品创新,促成产业升级的加快。同时,由于集群内积聚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众多企业,高度积聚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随时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降低了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页。

② 以下内容参看段士朴:《曲沃烟史简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二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③ 阴朝英:《潞盐产量之起伏》,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七十辑。

④ 《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七》,卷三十五中记载,河东盐,每斤钱 23 文至 28 文不等,取中数为 25 文。

⑤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⑥ (清)张貽瑄修,郭维恒等纂:光绪《凤台县志》,卷五,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⑧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0页。

⑨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⑩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11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12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贸易》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13 转因自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14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15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大学:《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页。

交易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进而增强其整体的竞争力。潞泽铁货的行銷全国^①、曲沃烟草的畅销蒙俄^②、山西茶商的驰骋两湖及塞外^③,山西票号的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④无不体现这一点。

7.3.2 城市集聚的扩散效应

城市集聚使聚集于城市的非农产业活动和城市的其他功能对周围城市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使周围一定范围城市之间能够保持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从而形成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共享,产业活动密切相关,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功能区域。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领域影响周围地区,产生扩散作用。

第一,城市商业的发展促成了全省各地更多人口脱离土地,外出经商,从而促进山西商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更加发展。境内许多州县的经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太原府榆次县“人操田作者十之六七,服贾者十之三四”^⑤平定州“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⑥平定州寿阳县“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⑦。“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半携资外出,贸易营生”^⑧。绛州“绛人性质和平,故营商亦所长,除在本地约占全县人十分之二”^⑨大同府左云县“土著之民……大半皆往归化城,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⑩。宁武府偏关县“关民多有出口谋生,从此寄籍他所,不再回里者”¹¹。大量民人外出经商,增强了在全国以及蒙俄市场山西商人的势力,扩展了其经营地域范围和商品范围。从而推动新一轮资本集聚的进行。

第二,清代山西庙会的发展超过集市,是城市中商业外溢的一种表现。集市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是满足当地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而山西省内所产无

^① 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三节“铁货业”,及第四章第四节“潞安、泽州地区的商业发展”内容

^② 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三节“烟业”内容。

^③ 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三节“茶业”内容。

^④ 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三节“金融业”内容。

^⑤ (清)钱之青修,张天泽纂:乾隆《榆次县志·风俗》,卷六,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

^⑥ (清)赖昌期、张彬等纂修:光绪《平定州志·食货·风土》,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⑦ (清)马家鼎修,张嘉言、祁世长纂:光绪《寿阳县志·风土·风俗》,卷十,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⑧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四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⑨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生业》,卷三,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⑩ (清)李翼圣原本,余卜颐增修,蔺炳章增纂:光绪《左云县志·风俗》,清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民国间石印本。

¹¹ (明)卢承业原本,(清)马振文增修,道光《偏关志》,卷上,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增修,民国四年(1915)王有宗重订铅印本。

多,因此,定期的集市不仅时间短,而且商品较为贫乏。城市集聚使得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影响了城市周围,乃至更远范围内的居民的生活。特别是许多富足的山西商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生活在城内,而是生活在家乡,很多是乡下,而又对城内所售商品有所需求。庙会较长的会期和丰富的商品则刚好满足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此外,庙会还有祭祀和娱乐的功能,这样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消费需求,而且丰富了文化生活。故而,清代山西庙会发展超过集市。

第三,城市集聚对周边地区在生活上带来影响,使得省内民风逐渐奢靡。太原“少年学业者,崇尚服饰,侈谈应酬,二岁工资不敷一年衣食耗费,无出者揽外事而荒本业”^①。介休县“四方商贾辐辏,物务日就奢靡”^②。运城“商民相习成风,贫富相耀成俗。乘坚策肥争奢斗靡”^③。大同“近颇奢侈”^④。偏关县“起居服物竞尚华靡,习尚为之一变。”^⑤宁武府“比户相耀,……被绮罗者几十五六矣”^⑥。民风渐奢,实际上是省内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的一种表现。

7.3.3 集聚效应对清代山西经济的影响

清代山西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产业集聚、资本集聚、城市集聚等特点,带来如下集聚效应:

第一,促进山西成为富甲一方的省份。清代山西富商大贾人数众多,晋中介休、祁县、太谷、榆次四县中,“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⑦,资产在“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⑧共有14家。咸丰年间,惠亲王称:“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于广东、山西为最。夙闻近数月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

^① (清)李培谦,阎士驥等:道光《阳曲县志·舆地图下》,卷二,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葛英纂刻本。

^② (清)王谋文纂修:乾隆《介休县志·序》,卷一,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③ (清)言如泗、熊名相修,吕鼐等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风俗》卷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④ (清)蒙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风俗》,卷八,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⑤ (明)卢承业原本,(清)马振文增修,道光《偏关志》,卷上,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增修,民国四年(1915)王有宗重订铅印本。

^⑥ (清)魏元枢、周景桂纂修:乾隆《宁武府志·风俗》,卷九,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⑦ 《军机处录副》、《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折》,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转引自王尚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⑧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山西多富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西之富庶可见矣”^①。清末，有人估计“晋民非但迹遍行省，抑且角逐外藩，人数有二十万至之多，岁入在二千万以上”^②。

第二，经营金融业，开创票号业，异地汇兑，转帐结算，活跃了国内金融市场。山西商人在清代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异地放贷，在北方各省市，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票号创办之后，其分庄更是设遍全国。山西票号是继帐局而起，较帐局更为完善的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雏形。山西商人所经营的各类金融组织，将各种公私存款投放到商业活动的金融流通领域之中，起到借贷资本的作用，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山西金融商人的经营活动，活跃了国内借贷资本市场，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加强区域经济联系，扩大国内外贸易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内分工的发展。山西商人进行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并将票号开设到国内，甚至国外的许多城市，“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里之外，不资地力”。^③他们北上黑龙江^④、奉天^⑤；出张家口、杀虎口，到恰克图^⑥；西到兰州、西宁、新疆地区；西南到打箭炉；南下浙闽两广。^⑦使烟酒糖布茶、驼绒牛羊马等各种商品南北交流，东西交易，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加强了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山西之铁、炭、酒、枣，以及各类土产，“车推舟载，日贩于秦”^⑧，“其输市中州者，日不绝于途”^⑨。汾阳县“一切家常所需之物，皆从远省商贩而至”^⑩。潞泽地区生产潞绸和泽绸的材料“取给于山东、河南、直隶等处”^⑪。寿阳县所需棉花来自直隶滦城、赵州等处。^⑫平定州之陶冶器具“输运直省易米”^⑬。山西旅蒙商深入蒙古草原，将内地的茶、布、绸缎、药材、烟叶、陶瓷、铁器、农具等商品带来，又将草原所产牛、马、羊、驼、皮毛等商品贩运回内地，从而密切了蒙

^① 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②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转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③ （清）徐继畲纂修，孙汝明、王步厚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县志·生计》，卷二，清同治四年（1865）修，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④ （清）徐宗亮：《龙江述略》，北京荣薰阁据嘉庆十五年（1810）本誊印。

^⑤ 赵恭寅修，曾有翼等纂：民国《沈阳县志》，卷七，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

^⑥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六。

^⑦ 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二节内容。

^⑧ （清）恩端修，武达材、王舒等纂：光绪《平遥县志》，卷十二，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⑨ （清）朱樟修，雍正《泽州府志·物产》，卷十二，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⑩ （清）周貽纘修，道光《汾阳县志》，卷十，清道光三十年（1850）修，咸丰元年（1851）刻本。

^⑪ （清）吴九龄修，莱腹豫纂：乾隆《长治县志》，卷七，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⑫ （清）马家鼎修，张嘉言、祁世长纂：光绪《寿阳县志·风土》，卷十，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⑬ （清）赖昌期、张彬等纂修：光绪《平定州志·食货》，卷五，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古草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推动了蒙古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对国内市场的扩大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分工的发展。

第四，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土地之外开辟财源，而且提供了就业机会。清代山西商人大量外出经商，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在省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成功地在土地之外开辟财源，使得本省成为全国富裕省份之一。同时清代山西发达的商业和金融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多数县份均有民人外出经商或在本地习贾。“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之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①太原府太谷县“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②。清源县“牵车服贾，贸易远方者，恒多焉”^③。汾州府汾阳县“闾阎生计得之田者十三，得之贸易者十七”^④平阳府“商业远游外省或住居各大商埠”^⑤曲沃县“服贾而走四方者，踵相接焉”^⑥。洪洞县“服劳商贾”^⑦。潞安府襄垣县泽州府沁水县“男多商贾”^⑧。平定州孟县“往往服贾於远方，虽数千里不辞远”^⑨。大量民人从事第三产业，在赚取了利润的同时，缓解了山西本地的生存和就业压力。

①（清）徐继畲纂修，孙汝名、王步墀续修，杨笃续纂：光绪《五台新志·生计》，卷二，清同治四年（1865）修，清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②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太谷县志》，民国二十年（1934）铅印本。

③（清）王效尊纂：光绪《清源乡土志》，卷十，清光绪八年（1882）梗阳书院刻本。

④（清）吴世英修，刘文德纂：顺治《汾阳县志》卷二，清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

⑤ 严用琛修，王维新等纂：民国《襄垣县志》卷二，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

⑥（清）张坊修，徐储纂：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二三，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敦好堂全书本。

⑦ 贺春寿修，民国《洪洞县志》，卷九，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

⑧（清）秦炳埏修，光绪《沁水县志》卷四，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⑨（清）张岚奇、刘鸿达等修，武绩绪、刘懋功等纂：光绪《孟县志·地輿考·风俗》，卷六，光绪七年（1881）刻本。

致 谢

论文终于在匆忙中付梓了，心中却没有轻松喜悦的感觉。2000年，我考入山西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刘建生老师的学生，开始了明清山西商人的学习与研究，硕士期间学习生活愉快而充实，殊不知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毕业后更深的感受是自己的学识有限。三年前，我考入南开大学，师从许檀老师修习中国古代史，开始了博士学习生涯。许老师对问题独到的见解、敏锐的洞察力给我很多的启发，庆幸有良师教导之余，却也更加惶恐，学问竟如此之深，浩如烟海，茫茫无边，以至于论文完成之际，心中所想的只是下一步的完善与深入，此时方才明白，我已经踏上了学问之旅，毕业意味着新的学习和研究即将开始。

本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许檀先生。感谢许老师三年多来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与温暖的关怀，特别是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许老师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资料及理论上的帮助。有时片言只语却常常有拨云见日之感，高山仰止，唯有日后更加努力，不负老师之厚望。

感谢我硕士导师刘建生先生。刘老师时常在电话里关心和指导我的学习，并为我的论文提供建议，令我获益匪浅，在此深表谢意。同时，感谢中国社科院江太新研究员、魏明孔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利民研究员、宋美云研究员对论文的建议与指导。

感谢同门的师兄、师弟、师妹，在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所给予的切实帮助。

最后，要感谢给我支持、为我分忧、为我骄傲的家人，他们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

虽然论文的写作告一段落，但学术之路还很漫长，需要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坚实地走好每一步。

乔 南

2006年秋于南开大学

参考文献

历史文献

- [1] (明) 谢肇淛:《五杂俎》,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2] (明) 申时行等:《明会典》, 万历时重修本
- [3] (明)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皇明经世文编》), 崇祯十一年(1638)
- [4] (明) 韩邦奇:《苑落集》, 西河书院, 清道光八年(1882)刻本
- [5] (明) 彭泽:《徽州府志》, 上海古籍书店, 1964 年安徽省影印本
- [6] (明) 李侃、胡濙:成化《山西通志》, 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
- [7] (明) 王道一、王景符等:万历《汾州府志》, 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
- [8] (明) 周一梧等:万历《潞安府志》, 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
- [9] (明) 傅淑训、闫期寿等:万历《泽州志》, 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
- [10] (明) 李维桢:万历《山西通志》, 崇祯二年(1629)刻本
- [11] (明) 关廷访:万历《太原府志》, 1982 年抄本
- [12] (清) 徐珂:《清稗类钞》,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13] (清) 李廷玉:《游蒙日记》,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1990 年版
- [14] (清) 龙文彬:《明会要》,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 [15] (清) 费淳、沈树声纂修:乾隆《太原府志》, 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
- [16] (清) 员佩兰修、杨国泰纂:道光《太原县志》, 道光六年(1826)刻本
- [17] (清)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 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 [18] (清) 胡天游:《石筍山房文集》, 清光绪二十六年(1840)刻本
- [19] (清) 黎中辅纂修:道光《大同县志》, 道光十年(1830)刻本
- [20]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 民国六年(1911)鸿宝斋石印本
- [21] (清) 刘士铭修, 王露纂:雍正《朔平府志》, 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 [22] (明) 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 台湾 1965 年影印本
- [23] (清) 李翼圣原本, 余卜颐增修、兰炳章增纂:嘉庆《左云县志》, 光绪七年(1881)增修嘉庆本, 民国间石印本
- [24] (清) 魏元枢、周景桂纂修:乾隆《宁武府志》, 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26] (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 1930 年影印日本浪华书林本。
- [27] (明)《明实录》,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校印, 1961 年版
- [28] (清) 徐继畲纂修, 孙汝名、王步墀续修, 杨笃续纂:同治《五台新志》, 光绪九年(1883)续修刻本
- [29] (明)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 清光绪元年(1875)归氏重刊本

- [30] (清)《光绪朝东华录》，宣统上海图书集成公司铅印
- [31] (清)吴大猷编：光绪《保德州乡土志》，民国五年（1916）石印本
- [32] (清)金福增修，张兆魁、金钟彦纂：同治《河曲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 [33] (清)《雍正朱批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34] (清)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1915年版
- [35] (清)俞世铨、陶良骏修，王平格、王序宾纂：同治《榆次县志》，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
- [36] (明)张翰：《松窗梦语》，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
- [37] (清)郭晋修、管粤秀纂：乾隆《太谷县志》，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
- [38] (清)恩浚、赵冠卿修，王效尊纂：光绪《太谷县志》，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 [39] 安恭己等修，胡万凝纂：民国《太谷县志》，民国二十年（1934）铅印本
- [40] (清)恩端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 [41] (清)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 [42] (清)张焘：《津门杂记》，清光绪十年（1885）刻本
- [43] (清)徐宗亮：《龙江速略》，北京莱蕙阁据光绪十七年（1891）本誉印
- [44] (清)陈时纂修：乾隆《祁县志》，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
- [45] (清)刘发圻修、李芬纂：光绪《祁县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 [46] (清)西清：《黑龙江外纪》，北京莱蕙阁据嘉庆十五年（1810）本誉印
- [47]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三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二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 [48] (明)唐甄：《潜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
- [49] (清)夏肇庸修、许惺南纂：光绪《交城县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 [50] (清)范启堃、王伟修，阴步霞纂：光绪《文水县志》，光绪九年（1883）刻本
- [51] (清)冯桂芬：《显志堂稿》，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 [52] (清)周貽纛修、曹树毅纂：道光《汾阳县志》，咸丰元年（1851）刻本
- [53] (清)方家驹、庆文修，王文员纂：光绪《汾阳县志》，光绪十年（1884）刻本
- [54] (清)张淑渠、姚学瑛修，姚学甲纂：乾隆《潞安府志》，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 [55] (清)吴九龄修、蔡履豫纂：乾隆《长治县志》，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 [56] (清)李楨、马鑑修，杨笃纂：光绪《长治县志》，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 [57] 严用琛、鲁宗藩修，王雄新、连笃敬等纂：民国《襄垣县志》，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
- [58] (清)林荔修，姚学甲纂：乾隆《凤台县志》，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
- [59] (清)项龙章修、田六善纂：康熙《阳城县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 [60] (清)豫谦修，杨笃纂：光绪《长子县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 [61] 张杨祚修、郝世桢纂：民国《武乡县志》，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 [62] (清)崔晓然、曾云章修，杨笃纂：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十年（1884）刻本

- [63] (清)高塘、吴士淳修,吕淙、吴克元纂:乾隆《临汾县志》,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本
- [64] 杨世瑛、史标育修,王锡祯纂:民国《安泽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
- [65] (清)许崇楷纂修:乾隆《翼城县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
- [66] (清)王耀章、龚履坦纂修:光绪《翼城县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
- [67] (清)张鸿达、茅丕熙修,韩子泰纂: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
- [68] 郭汉章修,仇汝功纂:民国《新曲沃县志》,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
- [69] (清)姚明辉纂:光绪《蒙古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中国图书公司铅印本
- [70] (清)余世堂修,蔡行仁纂:雍正《洪洞县志》,雍正八年(1730)刻本
- [71] (清)崔允昭修,李培谦纂:道光《直隶霍州志》,道光六年(1826)刻本
- [72] (清)李炳彦修:道光《太平县志》,道光五年(1825)刻本
- [73] (清)葛清等纂修:乾隆《乡宁县志》,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 [74] (清)冯安澜修,崔钟淦纂:光绪《续修乡宁县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
- [75] (清)言如泗修,吕濫纂:乾隆《解州全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 [76] (清)马丕瑶、魏象乾修,张承熊纂:光绪《解州志》,光绪七年(1881)刻本
- [77] (清)《定边记略》道光二十二年,(后有增补)。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蒙古卷之《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版
- [78] (清)言如泗修,吕濫、郑必阳纂:乾隆《解州安邑县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 [79] (清)朱樟:雍正《泽州府志》,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
- [80]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濫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 [81] (清)李焕杨修,张于铸纂:光绪《直隶绛州志》,光绪五年(1879)刻本
- [82]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民国十八年(1929)铅印本
- [83] (清)茅丕熙、杨汉章修,程象濂、韩秉钧纂:光绪《河津县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
- [84] (清)言如泗修,莫溥等纂:乾隆《解州芮城县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 [85] (清)周景桂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
- [86] (清)王正茂纂修:乾隆《临晋县志》,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
- [87] (清)宣统农工商部所编:《棉花图说·中国棉花现情考略》
- [88] (清)胡文烨等:《云中郡志》,顺治九年(1652)刻本
- [89] (清)范绳祖:顺治《高平县志》,顺治十五年(1658)刻本
- [90] (清)李廷机:康熙《宁波府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钞本
- [91] (清)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 [92] (清)周焘:《清除蝻种疏》,《皇清奏议》卷四七
- [93] (清)石麟、朱一凤等:《河东盐法志》,雍正五年(1727)刻本

- [94] (清) 祁雋藻:《马首农言·种植》,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
- [95] (清)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三,《请开条禁疏》
- [96] (清) 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
- [97] (清)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 [98] (清) 安颐等:《晋政辑要》,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 [99] (清)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经纶书局,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 [100] (清) 潘颐福:《东华续录》,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十八年(1892)
- [101] (清) 侯培峻、冀麟书:《汉口山陝西会馆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石印本
- [102]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图书集成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
- [103] (清)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湖南书局,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
- [104] (清) 稽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
- [105] (清) 王安定等:《两淮盐法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
- [106] (清) 王轩等:光绪《山西通志》,孙安邦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
- [107] (清)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
- [108] (清) 勤德洪等:《平定三逆方略》,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109] (清)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
- [110] (清) 李燧:《晋游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 [111]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 [112] 俞家骥、许鑑观修,赵意空、于廷梁纂:民国《临晋县志》,民国十二年(1923)铅印本
- [1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现代文献

- [1]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 刘建生、刘鹏生等:《晋商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3] 刘建生、刘鹏生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 [4]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5] 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大典》,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 [6] 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 [7] 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8] 张正明、孙丽萍、白雪:《中国晋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9]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10]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一至十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版
- [11] 张正明:《山西工商业史拾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12] 衡翼汤编:《山西轻工业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
- [13] 许一友、王振华:《太原经济百年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4] 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
- [15] 杜拉柱:《平遥古城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 [16]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近代的山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17] 龙登高著:《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18] 从翰香著:《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 [19] 王尚义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 [20] 王尚义著:《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 [21] 张金顺、康凯编:《区域经济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2] 郭鸿懋、江曼琦著:《城市空间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23] 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24] 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 [25] 杨纯渊、王尚义:《山西经济史纲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26] 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 [27]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28]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29]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1994年版。
- [30]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 [31]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32]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33] 潘文伟:《中国商帮》,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 [34] 张国辉:《晚清钱庄票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 [35]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36]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 [37] 李希曾:《晋商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38]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39] 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 [40] 柴继光等:《晋盐文化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41]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42] 张功德:《山西票号综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 [43]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44] 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45]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 [46] 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 [47] 张捷夫:《山西历史札记》,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 [48] 渠绍森、庞义才:《山西外贸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

- [4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驰名京华的老字号》，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版
- [50] 李悦：《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51] 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 [52]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版
- [53] 周晓光等：《徽商与经营文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年版
- [54] 张正明：《平遥票号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 [55] 郭蕴静：《清代商业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 [5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
- [57] 凌耀俊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年版
- [58]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 年版
- [59]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
- [60] 田际春 刘存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
- [61] 山西地方志编委会：《近代的山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 [62] 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 [63] 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版
- [64] (日)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 [65] (英) 威廉斯著：《世界商业史》，陈耀星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年版
- [66] (美)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 [67] (美)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 [68] (美)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 [69] (俄)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刘汉明、张梦玲、卢龙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 [70] 刘建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 [71] 方行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年版
- [72] 张维邦：《山西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年版
- [7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版
- [74]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 年版
- [75] 《五台县志》，五台县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 [76] 曹新宇：《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第二期
- [77] 山西省阳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阳城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年版

- [78]胡德荣编:《榆社县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79]《垣曲县志》,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80]《右玉县志》右玉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 [81]《孟县志》,孟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
- [82]《河曲县志》,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83]《介休市志》,山西省介休市志编纂委员会,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
- [84]《山西通志·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 [85]《大同县志》,大同地方志办公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86]《神池县志》,神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 [87]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1944年版
- [88]董继斌、景占魁等:《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 [89]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90]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 [91]徐月生:《山西经济开发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 [92]《绛县志》,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93]《河津县志》,河津县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94]《万荣县志》,山西省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
- [95]《代县志》,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 [96]《浮山县志》,浮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 [97]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98]《平定县志》,平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99]《沁水县志》,沁水县志编纂办公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100]《神池县志》,神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 [101]史若民:《票商兴衰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 [102]包伟民、黄海燕:《“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 [103]阎刚平:《碛口——黄河古码头,晋商西大门》,载《文史月刊》,2005年第7期
- [104]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基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 [105]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106]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 [107]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 [108]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2002年号。
- [109]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 [110]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111]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3期

- [112] 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113] 郭声波:《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布局及其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 [114]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115] 李刚、康欣平:《明清陕北市镇初探》,《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 [116] 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 [117] 封越健:《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118] 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119]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120]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121] 张青瑶、王社教:《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122] 余德餘:《古代绍兴的市镇和集市》,《绍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英文部分

- [1] Curtis Eaton B. and Rechard G.L. A Comment on Location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with Free Entry J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 [2] Porter, M.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e Free Press, 1990
- [3] Baumol. William J., John C.P. and Robert D.W.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New W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 [4] Losch. A.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5] David P. and William P.A..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a Global Economy, Lynne Rienner Inc., 1995
- [6]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1996, 1997
- [7] Anselin.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Research paper 9331). Morgantown, WV: Reg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94
- [8] Shepherd, William G, 1990, 1997,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th ed, 4th ed, Prentice Hall.
- [9] Jeffrey Church Koger Ware, 2000,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Strategic Approach. 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 [10] Stephen Martin, 2002,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乔南，女，1978年4月出生，祖籍：山西省洪洞县。出生地：山西省阳泉市。2000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学经济系，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3年7月，获得山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学位；2003年9月至今，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在职攻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

《“明清以来华北社会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2期
《清代山西的商业市镇——平遥》，《晋阳学刊》2006年6期